

苏联东欧剧变 与新闻媒介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 编

新 华 出 版 社

D751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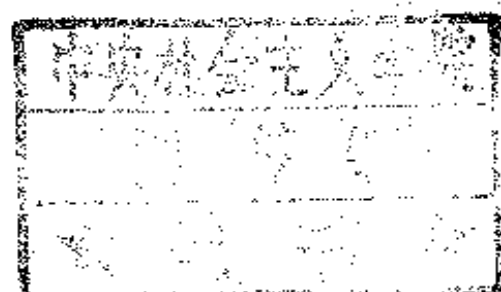
05258

苏联东欧剧变 与新闻媒介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 编



200052904



新 华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110号

苏联东欧剧变与新闻媒介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 编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625印张 插页2张 149,000字

1993年2月第一版 1993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1768—3/G·651 定价:4.80元

(内部发行)

写在前面

从1989年下半年到1991年年底的两年半时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能算是极其短暂的一瞬间。但这短暂瞬间在苏联东欧涌起狂风恶浪，也许多少年都不会平静下去，会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的痕迹。有70年历史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有近半个世纪历史的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忽喇喇似大厦倾，一个接一个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了下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一个接一个被“和平演变”掉了，被宣布要恢复资本主义的反对派所取代了。

社会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从来都是曲折的。这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尽管如此，像这两年半在苏联和东欧出现这么大的曲折，仍然使不少人感到意外。

其实，只要回顾一下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对此也是可以理解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四百年的历史。这期间，出现了多次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资产阶级革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剥削制度，尚且遭到封建势力的强烈抵抗，出现了多次巨大的曲折和反复。社会主义革命是要

最终消灭整个剥削制度，它遭到抵抗的强烈程度无疑会大得多，出现更大的曲折、逆流、反复，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是，社会是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既然资本主义在经过曲折、反复之后最终仍然取代了封建制度，那么社会主义经过曲折、反复之后也必将最终取代资本主义，这是毫无疑义的。

苏联东欧的剧变，有外部原因，如西方从50年代以来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也有内部原因，如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中的方针、政策方面的错误等等。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使苏联的改革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对苏联的剧变是重要的内因，而对东欧各国来说，这又是重要的外因。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一文中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善于从苏联东欧剧变中引出正确的教训，以便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得好一点，使中国作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坚强地屹立在世界上。

我们编印这本小册子的目的，仅仅是就新闻媒介在苏联东欧剧变中的作用这一个方面提供一些事实和分析，供大家研究苏联东欧剧变教训参考。

这本小册子材料收集到1991年12月中旬。在这以后，苏联彻底瓦解了。由于时间仓促，我们没有来得及收集苏联瓦解以后的新材料、新情况。尽管如此，导致苏联瓦解的诸多因素中新闻媒介所起的作用，从这本小册子提供的材料还是

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

限于我们的水平以及接触到的材料有限，这本小册子肯定会有一些疏漏和错误。我们恳切希望读者提出批评指正。

这本小册子的编写得到各部门的许多同志，特别是新华社参编部、国际部的同志的大力支持。文章的作者大都是这两个部门的驻外记者。他们写的是自己接触和了解到的驻在国的情况，因而材料翔实、可靠、新鲜。小册子的组织、编辑工作，是由本所外国新闻研究室康家林和宋立芳同志负责的。在此向他们致以衷心感谢。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 文有仁

1991年12月25日

目 录

写在前面

触目惊心 教训惨痛

——剖析新闻媒介在苏联东欧剧变中的作用

.....	文有仁 (1)
苏联新闻媒介的演变简介.....	宋立芳 高文生 (35)
从苏联 8 月事件看新闻媒介的重要性.....	康家林 (50)
“8·19事件”与西方广播新闻媒介.....	梁 关 (60)
苏联记协改变性质.....	高向明 (63)
东欧新闻媒介演变浅析.....	宋立芳 (66)
西方宣传机器与东欧政局.....	冬 岩 (85)
苏联东欧党报地位与作用的变化.....	文有仁 (96)
剧变后的波兰新闻界	王京臣 (111)
当前波兰新闻界的一些情况	关迪谦 (121)
匈牙利新闻界的变化	邹国昌 (130)
剧变后的保加利亚新闻界	王金柏 (137)

捷克斯洛伐克新闻事业现状和发展趋势	杨永忠 (148)
德国统一后东部地区的新闻媒介	王德峰 (154)
罗马尼亚新闻界现状	张汉文 (160)
实行多党制后的南斯拉夫新闻媒介	王 森 (171)
阿尔巴尼亚新闻界的变化	王洪起 (178)
附录 1：变化中的蒙古新闻媒介	王义民 (187)
附录 2：新闻自由与造谣自由	唐约翰 (192)
附录 3：东欧实施新闻自由并没有解决新闻的 所有问题	罗纳德·科文 (194)
附录 4：新闻自由在东欧经受考验	(美) 辛西娅·F·威尔逊 (213)

触目惊心 教训惨痛

——剖析新闻媒介在苏联东欧剧变中的作用

文有仁

从1989年夏秋之交到1991年8月，在苏联东欧大地刮起了一阵狂风，这一地区的社会主义政权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被刮倒了。苏联东欧政局的剧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大家都承认，某些新闻媒介在这场剧变中起了恶劣的作用，教训是惨痛的。

西方把新闻媒介用作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东欧各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随后中国于1949年建立人民政权。西方不甘于失败，曾经策划以武力颠覆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都遭到了失败。这以后，西方就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西方的政治家们是十分懂得舆论工具的重要性的。和平演变战略一提出。新闻媒介就在这一战略中被赋予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1963年改称现名。1971年以前，它们主要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经费，后来才改由国会拨款。为了发展这两个电台，美国花费了数十亿美元，仅1989年财政年度就拨款2.28亿美元。多年来总部一直设在联邦德国慕尼黑的自由欧洲电台是针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以保加利亚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匈牙利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等6种语言广播，每周播音600多小时。此外还以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对波罗的海地区播音，煽动它们脱离苏联。自由电台针对苏联，用俄语及苏联其他11种民族语言广播，每周播音460小时。80年代末，两台每周播音时间总共达1097小时。这两家电台宣布的宗旨是，从美国利益出发，通过向苏联东欧国家的人民，特别是青年，“传播国际以及苏联东欧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信息”，介绍西方社会的生活及价值观念等来建立“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苏联东欧的“言论自由”和“人权原则受到尊重”。它们承认，它们是“美国对东欧和苏联的发展进程施加影响的最强大的工具”。尼克松说，“我们必须利用现代通讯工具打破东欧政权对其人民的控制。自由欧洲电台是我们在东西方斗争中最有效的计划之一。”（注10）他还说：“自由电台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应该把对苏联的广播时间增加一倍”，“我们的广播节目应该给予苏联境内非俄罗斯民族更多的注意”。（注1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s, CNN）。1980年8月开播。它是一家私人公司，总部设在美国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市。迄今它在91个国家拥有6200万

1963年改称现名。1971年以前，它们主要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经费，后来才改由国会拨款。为了发展这两个电台，美国花费了数十亿美元，仅1989年财政年度就拨款2.28亿美元。多年来总部一直设在联邦德国慕尼黑的自由欧洲电台是针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以保加利亚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匈牙利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等6种语言广播，每周播音600多小时。此外还以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对波罗的海地区播音，煽动它们脱离苏联。自由电台针对苏联，用俄语及苏联其他11种民族语言广播，每周播音460小时。80年代末，两台每周播音时间总共达1097小时。这两家电台宣布的宗旨是，从美国利益出发，通过向苏联东欧国家的人民，特别是青年，“传播国际以及苏联东欧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信息”，介绍西方社会的生活及价值观念等来建立“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苏联东欧的“言论自由”和“人权原则受到尊重”。它们承认，它们是“美国对东欧和苏联的发展进程施加影响的最强大的工具”。尼克松说，“我们必须利用现代通讯工具打破东欧政权对其人民的控制。自由欧洲电台是我们在东西方斗争中最有效的计划之一。”（注10）他还说：“自由电台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应该把对苏联的广播时间增加一倍”，“我们的广播节目应该给予苏联境内非俄罗斯民族更多的注意”。（注1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s, CNN）。1980年8月开播。它是一家私人公司，总部设在美国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市。迄今它在91个国家拥有6200万

1963年改称现名。1971年以前，它们主要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经费，后来才改由国会拨款。为了发展这两个电台，美国花费了数十亿美元，仅1989年财政年度就拨款2.28亿美元。多年来总部一直设在联邦德国慕尼黑的自由欧洲电台是针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以保加利亚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匈牙利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等6种语言广播，每周播音600多小时。此外还以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对波罗的海地区播音，煽动它们脱离苏联。自由电台针对苏联，用俄语及苏联其他11种民族语言广播，每周播音460小时。80年代末，两台每周播音时间总共达1097小时。这两家电台宣布的宗旨是，从美国利益出发，通过向苏联东欧国家的人民，特别是青年，“传播国际以及苏联东欧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信息”，介绍西方社会的生活及价值观念等来建立“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苏联东欧的“言论自由”和“人权原则受到尊重”。它们承认，它们是“美国对东欧和苏联的发展进程施加影响的最强大的工具”。尼克松说，“我们必须利用现代通讯工具打破东欧政权对其人民的控制。自由欧洲电台是我们在东西方斗争中最有效的计划之一。”（注10）他还说：“自由电台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应该把对苏联的广播时间增加一倍”，“我们的广播节目应该给予苏联境内非俄罗斯民族更多的注意”。（注1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s, CNN）。1980年8月开播。它是一家私人公司，总部设在美国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市。迄今它在91个国家拥有6200万

订户。通过5个人造卫星一天24小时向全世界连续播发新闻。这家公司虽然是私人的，并且标榜客观公正，强调自己的新闻尽量采取现场直播、不加评论的方式，但它在镜头的选择和剪辑方面表现了它的倾向性。它在推动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方面也起了自己的作用。它在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那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的报道就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它歪曲报道中国政府平息暴乱的行动，却不报道中国采取的廉政措施。法国《快报》周刊1990年9月14日报道说，美国国务卿贝克曾私下对CNN的老板特纳表示，如果没有CNN的报道，他不会对天安门广场事件反应如此强烈。

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是英国全国性广播电视机构，1922年11月开播，是世界上资格最老的广播公司之一。1967年正式播出彩色电视。最高领导是政府提名、女王任命的11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董事会任命的总经理是最高行政负责人。其经费来源主要靠电视收看费（广播收听免费），其对外广播则由政府拨款。环球英语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进行。此外还有其它约40种语言向世界各地广播，其中包括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广播。在80年代初，波兰发生罢工示威浪潮，出现了反对派组织——团结工会。BBC每天大量广播罢工游行消息和团结工会头面人物言论。BBC在广播中为团结工会出谋划策说：

“只要什么地方发生罢工，团结工会就要利用它来向政府提出新的要求。这样，一切就螺旋般上升。”肯尼迪早在1957年就夸奖说：“情报预算比我们小得多的英国人在对东欧的

无线电广播中却经常获得了更好的效果。”（注12）

德意志广播电台（Deutschland Funk, DLF）和德国之声广播电台（Deutsche Welle, DW）。它们都是联邦德国政府建立的广播电台，总部均设在科隆。前者1962年1月开播，以邻国为对象，使用德语和其它12种欧洲语言广播，包括捷克语、斯洛伐克语、波兰语。德语全天24小时连续广播。德国之声1953年5月开播，80年代末使用35种语言广播。80年代初，团结工会在波兰搞罢工游行时，德意志广播电台频频发表评论，建议工人要使活动保持“文火”，“逐步加码和逐步动摇波兰的国家基础”，团结工会“只在罢工中心同政府谈判”，“要保护好运动的领导”。

1978年，美国成立了由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领导的协调委员会，负责协调自由电台、自由欧洲电台、“美国之音”和中央情报局的活动。

每当苏联东欧什么地方发生事件时，西方新闻媒介不满足于该地常驻记者的活动，临时派出大量记者去现场采访所需材料，炮制各种推波助澜的新闻报道。1981年波兰工潮高峰时，到波兰采访的西方记者竟然达到1000多人。

二、在苏联东欧培植亲西方的新闻工作者。

其主要手段是通过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来扩大文化、人员交流，使苏联东欧国内一些人潜移默化，接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西方的政治家们认识到，要实现和平演变，一定要转变

苏联东欧国内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想。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1960年1月17日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最后变质，主要将取决于共产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集团内部的各种力量的奋斗结果”；“为了促进苏联的制度和共产主义集团内部的演变，我们应当提倡与共产主义社会进行最广泛的接触”；“美国应当设法同共产主义集团中的知识分子，最后同中上层政治家建立广泛联系，以期逐渐影响他们对意识形态的拥护”；“这种逐渐增加的效果可能在若干年后才看得出来”。

为此，西方国家以经济援助和贸易为先导，打开双方文化交流和人员接触的渠道。60年代中期，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赤裸裸地说，采取“鼓励贸易”的做法“使我们能够在这个东欧加速改变的时期对其政策和制度起某些影响”（注13）。尼克松说：“我们提供经济合作的交换条件”是“我们能够从东方集团取得政治上的让步”（注14）。当苏联“要他们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应当把尽可能多的真理送过去”（注15）。

另一方面，他们大批吸引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到西方去以转换思想。艾森豪威尔说：“1958年，我曾研究并草拟一个建议，要求美国和苏联大批交换大学生，其总数可达一万人之多，费用由我们支付。”“有朝一日，一批新人将会在苏联掌权，我要努力争取的正是这一代。”（注16）肯尼迪说，为了促成东欧“和平的转变”，就要在东欧“培养自由的种子”，其手段则是通过贸易、经济援助，“增加两国

人民之间的接触”、“扩大学生和教师的交换”（注17）。他还说：“由于福特和洛克菲勒两个基金会的慷慨和远见，非官方的学生和教师交换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这种‘援助’花钱不多，而效果很好，特别是在波兰，因为波兰青年一代，大学生和教师是非常勇敢的；他们对共产党的压力也是非常富于反抗性的。波兰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灌输西方的思想、书籍和道德而形成的文化革命。”（注18）

在西方的争取对象中，新闻工作者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80年代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国际访问者”计划时，在所邀请的中国“国际访问者”中新闻出版界人士约占四分之一。美国新闻署署长盖尔布1989年初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夸耀说，所有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访问者在访美后“均对他们本国的政府制度产生怀疑”。

在西方意识形态影响下，这些国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波兰华沙大学历史教师库龙等人1976年就成立了反对派组织“保卫工人委员会”。以后其他一些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又建立另一些反对派组织。他们之中许多人是大学教师和新闻记者。1989年8月出任团结工会政府首任总理的马佐维耶茨基就是一名新闻记者。他在1976年积极支持“保卫工人委员会”的活动。1980年由他牵头张罗了一批知识分子组成了团结工会的参谋和顾问班子。1981年3月他还创办了团结工会机关刊物《团结周刊》并自任总编辑。这个刊物当时在煽动工人反对统一工人党政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期间，波兰许多新闻工作者转向了反对派。

创办了一系列地下的和半合法的小报。

三、协助反对派建立新闻媒介并给予大力支持。

西方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基金会和组织来从事这项活动。

美国国会于1984年设立了美国“全国争取民主基金会”，由劳联——产联、美国商会等社会、经济、政治团体参加，国会每年都向它提供拨款。英国《金融时报》1989年7月11日报道，拨款的用途“包括支持为扩大开放和恢复文明社会而努力的独立组织和报纸”。一个以纽约为基地的“民主中心”，任务就是向苏联的“民主分子”提供书籍、印刷设备、电脑、美元等等。芝加哥的“断头台”组织的任务之一是对波兰反对派工会提供财政援助和印刷技术。“全国争取民主基金会”主办的刊物《民主杂志》的一篇文章在谈到该会的任务时说，“首先要突破（共产党国家）统治党和政府在新闻、组织和权力方面的垄断”，“继而要创建独立的出版物（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由该会资助创建的已有12种），另立工会、企业等团体和其他组织，扩大自由活动的政治领域，缩小政府的权力”，“然后，由民主分子发动一场分享权力的运动并最终接管权力”。

1981年底波兰实行全国军管并禁止团结工会以后，团结工会地下组织把出版地下报刊和非法书籍、小册子作为自己重要的活动。西方通过团结工会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国外中心”向团结工会地下组织源源不断地提供资金，偷运去大量印刷设备、打字机、电脑、复印机、广播器材等，

供出版地下报刊和设立地下广播电台之用。据报道，1985年波兰国内出版了400多种地下报刊，其中有的发行量达到3万份。此外还出版了成千上万种反政府的书籍和小册子。在波兰剧变以后，劳联——产联一位负责人1989年8月27日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承认，“军管实施之后，美国工会提供的资金和来自全国争取民主基金会的数百万美元通过劳联——产联的自由工会协会送给了团结工会”，“团结工会得到了许多印刷机、电脑、油印机和无线电广播设备等等”。

苏联东欧共产党新闻政策的变化

就当时的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情况来说，几十年来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有许多地方不适应当前的情况，有不完善之处，必须进行改革。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新闻事业也是如此。问题在于怎样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下改革呢，还是以改革来否定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改革是达到完善社会主义的目的呢，还是导向复辟资本主义？事实证明，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在国家剧变前的一个时期在新闻政策上有许多根本性改变，这些改变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原则，导致国内舆论的严重失控。这些改变主要表现在：

一、实行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这是新闻政策改变的理论基础。

戈尔巴乔夫是在1980年10月当上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5年3月11日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早在1984年底，他就提出了“公开性”。他说：“公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不可分离的一个方面，也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准则。”（注19）1986年2月他再次提出了公开性问题并把它提到了极其重要的地位。他说：“扩大公开性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个原则性的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公开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群众的政治创造性及参加管理。”“实行公开性即把国家和社会所做的一切都置于人民的监督和注视之下。”（注20）他强调，“公开性是改革的重要工具”（注21）；“是苏联当代生活的准则”（注22）；“舆论的力量只有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广泛公开性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注22）。

1988年6月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公开性的决议》。

公开性的思想基础，则是戈尔巴乔夫1987年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阐述的，人类当今进入了核时代，必须要有新思维：“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高于阶级利益”。他在这本书中强调，要“扩大我们整个体制的工作的公开性和开放性”。舆论工具“是公开性的最有代表性和群众性的论坛”。

在谈到公开性的内容时，戈尔巴乔夫说，这就是“让人民知道一切”（注23）；“将更多的事公诸于众”（注24），要做到“人们既应知道好事，也应知道坏事”；“集中那些反映了苏联社会各阶层和各行各业利益的意见和观点”（注

25)。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中赞扬说，“我们的报刊、广播和电视逐渐地好象解冻了，触及到一切新的题目”。他强调，“任何事件，不论是今天的痛处或是过去历史上的悲惨事件，都可以成为报纸分析的对象”。

波兰是最早提出公开性的。当年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早在1982年就提出，要实行“公众生活的公开性”，做到“政府就像在拉开幕布的舞台上工作一样”，公开性“在可允许的程度上甚至也包括内务部的问题”（注26）。他说，公开性就是不得“毫无理由地对党内生活实行保密，对信息进行有选择地报道并加以美化，限制讨论，限制批评的范围”（注27）；就是“不承认有‘禁区’，不承认有可以沉默和严格保密的领域”（注28）。

在匈牙利，当时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1988年5月20日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还曾公开谴责滥用公开性。他说：“不断扩大的民主和公开性正在被利用，而且是被那些不同意我国政策的主要方针甚至不同意现行社会制度的人滥用了。”可是，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被解除了总书记职务，而由格罗斯继任，主张“彻底取消东欧和苏联的共产主义”的波日高伊进入了政治局。1989年1月28日，波日高伊向新闻界公开宣布他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上同党中央其他人的分歧。一个月后，他明确提出，党必须对过去事情更加公开。而格罗斯不得不承认“没有什么禁区”（注29）；“一切都应公诸于众”（注30）。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89年12月通过的行动纲领主张实

现“信息交流的完全自由”。

保加利亚共产党1990年2月通过的新党章载明，党“在与新闻媒介的相互关系中贯串公开性和透明度的原则”。

关于“舆论多元化”，戈尔巴乔夫1988年表示，“我们肯定舆论多元化，摒弃精神垄断的做法”（注31）；“公开性要求在对内政策和国际政策的任何问题上的舆论多元化”

（注32）。雅鲁泽尔斯基也公开表示，波兰统一工人党不“垄断”“波兰社会舆论的制造工作”（注33）；要“容纳各种观点和意见，即使是不正确的观点和令人难堪的意见”（注34）。

有的党如齐奥塞斯库掌权时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和昂纳克掌权时的民主德国的统一社会党是不搞公开性的。但在他们被推翻以后，舆论导向迅即改变，成为反对派夺取政权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允许私人、各党派团体和外国人办报。

既然倡导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那么允许私人办报、各反对派党派团体办报和外国人办报就不可避免了。

早在1989年1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麦德维杰夫就谈到，“目前在苏联新闻领域中出现了某种“自由不羁”甚至是“放肆”的趋势，非正式的、未经注册的，也就是法律之外的出版物如“雨后春笋”。据1990年上半年材料，苏联各反对派办的“非正式”出版物就有上千种。《论据与事实》周报、《莫斯科新闻》周报、

《星火》画报等等实际上成为不受党领导的同仁报刊。

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删去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条款，规定“苏联公民有权结成政党、社会团体”，“一切政党、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应在宪法和苏联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注35）这样就放弃了苏共的领导地位并承认了多党制。这为各党派团体办报、私人办报奠定了前提。1990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新闻出版法》明确规定：“创办舆论工具的权利属于人民代表苏维埃和其他国家机构、政党、社会组织、群众运动、创作协会，属于依法创建的合作社、宗教团体和其他团体，属于劳动集体以及年满18岁的苏联公民。”

（注36）这就使反对派政党团体办报和私人办报完全合法化了。到这一年10月，已有700多家报刊，包括13个党派的报刊，进行了登记，其中七分之一属个人所有。还出现了独立的通讯社。许多机关报刊也纷纷宣告“独立”。《莫斯科新闻》和《论据与事实》分别宣布脱离苏联新闻社和知识协会。作协《文学报》、工会《劳动报》、苏共莫斯科市委机关报《莫斯科真理报》等都删去了报头上“机关报”字样，而标明是独立的报纸。1989年9月，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和一家苏、意、法合资公司创办了“国际文传电讯”通讯社，很快成为叶利钦等民主派的喉舌，并在新闻市场上超过了塔斯社。

战后波兰的报刊是多元化的，一直存在民主党派报刊、宗教报刊和同仁报刊。据1984年材料，在波兰全国报刊中，民

主党派报刊占8%，宗教报刊占3%。由于各民主党派是同一工人党“结盟”的，它们的报刊总体上与同一工人党报刊是一致的。当时也有同仁报刊如发行量很大的《华沙生活报》，它实际上也是党领导的。天主教出版的90多种报刊也大体能接受政府的约束。在不违反宪法前提下，这些报刊经常发表一些与官方观点不一致的文章，也被允许。1987年6月，波兰当局批准第一家由亲团结工会分子的独立的同仁杂志《共和》月刊出版。

1989年4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与团结工会在圆桌会议上达成了反对派组织合法化的协议，反对派报刊合法化也就是不言而喻了。1989年5月团结工会的《选举报》创刊，随后《团结周报》复刊。许多地下报刊纷纷转到地上。1975年被禁止的《简言之》周刊也复刊了。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989年3月29日就制定新闻法作出决定时，宣布允许任何党派和个人，包括外国人，创办报刊、电台、电视台和商业性新闻机构。而早在1988年，匈牙利即出现了一份公开发行的所谓“独立民主的”《改革》周报。随后又出现了《消息》、《发言人》之类独立报刊和自由民主联盟的讽刺性双月刊《匈牙利柑桔》。1989年美国著名黄色杂志《花花公子》在匈牙利发行匈牙利文版，这是它在苏联东欧发行的第一个当地语文版。

1990年1月，保加利亚共产党在同反对派“民主力量联盟”举行的圆桌会议上同意反对派出版报纸。同年4月，议会通过的政党法规定，各党派均有权出版刊物，平等分享與

论工具；禁止各党派干涉国家舆论工具。在这以后不久，保加利亚40多个政党、组织和团体都办起了自己的报刊。

三、党报性质、作用、内容发生根本变化。

苏联在1991年“8·19事件”前，党报的性质按规定虽并未变化，但作用、内容已有很大变化。苏共中央1990年2月提出的纲领草案重申，“苏联共产党把自己在中央和地方新闻机关看作实现自己政策和思想，进行组织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工具并指导它们的工作”；“党的报刊的总编辑由相应的（注：指同级的）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任命”。另一方面则是允许在党的报刊上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展开讨论和辩论，对党和政府实行社会监督。戈尔巴乔夫说，公开性“要求自由对比各种不同的观点并进行争论”（注37），“对于这种讨论来说是没有禁区的”（注38）。他还说，舆论工具应当“成为民主监督的保障”（注38）；“我们正在党内、国家和各部门开放批评区”（注39），“对社会监督和批评来讲，我们这里并无禁区。这也完全适用于舆论工具”（注40）。

在波兰剧变前，统一工人党规定党报必须接受党委的领导，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也主张党的报刊实行“意见的多元化”。雅鲁泽尔斯基说，波党“对各种意见和观点敞开大门”（注41），“在党内可以存在怀疑、批评和持不同立场”（注42），“真正的讨论，包括在大众传播媒介上已推广的讨论和辩论，是需要经常进行的”（注43）。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1988年8月决定，原保共中央机关报《工人事业报》和机关刊物《新时代》成为保共的报刊机构，即不再从属于中央而是从属于全党的机构。1990年2月举行的第14次特别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进一步明确规定，各级党的报刊从属于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并对代表大会负责。新党章还规定，党的新闻媒介“为党内所有的观点提供论坛”；宣传“党内的联盟及党员个人的决定和观点”；“党内的联盟”也可以设立自己的新闻媒介。甚至规定，“党的新闻媒介为所有的社会民主力量、社会活动家、记者和公民提供论坛。”

新闻媒介在政局剧变中的作用

苏联东欧的剧变，有诸多的内外因素在起作用，而舆论工具在其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这些国家党内外反对派几乎都是首先攻破舆论阵地，同西方里应外合，共同利用他们所掌握的舆论工具给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抹黑，甚至造谣诬蔑，而党的报刊反击无力，甚至不去反击，有的甚至参与抹黑。其结果，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遭到破坏，人们的思想被搞乱，反对派得以从共产党手中夺取到政权。

在戈尔巴乔夫宣布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以后，在苏联原来清一色的党的报刊中，有一些转向“独立”，如《星火》画报、《论据与事实》、《新世界》、《涅瓦》、《莫斯科新闻》等，成为“公开性堡垒”。它们从耸人听闻的报道、

荒诞无稽的假新闻乃至造谣、诽谤和给苏共、社会主义抹黑等等来吸引读者。那些新涌现的五花八门的反对派报刊更是以丑化苏共、社会主义为己任，而不惜动用捕风捉影乃至无中生有的手段。这些报刊从否定苏联70年社会主义的成就到否定十月革命乃至为沙皇俄国唱赞歌，从否定斯大林到否定列宁、马克思。

《纽约时报》1989年10月23日指出，“苏联报纸每天充斥着从飞碟之谜到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亵渎性批评之类的耸人听闻的新闻”，“神秘主义，甚至列宁实际是恐怖主义分子的说法都出现了”。苏共莫斯科市委机关报《莫斯科真理报》登出了斯大林是沙皇暗探局的奸细这类纯属捏造的报道，还开辟了定期的占星术专栏。《星火》画报1990年12月的一期刊登《告别上帝》一文，恶毒攻击列宁，说列宁是“不善良的人”、“革命的残酷性的人”，还硬说沙皇俄国“很富”，“十月革命没有必要，是错误的”。一些正直的人士写的反驳造谣、歪曲的文章，却得不到报刊刊载或只登在不显著地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麦德维杰夫1989年11月在一次讲话中指出：目前在新闻领域中，有的利用公开性来满足个人的野心，有的已具有反社会主义的性质。1990年7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八大的一项决议说：“党报作为党和社会的革新和团结的集体组织者的作用不断削弱”，“对那些侵害人民的精神道德财富、侵害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传统、侵害苏军和执法机关尊严的人没有给予应有的反击”，不仅如此，更有甚者，“党报和党刊的版面有时

被用于宣传与苏共格格不入的观点，刊登歪曲苏维埃国家过去历史、歪曲党和人民为我国独立和自由所进行的英雄斗争的材料。”这种舆论使苏共威信急剧下降，助长了党内外反对派势力的发展。1990年7月发表的苏共二十八大纲领性声明承认，苏联出现了“社会上和党内的危机”，进入了“可能引起社会和经济混乱的政治不稳定时期”。这种情况看来不幸而言中。

在苏联1991年“8·19事件”中紧急状态委员会争取恢复社会主义阵地的努力之所以遭到失败，除了多年来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失误和准备不足的原因以外，舆论因素起了重要作用。近些年苏联新闻工作的失控和西方的宣传使人们（包括军队的官兵）思想混乱，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在事件期间，苏联国内反对派掌握的舆论工具和西方的新闻媒介竭力煽动群众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支持叶利钦。结果，反社会主义的力量气焰嚣张，而坚持社会主义的力量却凝聚不起来，紧急状态委员会终于失败。

紧急状态委员会在行动开始时虽说只允许《真理报》等9家报纸出版并控制了塔斯社和中央电视台，但并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停止支持反对派的“国际文传电讯”、“俄罗斯通讯社”、“莫斯科回声”电台等的工作，也没有切断国际电话和文传通讯。西方新闻媒介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英国广播公司（BBC）加强了对苏广播。BBC把对苏广播时间增加了一倍，达到每天18小时，甚至还转播被禁的“俄罗斯电台”在俄罗斯议会大厦的现场实况报道。它

们反复报道叶利钦号召人们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讲话，西方国家谴责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消息，并呼吁人们支持叶利钦。在这次行动失败后，戈尔巴乔夫8月22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在被软禁时收听到了BBC、美国之音和自由电台的广播，他向它们和苏联那些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记者们表示感谢。

波兰在80年代初爆发战后最严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危机，反对派团结工会迅速壮大，创办了《团结周报》等许多合法、半合法报刊，散布诋毁社会主义、丑化波兰统一工人党的言论。波兰统一工人党也出现了各种“横向组织”——党内派别，他们在党内的报刊上发表违背中央方针、政策的言论。1981年波兰实行军管以后，禁止了团结工会及其报刊，取缔了党内的横向组织，波党强调“党是用一个声音说话的”。1989年4月，波党和团结工会在圆桌会议上达成团结工会合法化协议以后，团结工会创办了自己的报刊，分享电视台和电台的时间。这些报刊立场十分鲜明，宣传团结工会主张，攻击统一工人党和社会主义，决不客观报道统一工人党言论和过去40年的成就。其中不少造谣、歪曲、夸大之词。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重新出现了各种“横向组织”，它们纷纷在报刊上发表违背中央方针的言论。原来与波兰统一工人党结盟的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的报刊也开始更独立地行动，发表一些附和团结工会的言论。统一工人党的机关报刊由于党内派系矛盾而未能给予有力的批驳与回击，甚至为了表示“客观”而报道团结工会的言论，乃至一些攻击性言论。

这使得统一工人党的名声进一步大大下降，成为它后来在选举中失利和丢失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权垮台过程，法国《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前不久作了这样的报道。在1989年11月17日布拉格青年游行纪念爱国青年奥普列塔被纳粹杀害50周年时，一些策划夺取政权的人让齐夫查克中尉冒充大学生躺在大街上装作被打死，一位名叫德拉耶斯查的妇女则把这名“大学生”被打死的消息告诉反对派记者乌赫尔，乌赫尔转告路透社驻捷记者让多夫斯基（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此消息被大量广播以后，“舆论都被动员起来反对当局”，导致布拉格在11月20日出现20万人大示威，这对捷政府垮台起了重要作用。反对派执政后，乌赫尔被任命为捷通社社长，让多夫斯基任总统新闻发言人。

罗马尼亚剧变，齐奥塞斯库执政时出现的各种问题是深刻的原因，但蒂米什瓦拉“大屠杀”起了导火线作用。事后发现，这个“大屠杀”是罗马尼亚反对派和西方国家媒介捏造的谎言。1989年12月23—24日，法国几乎所有电台、电视台、通讯社、报刊都大量报道在蒂米什瓦拉发现大屠杀现场的消息，并配以图像，其中有母亲被剖腹与婴儿死在一起的照片，有被脱光衣服似被折磨死的男人的照片。这些新闻和照片被法新社、自由欧洲电台、罗马尼亚“解放”电视台等许多新闻媒介广泛传播，包括传播到罗马尼亚全国各地，使罗马尼亚群情激愤，愤而起起来反对当局。1990年4月4日法国《解放报》透露了真相。原来这个大屠杀现场是伪造的。

一些人从该市医院公墓挖出19具自然死亡者的尸体摆布而成。“母亲与婴儿”照片是把一个出生两月后病死的婴儿同一位与她毫不相干的、早一个月前因酒精中毒死亡的妇女放在一起构成的。《解放报》说，从1989年12月17日到1990年1月4日罗马尼亚整个动乱期间，蒂米什瓦拉各方死亡人数为97人，全国为639人。法国《星期四事件》周刊1990年5月在题为《罗马尼亚：一个大骗局的故事》的文章中谈到这一事件时说，“当时巴拿马（注：指美国入侵）死了2000人，却没有引起公愤！”文章援引法国一位记者的话说，尽管明知报道不真实，但这“是为了让革命成功”。

剧变后的苏联东欧新闻界

苏联东欧的反对派未上台前一直在努力争取“新闻自由”，似乎他们都是“新闻自由”原则的忠实信奉者，可是，在他们夺取到政权以后，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一、千方百计扼杀共产党和左派的报刊。

叶利钦在打垮了紧急状态委员会以后，立即派人接管了塔斯社、苏联新闻社、中央电视台并勒令《真理报》等6家共产党报纸停刊，同时停止俄共的活动并限制了苏共活动，随后又没收俄共和苏共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这些报纸只在被迫宣布改变性质以后才被准许复刊。香港《明报》1991年8月26日评论说，“现在，（苏联）共产党失却了报纸、电视、

广播等传播工具”，共产党“成为哑巴党了”。事实上，苏共已被从组织上摧毁了，也就谈不上有党报了，至多不过是左派报纸而已。

在波兰，团结工会掌权后立即把波兰通讯社、国际新闻社、广播电视委员会、中央电视台、中央电台的负责人都换成了团结工会人士。波通社部局级领导人全部更换，各地方电视台台长也都更换了。团结工会还强行接管了统一工人党的一些地方机关报。此后不久，1990年10月，团结工会政府决定没收前统一工人党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波兰统一工人党拥有的“报刊、书籍、发行”工人出版合作社被取消，该社出版发行的107种报刊被拍卖或停刊。大量曾是统一工人党党员的记者被赶入失业大军。为瓦文萨竞选总统建立的中间派协议会的议员们1991年10月提出了有关“非共产党化”的四个法律草案。随后，反映该会观点的《格但斯克报》提出了“非共化”十条，包括“新闻媒介非共化”，要置全部左派报刊于死地。

匈牙利剧变后，社会主义工人党（其后分裂为社会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党）由于资产被国家没收或被各反对党瓜分，陷入严重财政困难。19家州党报先后被出售，其中4家在1990年4月被联邦德国阿克塞尔·施普林格出版公司无偿接管。中央党报《人民自由报》40%股份也被联邦德国的“贝特尔斯曼”出版公司买去。

罗马尼亚剧变后，由于罗马尼亚共产党不复存在，所有党的报刊都改变了性质。

民主德国被西德吞并后，统一社会党中央机关报《新德意志报》成为其后身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全党报纸。原来柏林市委党报《柏林日报》业已独立，14个地区的党报都成为一般性报纸。

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反对派把持的联邦议会于1990年11月16日通过法律，没收捷共的全部动产、不动产、档案材料等；1991年12月11日又通过刑法修正案，规定凡支持或宣传共产主义者将被处以1—5年有期徒刑。这是一条彻底置共产党及其报刊于死地的法令。

1991年12月12日，保加利亚国民议会通过法律，把保共、农民联盟、祖国阵线、共青团、反法西斯和资本主义战士协会、保加利亚工会在解放后获得的财产宣布为“非法所得”，从要它们的继承者社会党、统一农民联盟、祖国联盟、民青联盟、独立工会手中“没收归公”。这是保共财产第三次被没收，前两次是被当年法西斯政府没收的。财产都没有了，当然无法再活动了，更无法出版报刊了。

二、反对派内部各派争夺新闻媒介。

苏联东欧反对派掌权后不仅不给共产党人以新闻自由，在他们内部的各派也是彼此抢夺新闻媒介，扼杀其他派别的新闻自由。

1989年9月，波兰团结工会组织政府。瓦文萨的顾问、《团结周报》总编辑马佐维耶茨基当上了总理，瓦文萨担心大权旁落，两人之间出现了裂痕。马佐维耶茨基离开《团结

周报》时指定扬·德沃拉克接班，可是瓦文萨却任命自己的亲信雅罗斯拉夫·卡钦斯基为《团结周报》总编辑。随后，

《团结周报》原来的四位副总编辑辞职，编辑部也进行了大改组。《团结周报》成了瓦文萨的喉舌。团结工会机关报

《选举报》总编辑亚当·米赫尼克在瓦文萨和马佐维耶茨基的争执中站在马佐维耶茨基一边。这使瓦文萨十分恼火。但瓦文萨又撤换不了这位团结工会老资格活动家，于是在1990年9月通过他控制的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剥夺《选举报》在报头上使用团结工会标记的权利。在瓦、马二人竞选总统时，这两家新闻媒介分别为瓦、马效劳，互相大肆攻击对方。瓦文萨与旅居加拿大的波兰侨民蒂明斯基竞选总统时，原定的电视辩论被团结工会控制的中央电视台临时取消而代之以瓦文萨向全国选民发表竞选演说。而两人的联合记者招待会成为亲团结工会记者对蒂明斯基的围攻会。

在捷克斯洛伐克，当年曾同目前的执政党公民论坛一同为颠覆共党政权而“战斗”的人民党、社会民主党、复兴俱乐部等8个政党和组织1991年1月31日联合发表声明，抱怨“国家群众性宣传工具和捷通社长期处在公民论坛的决定性的影响之下”，“使其他政党和组织难于和不可能使用这些宣传工具”。它们指责这些新闻媒介的宣传具有“不完整性和片面性”，“粗暴地损害公民客观、全面和及时了解事情真相的权利”。它们要求“排除这些宣传工具依附于唯一的政治单位”，保证“各个政治单位使用的平等权利”。

在匈牙利，执政党民主论坛的一位负责人伊姆雷·科尼

亚于1991年9月提出备忘录说，必须对新闻媒介采取“决定性行动”，因为新闻媒介一直同执政党对着干。

在罗马尼亚，记者协会、国家农民党、国家自由党、生态党、匈牙利族民主联盟1991年2月发表联名信，抗议救国阵线政府控制的罗马尼亚电视台“取消反对派广播的时间以及毫无道理地减少和取消匈语和德语节目的反民主措施”。

三、外资打入苏联东欧新闻媒介，控制它们的新闻报道。

如前所述，匈牙利前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党报和一些州报1990年为西德的公司所控制。1990年2月，英国罗伯特·马克斯韦尔报业集团购买了匈牙利政府报纸《匈牙利新闻报》55%的股份，从而获得该报的某些否决权。它还购买了《新闻晚报》40%的股份。而鲁珀特·默多克报业集团则获得了“独立的”《改革》周报50%的股份，从而获得为该报挑选领导和工作人员的权利。它还掌握了《今日报》50%的股份。到1991年6月，匈牙利的全国性报纸的大约70%为英国、德国、法国和奥地利的大公司全部或部分拥有。

马克斯韦尔公司1990年4月同保加利亚签订协议，将为保加利亚一些报纸提供资金。保加利亚电视委员会同“法国国际节目”广播公司达成协议，规定保加利亚电视台从1990年7月起每天播放两小时该公司的节目。

波兰政府报纸《共和国报》49%的股份已于1991年2月卖给法国埃尔桑报业集团。《华沙生活报》49%的股份为意

大利撒丁岛一家公司买走。美国投资公司在波兰开办了英文妇女杂志周刊。法国娱乐电台与波兰合办了一家自由电台。

美国1991年还拨款500万美元在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设立培训当地新闻工作者的中心以灌输西方新闻思想。

经济大权为西方掌握，办报方针也就不得不听命于西方大老板。匈牙利《改革》周刊现在经常刊登裸体女人照片以扩大销路，人们说它几乎成了匈牙利的《花花公子》。波兰《共和国报》现在大量转发埃尔桑报业集团的法国《费加罗报》的电讯，1991年2月至10月就采用了约2000条，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有关苏联的新闻。

四、对西方新闻媒介大开绿灯。

苏联东欧剧变后，西方新闻媒介在苏联东欧受到了热烈欢迎，为它们敞开了大门。它们在剧变后的苏联东欧享受到充分的“新闻自由”。

团结工会在波兰取得政权以后，1989年8月29日，曾经多年担任自由欧洲电台波兰语部主任的美籍波兰人扬·诺瓦克——耶乔兰斯基在逃离波兰45年后首次回到波兰访问，受到了热烈欢迎。团结工会议员团主席盖莱梅克在议员团欢迎他的大会上说：“他是立过大功的人”，“我们今天能在这里得归功于他”。自由欧洲电台波兰语部另一负责人、曾被波兰统一工人党政府的法庭以叛国罪判处死刑的爱德华·纳伊德尔也受到团结工会赞扬。“美国之音”在华沙建立了它

在东欧的第一个记者站。

在苏联“8·19事件”以后，叶利钦于1991年8月27日发布命令，准许自由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在莫斯科设办事处，在俄罗斯境内设记者站，确保他们在俄罗斯境内“自由从事新闻工作”，作为对它们报道俄罗斯联邦领导人“在苏联政变期间的活动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的酬谢。10月10日又批准英国广播公司（BBC）俄语节目在莫斯科直接播音，开创了西方电台在苏直接播音的先例。由于“反共倾向”曾在苏联“大受谴责”的美国《读者文摘》1991年7月也开始在苏联发行俄文版。

1991年4月，美国《花花公子》杂志在捷克斯洛伐克发行了捷克斯洛伐克版。同月“美国之音”获准在保加利亚播音，成为在保加利亚播音的第一家西方电台。

自由欧洲电台1991年还在罗马尼亚开设了办事处并出版《这里是自由欧洲电台》杂志。

西方出版的报刊进入苏联东欧，过去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在剧变以后，这些限制取消，西方报刊充斥于苏联东欧报摊。

自由欧洲电台罗马尼亚语部主任尼古拉·斯特罗埃斯库——斯滕尼什瓦拉1991年8月31日对《自由罗马尼亚报》谈话透露，美国领导和舆论认为，自由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使命已经完成并带来成果”，“在某一时候，其存在的必要性将减少”。得知这一情况后，“匈牙利总统、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和波兰总统本人亲自过问，他们向美国当局，包括

向布什总统提出，要求让这个电台继续开展活动”，“直到（他们在）国内的新闻地位得到巩固和民主化条件足以稳定”之时。

不容忽视的教训

新闻媒介在苏联东欧剧变中所起的恶劣作用，的确令人触目惊心。我们应当从中吸取一些必要的教训。

毛泽东1962年9月24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作报告时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西方和社会主义国家内的所谓“民主派”为了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回资本主义，总要先通过舆论工具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散布西方的资产阶级价值观，把人们的思想搞乱，然后夺取政权。为了防止“和平演变”，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搞上去。为了保证新闻工作能坚定不移地宣传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为这个中心服务，在新闻事业方面，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一、新闻工作必须牢牢地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坚持党性原则、政府与人民的喉舌性质。

决不能让那些所谓的“民主派”打着公开性、舆论多元化、私人办报、新闻自由等等旗号把舆论阵地夺过去，散布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搞乱人们的思想。

二、必须培养出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实于社会

主义事业、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新闻观的新闻工作者队伍。

我们的新闻工作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不是一般的谋生的职业岗位。我们的记者、编辑首先应当是社会主义革命战士。只有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才能搞好我们的新闻工作。具有反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同我们的新闻思想格格不入，不仅不能搞好我们的新闻工作，相反，遇到一定的气候会起破坏作用。西方几十年前曾经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工作者也是如此。他们千方百计在社会主义国家培养出具有资产阶级价值观和新闻观的新闻工作者。我们决不能让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的新闻队伍，要时刻注意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新闻观对我们新闻队伍的影响。

捷克斯洛伐克剧变后担任捷克和摩拉维亚记协主席的“民主派”老记者克拉萨说，他们“为重新获得新闻自由一直等了半个世纪”，早在剧变以前，他们“一直准备培养新一代记者取代共产党记者”。这些“民主派”是十分懂得争夺年轻一代新闻工作者的。

1990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为了扭转《消息报》的错误舆论导向，撤换了该报总编辑。而新任总编辑却遭到该报记者、编辑的抵制。《莫斯科新闻》报道说，这些记者、编辑“尝过了自由的滋味”，不愿意再听命于共产党了。这说明，如果一个新闻单位的记者、编辑多数成了资产阶级思想和新闻观的俘虏，要扭转都很困难。

三、新闻单位的领导必须掌握在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手中。

对于一个单位来说，领导是起关键作用的。只有坚强的马列主义的领导，才能保证这个新闻单位正确的舆论导向。特别要防止那些口称要完善社会主义，而思想深处是主张西方式民主和资产阶级新闻观的人，被提拔到新闻单位的领导岗位上。这些人在时机成熟时就会公开站出来利用自己掌握的舆论工具散布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为西方的“和平演变”效劳。80年代初，亲团结工会的记者攫取了记协领导岗位，记协开始为团结工会服务。1981年底波兰全国军管后，此记协被停止活动。1989年圆桌会议后，他们又恢复了组织，为团结工会摇旗呐喊，攻击统一工人党和社会主义，为团结工会在选举中获胜出了大力。这些情况值得人们深思。

四、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方向下的新闻改革。苏联东欧新闻事业曾经长期注意坚持党性原则并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过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存在某些弊病，如生硬宣传、报道中的片面性、报喜不报忧、写作形式呆板等等，影响了宣传效果。因此必须进行有助于完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改革。剧变前的一段时期，有的国家受到反对派的压力，在新闻改革中放弃社会主义方向，有的坚持不改革。两者的后果都不好。这也是一个值得记取的教训。

认真吸取苏联东欧剧变的教训，坚持新闻工作的正确方向，我们的新闻事业就可以为巩固社会主义、挫败西方的和平演变图谋作出自己的贡献。

注1：杜勒斯《在美国国会的证词》（1953年1月15日）

注2：杜勒斯《战争或和平》（1950年）

- 注3：转引自肯尼迪《在美国参议院的讲话》（1957年8月21日）
- 注4：肯尼迪《在美国参议院的讲话》（1957年8月21日）
- 注5：肯尼迪《在威斯康星州普拉斯基纪念日宴会上的讲话》（1959年10月17日）
- 注6：杜勒斯《在美国国会的证词》（1953年1月15日）
- 注7：艾森豪威尔《缔造和平》（1956—1961年）
- 注8：尼克松《真正的战争》（1980年5月）
- 注9：尼克松《与苏联竞争的六种办法》（1988年3月13日）
- 注10：尼克松《必须使东欧获得自由》（1988年8月28日）
- 注11：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1988年）
- 注12：肯尼迪《在美国参议院的讲话》（1957年8月21日）
- 注13：腊斯克《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演说》（1964年3月14日）
- 注14：尼克松《真正的和平》（1984年）
- 注15：尼克松《真正的战争》（1980年5月）
- 注16：艾森豪威尔《缔造和平》（1956—1961年）
- 注17：肯尼迪《在威斯康星州普拉斯基纪念日宴会上的讲话》（1959年10月17日）
- 注18：肯尼迪《在美国参议院的讲话》（1957年8月21日）

日)

- 注19: 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形态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1984年12月10—11日)
- 注20: 戈尔巴乔夫《苏共二十七大政治报告》(1986年
2月25日)
- 注21: 戈尔巴乔夫《在视察莫斯科曙光工业贸易制鞋联
合公司时的讲话》(1988年7月27日)
- 注22: 戈尔巴乔夫《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党组织积极
分子会议上的讲话》(1986年7月31日)
- 注23: 戈尔巴乔夫《苏共中央全会闭幕词》(1987年1
月28日)
- 注24: 戈尔巴乔夫《会见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的积极
分子时的讲话》(1986年9月16日)
- 注25: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1987年)
- 注26: 雅鲁泽尔斯基《在议会发表的讲话》(1982年10
月9日)
- 注27: 雅鲁泽尔斯基《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上的
讲话》(1983年5月31日)
- 注28: 雅鲁泽尔斯基《在第二次思想理论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1985年11月28日)
- 注29: 格罗斯《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全会的报
告》(1989年2月11日)
- 注30: 格罗斯《对南通社记者谈话》(1989年2月28日)
- 注31: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闭幕

会议上的讲话》（1988年7月1日）

注32：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88年6月28日）

注33：雅鲁泽尔斯基《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上的讲话》（1983年10月15日）

注34：雅鲁泽尔斯基《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十大上的报告》（1986年6月29日）

注35：见苏联《真理报》1990年3月16日

注36：见苏联《真理报》1990年6月20日

注37：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88年6月28日）

注38：戈尔巴乔夫《答意共〈团结报〉记者问》（1987年5月18日）

注39：戈尔巴乔夫《对苏联中央电视台谈话》（1988年9月15日）

注40：戈尔巴乔夫《在各级党组织第一书记会议上的报告》（1989年7月18日）

注41：雅鲁泽尔斯基《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上的讲话》（1987年5月23日）

注42：雅鲁泽尔斯基《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上的讲话》（1987年12月15日）

注43：雅鲁泽尔斯基《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十大上的报告》（1986年6月29日）

（写于1991年12月）

苏联新闻媒介的演变简介

宋立芳 高文生

“8·19事件”加速了苏联政局的剧变，苏共全面解体，15个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整个苏联全部瓦解。这是苏联自1917年十月革命74年来遭受的最严重的挫折。苏联政局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中重要的舆论阵地——苏联新闻媒介也必然发生剧烈的变化，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我们想把苏联新闻媒介的变化分为两个阶段来介绍。

第一阶段：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 至1991年8月19日

戈氏上台，“公开性”走红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4月召开了苏共中央全会。这次大会为苏联国家生活各个领域的改革奠定了基础。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正式确立了以改革为主调

的方针。为全面推行改革路线，戈尔巴乔夫十分重视新闻媒介的作用。他多次会见报纸、电台、电视台和各级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多次提出“公开性”的原则。因而“公开性”成了苏联新闻舆论工作中一个极为响亮的口号，成了苏联新闻界改革指导思想的核心内容。何为“公开性”？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说法就是：“让人民知道一切”，“消除不受批评的禁区”。

“公开性”原则的贯彻实施使苏联新闻界发生了巨大变化。

苏联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创建了与此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新闻体制。苏联的新闻事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成为名列前茅的“新闻业发展大国”。据1989年统计，苏联出版8000种报纸，期发行量达500多亿份；有55种各民族文字的期刊5300多种，发行量为32亿册；广播电台170座，用70多种语言播音，日播音量达1000个小时；全苏统一的电视网包括117个电视中心；除中央电视台外，各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地方电视台，播放14套各类节目，昼夜工作达178个小时以上。全苏有10多万名记者和600万业余通讯员。每个家庭平均订阅6份报刊。

在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苏联新闻界和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一样有过光辉的业绩。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在列宁的领导下苏联报刊为巩固苏维埃政权、捍卫革命成果、揭露国内外敌人的阴谋活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斯大林领导下，在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在完成各个五年计划的斗争中，新闻舆论工具大

力讴歌先进人物，为社会主义建设大唱赞歌，为苏联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谱写了许多篇章。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报刊、广播成为动员人民、鼓舞人民奋起保卫祖国，粉碎德国法西斯猖狂进攻的强大武器。战后，在恢复国民经济、保卫世界和平，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新闻媒介都取得了卓著的成绩。

任何国家的新闻事业总是和本国的经济发展及社会政治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苏联自进入70年代后，经济停滞不前，国际国内都遇到许多困难。新闻界一段时间以来也处于“停滞”状态，出现了不少问题。各种新闻媒介报道内容基本雷同、枯燥乏味、冗长，千篇一律，缺乏各自的特色。而且往往报喜不报忧。新闻媒介经费主要靠国家财政支付，纸张定额分配供应，经营好坏不受经济法则的制约。

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原则作为新闻改革的口号。这一原则的贯彻和实施，使苏联新闻界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少新闻媒介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先锋”，有的则在“公开性”旗号下以造谣、歪曲事实的手段反共反社会主义。

苏联新闻界的变化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在政策上放松了对新闻界的控制，增强了各新闻机构的自主权，报刊的总编辑可以独立自主地处理有关问题。放宽了对新闻出版界的审查，除有关国家机密和军事机密之外，其它一切均由报刊、电台、电视台和出版机构的总编辑自行处理。

2、长期以来新闻界呼吁制定的《新闻出版法》于1990

年6月正式通过。该法把社会和新闻界相互关系问题提到法制的基础上，使公开性、私人办报等具有正式的法律地位。

3、出现了“舆论多元化”的局面。各种媒介之间激烈竞争，抢新闻、争夺读者。报道内容、时效、形式、题材等方面都较前有很大不同。报刊、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介扩大了报道范围，冲破了许多“禁区”，大量“揭露”社会各种问题，大量刊载各种耸人听闻的新闻乃至各种谣言、谎言。与过去相比，各种报刊的发行量明显增加，广播和电视播放的内容多种多样。

“公开性”把新闻媒介和群众思想引入歧途

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以后，各种思潮大量涌现，出现了“民主无边”、“公开性无际”的严重局面。苏共对舆论导向的失控，使苏联新闻界走入歧途。在“历史无空白”、“现实无禁区”、“让人民知道一切”等口号的引导下，各种新闻媒介竞相抢发历史性资料，似乎在比赛谁“揭露”历史黑暗面（有不少是无中生有，造谣歪曲）最多，鞭答时弊（有不少是借此攻击社会主义）最猛烈，谁的用辞最尖刻，谁披露的鲜为人知的事实（有不少是恶意编造的谎言）最多。一些反共报刊气焰嚣张。而党的报刊面对这种情况却无所作为，节节退让，有的甚至同流合污。它们对苏共70多年的历史逐一加以否定，对苏共各个时期的领导人都加以丑化。肃反、农业集体化、工业化都受到批判，甚至十月

革命的成果也被否定。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历届领导人均遭到谴责。它们借口“非斯大林化”把矛头指向列宁，掀起了反对列宁主义的思潮。而苏联新闻媒介在“历史无空白”的口号下对苏联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全面否定，必然使人们对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正确产生怀疑，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发生动摇。

苏联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大众舆论工具中充斥对社会黑暗面揭露，在广大读者中起了很坏的作用。什么民族冲突、克格勃活动内幕、军队里的反常官兵关系以及犯罪行为、色情、卖淫现象、同性恋、青年人吸毒现象、精神病院和监狱情况，什么不明飞行物、相术和魔法，对宗教生活的美化，等等，种类五花八门、乌七八糟的东西跃然纸上和荧屏上。新闻媒介披露的触目惊心、出乎人们预料的丑恶现象，使苏联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和损害。

苏联各种新闻媒介还把党的干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说成是“反对改革的保守势力”，导致党的威信下降，各级党政领导人承受巨大压力而无法开展工作。有些“激进”的报刊却把民族主义分子、反共反人民的野心家吹捧成改革的先锋，造成人们思想极度混乱。

苏联军队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在保卫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社会主义建设，捍卫无产阶级政权的斗争中有着光辉的业绩。苏联军队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军事职业曾是多少青年向往和追求的理想和目标。然而，自戈尔巴乔夫推行以

“公开性”、“民主化”为标志的政治改革以来，在“报道无禁区”的叫喊声中，军队也成为新闻舆论攻击的众矢之的。有的报刊把军队说成是“保守势力的老巢”，是“一切教条主义和反对民主的根源”，“苏联与其他国家关系紧张的罪魁”等等。报刊热衷于揭露军内的腐败现象、军官特权、军内的犯罪状况等耸人听闻的事件，散布一些无中生有的谎话、捕风捉影的谣言。舆论工具对军队的大力诋毁，影响了军队的威信，破坏了军民关系，动摇了官兵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在舆论工具的煽动下，反军乱军活动日益猖獗，军心日益涣散。

面对这种局面，苏共也感到问题的严重性。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关于苏共舆论工具决议》指出：“党的报刊改革的速度和深度不是在所有方面都符合社会发生的变化，它们落后于事态的发展，丧失战斗性，有时在反社会主义势力和反改革势力的猖狂进攻面前丧失原则。”然而，苏共处在作为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的影响下，从中央到地方均表现得软弱无力，均在复杂的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党报和党刊的版面仍被用来刊登歪曲苏维埃国家过去历史、歪曲党和人民为国家独立和自由所进行的英勇斗争的材料。对那些侵犯人民的精神财富和道德财富、侵害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传统、侵害对苏联军队和执法机关尊严的人没有给予应有的反击。

1990年8月正式生效的《苏联新闻出版法》中规定：“保证公民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这意味着以任何形式，包

括通过报刊和其他舆论工具发表意见和见解，寻找、选择、获得和传播信息的权利”；国家机关、政党、各种团体和年满18岁的苏联公民都有“创办舆论工具的权利”等等。新闻法的实施越发加剧了形势的急剧变化，各种私人报刊和各种党派团体的报刊纷纷涌现。这些报刊往往具有反政府的性质。报刊等舆论工具是影响人们思想与情绪的强大手段，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阵地。毛泽东同志在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曾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造成舆论，总是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苏联新闻界的状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论断是正确的。苏联的一些政客和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把新闻法当盾牌和护身符，左右了舆论工具的政治方向，为他们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夺取政权制造了舆论准备。

苏联在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的鼓噪声中派别林立，各种政治力量展开了激烈的夺权斗争。早在一年多前，据苏联经济研究所的统计，在苏联有近6万个“反对派”组织。据“国际文传电讯”发表的有关材料，仅乌克兰就有“非正式组织”近万个。苏联约有5%的居民参加“非正式组织”的活动。莫斯科有各种政党15个。这些政党大都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它们非常懂得舆论工具的重要，他们以《新闻出版法》为挡箭牌，办了近千种“非正式”出版物拼命争夺舆论宣传阵地。当时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的报纸、电台、电视台几乎全被反对派所控制。一些西方国家提供大量援助为反对派建立出版基地，赠送先进的通讯设备，为他们出资办报，用高薪收买人心。在他们创办的报刊上反共反社会主

义成为“时髦”，他们频繁举行反共示威集会、游行，挑动工人进行政治罢工，肆无忌惮地攻击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逼迫共产党下台，交出政权。1991年2月围绕全民公决的问题，“民主派”利用《莫斯科新闻》、《自鸣钟报》、《俄罗斯报》和《共青团真理报》为反对这次公决摇旗呐喊。在外地，反对派利用外国给的钱成批买下若干天或整月的苏共报纸，然后付之一炬。在咄咄逼人的攻势下，苏共不但不予还击，反而节节退让、放弃舆论阵地，

苏共传统派在1991年“8·19事件”中遭到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几年来苏联新闻界发生的变化，它们散布的谎言、谣言和抹黑社会主义的所谓揭露性新闻使群众思想混乱，不少人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则是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的教训是十分沉痛的。

第二阶段：“8·19事件”之后至独联体成立

在“8·19事件”之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停止共产党活动，对新闻媒介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他违反宪法和一年半以前在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新闻出版法》，以“积极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非法活动”和宣传旨在推翻宪法制度的行动，进行“新闻误导”的罪名擅自发布总统命令，罢免塔斯社社长斯皮里多诺夫和新闻社社长弗拉索夫的职务，并下令《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工人论坛报》、《莫斯科真理报》、《列宁旗帜报》和《公开性》暂时停止发

行。他还宣布把俄罗斯领土上的数百家共产党的印刷厂和出版社以及新闻社收归国有。为了推行他的政治路线，9月12日又发布关于“保护”俄罗斯出版自由措施的命令，成立联邦新闻出版部下设的保护新闻出版自由的国家检查机构，让俄罗斯部长会议在10天内通过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条件下“保护”新闻出版事业的措施和解决由该总统令会产生的其他一些问题。在俄罗斯共和国内，又起草了“保障新闻出版和其他舆论工具自由法”草案。显而易见，叶利钦这些做法的实质是企图由俄罗斯联邦垄断全联盟的新闻舆论工具。

在这以后，苏联新闻媒介发生了更加剧烈的变化。

苏联最有代表性的几家新闻单位目前的状况就是最好的说明。

塔斯社：“8·19事件”之后，戈尔巴乔夫首先任命维塔利·伊格纳坚科为社长。新社长把原国内新闻总编辑部、国外新闻总编辑部、社会主义国家新闻总编辑部、对外新闻总编辑部、图片新闻部改成现在的：社会经济、政治理论和时评、科学和人文、对外政策四个编辑部。干部实行合同制，经济上自负盈亏。塔斯社的政治观察家和记者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不必同官方的观点相吻合”，可以“自由报道事实和与健康思维为基础的消息”。

《真理报》由苏共中央机关报改为一般性政治报纸。1991年8月23日叶利钦以“积极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非法活动”罪名勒令它停刊。这是该报自苏联成立70多年来的第一次停刊。它在1941年苏卫国战争最艰难的时期都没停止过

出版。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1991年8月31日它又重新登记出版。复刊后，尽管报头上保存了“本报1912年5月5日根据弗·列宁的倡议创办”的字样，但读者在第一版上再也看不到象征劳动人民的铁锤和镰刀、报头左边的列宁头像、右上角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及刊头下“苏共中央机关报”的字样了。它的办报方针强调“成为公民和和睦的报纸、坚持中派立场、支持民主改革”。不论是骇人听闻的消息，还是日常生活中的禁题都可以报道。原由前苏共政治局委员弗洛罗夫担任的总编辑职务，现由原第一副总编辑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取代。篇幅已由6—8版改为4—6版。

《真理报》社约有员工420人，预计今后约有100人可被重新聘用。原派驻国外的约40名记者已减少至30名。由于缺乏外汇，预计将会减至12人。

从1991年9月份起《真理报》开始征订广告。例如9月23日的头版刊登的一则广告是一份自称为《西方快报》的新出版物。广告说，读者只要花33卢布60戈比（按黑市汇率不足1美元）就能得到12期刊物，每期保证有“至少100个外国人的通讯地址，这些通讯地址分为商业、嗜好、交际和婚姻等类”。合众国际社驻莫斯科记者在报道此消息时说，

《真理报》今天在头版刊登一则广告，向俄国介绍西方的希望之乡，把西方的工作、婚姻和最新的好莱坞色情丑闻展现在俄国人面前。

原隶属苏联部长会议领导的新闻社，曾于1990年7月被

戈尔巴乔夫授命变成一个“作为民主媒介使用的、公布苏联的国内和对外政策的新闻通讯社”。9月份俄联邦政府决定将其与俄罗斯通讯社合并，由俄罗斯联邦新闻部管辖，更名为俄罗斯新闻社。原社长阿尔伯特·弗拉索夫被解职，由原俄通社负责人安德烈·维诺格拉多夫担任。

《消息报》亦发生重大变动，由最高苏维埃机关报变为独立的报纸。原主编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菲莫夫被解雇，由伊戈尔·戈连姆比奥夫斯基接任。

在“8·19事件”中被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布命令，临时停止出版的《工人论坛报》8月28日在内外舆论强大压力下复刊。复刊后由“劳动人民社会保护报”改为“劳动人民社会保护全苏独立报”。但主办者已由苏共中央改为该报新闻工作者同仁。编委重新改选。编辑部称，它将尽力把报纸办成对劳动人民实行社会保护的、发扬和捍卫每个人与劳动集体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全民论坛。

原苏共莫斯科市委机关报《莫斯科真理报》改为“社会政治”日报。总编辑易主，宗旨和任务是“及时、客观地报道市内、国内和世界上的事态，捍卫市民社会和公民权”。该报主办者已由苏共莫斯科市委改为编辑部职工。

莫斯科州委、州苏维埃机关报《列宁旗帜报》改为《莫斯科地区人民报》。主办者已由苏共莫斯科州委改为编辑部职工和“俄罗斯”合作社。其办报方针为“自由、客观、诚实、迅速、意见多元、忠于读者”。

苏共列宁格勒机关报《列宁格勒真理报》也随着列宁格-

勒易名为圣彼得堡而改称《圣彼得堡新闻报》。其办报宗旨是为这座名城的居民提供“各种有意义的信息”。

在被停刊的5家苏共报纸中，《苏维埃俄罗斯报》复刊最迟。这家一年前已由苏共中央机关报改为俄共报纸，在停刊10天后重新登记出版，主办者改为“编辑部工会组织和‘扎维季阿’商行职工”。

原苏共中央的政治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是苏联宣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重要刊物。杂志编辑部由比克宁和拉齐斯领导。他们创办了新杂志《自由思想》，成为“左翼民主力量的公开论坛”。

原全苏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主席列昂尼德·克拉夫琴科于8月23日被解职。8月27日戈尔巴乔夫任命原《莫斯科新闻》周刊主编叶戈尔·雅可夫列夫接替工作。《莫斯科新闻》主编由卡尔平斯基担任。现在，苏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已取掉“时代”名称，由该节目的老人马同原来因“激进”而被撤换的夜间新闻节目主持人隔周轮流主持。

作为苏联新闻工作者全国性群众组织的“新闻工作者协会”，在9月6日于莫斯科市召开的全体会议上做出决议，更名为“联盟新闻工作者联合会”。过去，它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报刊、广播、电视和新闻机构完善自己的工作，关心新闻工作者专业水平的提高，发挥他们的创作潜力，总结和推广舆论工具的优秀经验。与会者们认为，现在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使舆论工具不再成为“局势的人质”。为此，首先必须作到获得经济独立。因为“没有钱就不会有自由”。他们

通过了关于成立联合会商业银行并决定在货币和印刷服务交易所成立银行经纪人事务所。新闻工作者联合会成为莫斯科独立广播协会和苏美“独立”广播电台的创立者之一，成立了社会信息服务公司和“新闻工作者”商业服务中心。

目前，除“联盟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外，与之并存的还有“民主派新闻工作者独立协会”和“国际新闻工作者中心”。前者成立于1991年6月，宗旨是：“在莫斯科新闻工作者协会中确立真正民主的原则，不允许对持不同政见的新闻工作者施加意识形态和精神压力”。后者于1990年9月27日登记注册，其宗旨为“打破对国内民主力量的‘新闻封锁，团结进步思想的新闻工作者和实际保护他们的权利’”。后二者成立的目的是与当时在苏共影响下的“新闻工作者协会”对抗。

外国新闻媒介也乘机挤进苏联。1991年美国《商业周刊》俄文版以月刊形式在苏联出版发行，成为西方第一家在苏联出版发行的刊物。

英国广播公司（BBC）1991年10月10日成为第一个在莫斯科市播音的西方电台。俄罗斯电视台台长曾说，俄罗斯电视台和BBC双方将来有可能交换记者或联合播音，并从电台扩大到电视台。

在“8·19事件”中对支持叶利钦起了很大作用的“国际文传电讯”就是1989年9月由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与意大利、法国合办的新闻机构。

苏联新闻媒介剧变后，更加举步艰难，难有作为。各新

闻机构由国家补贴改为独立经营。由于物价上涨，纸张、通讯服务和出版印刷价格都在提价，为维持生存，报刊杂志也在涨价，许多报纸的发行量剧减。《真理报》由原1000万份跌到300万份。《消息报》也由1000万份跌到470万份。许多报刊由于没有外汇，派驻国外的记者只好调回。有的计划大大减少驻外记者的人数。《真理报》驻华盛顿一位记者在1991年11月间说：“自从8月份以来我就没领到过薪金。报社通知我不要将家具和汽车卖掉，要我坚持。但是，目前的情况的确很困难。”《消息报》为了赚钱，头版也刊登广告，一般的广告开价为51000美元，主要客户是日本、南朝鲜和德国公司。为了维护本身的生存，许多新闻单位只有减少工作人员，数万名新闻从业人员面临着失业的危险。苏联联盟崩溃，苏共全面解体，无论在政治、经济及人民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都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和矛盾。各种新闻媒介之间、各加盟共和国的新闻机构之间也同样存在着许多无法调和的矛盾和斗争。

戈尔巴乔夫1991年11月20日在对议会长达55分钟的讲话中指出，苏联工业生产将比1990年下降7%，农业生产下降9%，进出口将分别下降42%和31%，国民收入减少15%。他告诫说，苏联正走向政治、经济大灾难。面对这样的政治、经济形势，可以预见苏联新闻媒介也面临大灾难的命运。据塔斯社报道，12月20日莫斯科10家报刊总编辑，以5000万读者的名义联名抗议俄罗斯当局计划将报刊发行费强行提高5倍的做法。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会宣布，鉴于所形

成的局势，已成立罢工委员会。联合会保留“请求国际新闻界派专家深入研究事态的权力”。

苏联新闻媒介70多年前前后后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需要认真研究和思考的问题。1991年11月4日江泽民同志到新华社视察工作时指出：“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内建设和改革任务也相当繁重。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对新闻宣传战线的同志们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国内宣传方面，要引导干部群众正确地认识国际、国内形势，全面准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对外宣传方面，要全面地完整地反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正确反映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为国内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结合苏联新闻媒介的剧变，学习江泽民同志的讲话对我们新闻工作者来说显得更加重要。

（写于1991年12月）

从苏联8月事件 看新闻媒介的重要性

康家林

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1991年8月间推翻戈尔巴乔夫统治的企图失败以后，西方许多人士纷纷分析失败的原因。法新社驻华盛顿记者8月21日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分析家认为失败原因是“准备不足而且执行不当”，“军事政变领导人没有关闭机场、新闻媒介和国际新闻机构”。

紧急状态委员会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没有控制住新闻舆论工具和在此之前新闻舆论工具产生的影响，确实是重要原因之一。

一

在行动刚开始时，紧急状态委员会抓了一下新闻舆论工具。8月19日，它发出了第二号命令，暂时只允许《真理报》、《消息报》、《苏维埃俄罗斯报》、《红星报》、《劳动报》、《工人论坛报》、《农村生活报》、《莫斯科真理

报》和《列宁旗帜报》等9家报纸出版，其他中央、莫斯科市和州的报纸与政治刊物停止发行；中央电视台和塔斯社也都在控制之下。尽管如此，紧急状态委员会还是没有控制住舆论工具。主要表现是：1、为叶利钦等反共人士服务的“国际文传电讯”和“俄罗斯通讯社”等不仅没有停发消息，而且24小时昼夜工作。2、地下电台“莫斯科回声”等不停地广播，地下印刷品到处散发、传送。3、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等西方电台也不停地向苏联播音。戈尔巴乔夫8月22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被扣押期间“所有通讯被切断了，但我们竟找到了一些仍然可以使用的旧式接收器。我们可以接收到一些广播，其中英国广播电台最出色！我们收到的讯号最清晰。其他如自由电台、美国之音等也可收到”，“我要谢谢本地和国外的记者”。

“国际文传电讯”、“俄罗斯通讯社”、西方广播电台及地下传单传播的内容主要是：1、叶利钦等人的言论。它们大肆报道叶利钦8月19日在俄罗斯议会大厦的讲话。叶利钦宣称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是“非法的”，是“右翼反动反宪法政变”，所有俄罗斯人只应服从“俄罗斯的合法机构和俄罗斯总统的法令”，煽动群众不要与紧急状态委员会合作，要进行大罢工；2、大肆报道美、英、法等国领导人支持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谴责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为“非法”，威胁不给苏联经济援助；3、大肆报道莫斯科人涌上街道，“冒雨游行拥护叶利钦、戈尔巴乔夫”，阻止

军队坦克前进；等等。

苏联新闻舆论工具和西方新闻舆论工具的作用，从美国《新闻周刊》的一则报道中也可看出。这则报道说：“经过六年开放锻炼的苏联新闻记者，在这次政变时大显身手。报馆的印厂查封了，他们就用复印机复印报道，然后上街散发。莫斯科地铁站贴满了新闻传单。独立的国际文传电讯除了发自己的报道之外，还转发地下报道，甚至利用最近由一家美国公司安装的光学纤维电缆向海外发消息。‘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经过巧妙的周旋，在政变期间成功地广播了五次。”“当然，和西方的广播相比，当时苏联自己广播的力量显得十分微弱。政变期间，英国广播公司将其每天对苏广播的时间加倍延长到18小时，它还转播了被查封的‘俄罗斯电台’在俄罗斯议会大楼的现场实况报道。”苏联国内外的宣传报道大大影响和左右了群众的情绪。

二

紧急状态委员会没有成功，也与多年来戈尔巴乔夫要求苏联新闻媒介大力宣传他的“新思维”、“公开性”，搞乱了群众的思想有关。

戈尔巴乔夫自1985年3月上台以来，在苏联大力推行“新思维”，主张“公开性”，使报刊等新闻舆论工具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戈尔巴乔夫多次说，舆论工具是“实行公开性的最具有代表性和群众性的讲坛”，“报纸应当支持公开

性原则”，“应当将更多的事公诸于众”，“人们既应当知道好事，也应当知道坏事”……。1990年7月15日，戈尔巴乔夫发布命令说：“社会的民主化，主权加盟共和国和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作用的加强、政治多元化的实际形势，要求我国电视广播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国家电视和广播的职能“应该是独立于政治和社会组织的，是为我国发生的现象作客观和全面报道服务的”，命令强调不允许“任何政党、政治派别或集团对太空时间进行垄断”。

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否定了列宁开创的苏联报刊等新闻媒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性质，在苏联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媒介中产生了极大影响。《莫斯科新闻》、《共青团真理报》、《公开性》杂志、《星火》画报、《论据与事实》、《新世界》、《西伯利亚独立通讯社和新闻报道》等许多报刊，掀起了反社会主义、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它们以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为荣。就连一贯比较健康的苏联《新时代》周刊，也刊登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东方历史理论问题研究室主任列昂尼德·瓦西里耶夫教授的文章《第二次革命》，宣称什么“社会主义革命是通向东方结构的反动的社会倒退，因此反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向全人类进步方向的迈进”。他主张苏联不要向中国学习，“苏联的改革要成为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改革”。《真理报》1988年10月31日发表社论说，苏联“一些新闻机构并不总是持同党的方针相适应的原则立场”，“许多新闻工作者沉溺于揭露阴暗面，造成人们思想混乱，甚至使人们仓惶失措”。《真理报》1989

年8月26日又发表文章，抨击一些独立刊物公然依靠西方资助进行反共反苏宣传。文章说，这些独立刊物是一些非正式组织搞的地下刊物。这些刊物最近不断增加，严重影响到社会安定。若干独立经营的出版物发动了“强求式的反共和反苏维埃政权观点的宣传”。这些宣传常被那些与苏联敌对的外国电台转播。

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许多坚持马列主义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闻单位的负责人被撤换。中国老新闻工作者代表团1990年访苏时被告知，列宁格勒市记协的领导班子全更换了。现在的领导权掌握在持民主纲领派观点的人手中。该市记协的一位书记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取消党对报刊的垄断。任何领域中的垄断都会导致衰退。”他强调“用人就是要用有新思维能力的人”。《真理报》总编辑维克托·阿法纳西耶夫因“《真理报》思想保守，一直跟不上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公开性”，于1989年10月19日被解除职务。接替他的是戈尔巴乔夫的顾问伊万·T·弗罗洛夫。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苏联议会于1990年6月12日通过了新闻出版法（于同年8月1日开始生效）。塔斯社报道说，这一法律文件规定“年满18周岁的任何苏联公民，都有权创办舆论工具”，“不允许对舆论进行新闻检查”，这一出版法是“苏维埃国家历史上第一个包含保障新闻出版自由和新闻工作者权利的详细内容的法律文件”。可以看出，这一新闻出版法规定只要18周岁以上的苏联公民，不管他是否反共反社会主义，都可以办报，并不受任何限制。这样，实际上使

各种私人的、反动的新闻媒介的出现有了法律保证。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早就对苏联推行和平演变的阴谋，利用新闻传播媒介工具，尤其是广播电台，造谣惑众，攻击苏联共产党的成就和社会主义制度，渲染和夸大苏联的困难，攻击社会主义“失败”、“破产”，宣扬西方资产阶级人生观和价值观及资本主义的“活力”和“优越性”，企图“在瓦解人心的基础上争取人心”。美国政府花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经营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对苏联进行广播。仅自由电台就每天用12种语言向苏联广播，苏联听众达2250万人。近年来，美国的新闻媒介也开始直接打入苏联。1990年7月19日，美国杂志《商业周刊》俄文版在苏联出版发行。合众国际社报道说，“这是首次在苏联出版的西方杂志”，“它将自由地发行至5万名苏联商务领导人”，“相信苏联新生的资本家渴望了解来自西方的这本杂志”。

西方世界对反对社会主义、鼓吹自由化的苏联媒介和人士给予种种鼓励和奖赏。1990年6月12日，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报业出版者联合会将1989年自由金笔奖授予苏联独立杂志《公开性》创刊人兼出版者谢尔盖·格里戈扬茨。国际报业出版者联合会在此之前发表公报说：“47岁的格里戈扬茨是最早支持开放政策的。他曾为自己的信念而在苏联劳动集中营度过了八个年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推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搞乱了苏联新闻舆论界的思想，西方新闻

媒介的影响更加助长了苏联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而新闻媒介的自由化思潮，又维护了叶利钦等人的统治。难怪戈尔巴乔夫在紧急状态委员会失势后的8月22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过去六年改革没有白费”，“我们的确已经进步了”。不过，他在这里指的“改革”，是从社会主义改向资本主义；他所说的“进步”应该说是倒退。

三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得手后，十分重视抓新闻舆论工具。他们打击、排斥倾向苏联共产党和传统观念强的报刊、广播、电视和新闻界人士，安插、培植自由化人士和自己的亲信。在这方面，叶利钦表现尤为突出。叶利钦接连发布命令，罢免一些传播机构的领导人，把这些机构掌握在自己手中。8月21日，他解除了中央电视台领导人的职务，由俄罗斯政府接管。22日，他撤销塔斯社和苏联新闻社两社社长的职务，指责这两个通讯社播发“虚假”消息，责成俄罗斯政府提出改组塔斯社的建议，下令把新闻社和俄罗斯境内的苏联共产党的出版社和印刷厂均划归俄罗斯新闻出版部领导。23日，他勒令《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开放报》、《工人论坛报》、《莫斯科真理报》和《列宁旗帜报》六家共产党的报纸停刊，并没收它们在俄罗斯领土上的财产。24日，他命令把俄罗斯境内的一切政府联络形式（电话联络、传真联络、密码联络）转交俄罗斯联邦克格勃管

辖；把位于俄罗斯联邦境内，包括在莫斯科市的联盟所属的邮电企业转交俄罗斯联邦邮电、信息技术和航天部管辖。这些命令和措施，均得到戈尔巴乔夫的认可。俄罗斯联邦是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势力最强、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共和国。作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的叶利钦，通过以上命令和措施，进一步掌握了苏联许多舆论工具，使它们更驯服地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这对坚持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苏联进步力量是一个沉重打击。

在叶利钦等人的高压下，《真理报》在8月24日没有出版。该报的一位编辑说，这是自从俄国革命以来，该党报首次停刊。他说：“即使在1941年，法西斯分子在莫斯科大门时，《真理报》也没有停刊过。”《真理报》虽然于8月31日重新出版了，但由苏共中央机关报改成为“公民和陆报”，原有的列宁像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也取消了。目前，《真理报》处境十分艰难，面临经济崩溃，现已亏空1.77亿卢布（相当200万美元）。而更为严重的是，俄罗斯当局打算关闭它。《真理报》副总编辑弗拉基米尔·古伯尔耶夫最近说，俄罗斯政府切断了《真理报》办公室的电话线和电源，企图把《真理报》赶出去。他还说：“以前属于《真理报》的一切东西现在都属于俄罗斯新闻出版部的了。”苏联共产党的其他一些报纸的性质也进一步发生变化。例如，苏共莫斯科州委、莫斯科州苏维埃的机关报《列宁旗帜报》，改成了《莫斯科地区人民报》；《列宁格勒真理报》改成了《圣彼得堡新闻报》；俄罗斯共产党中央机关

报《苏维埃俄罗斯报》，改成了《独立人民报》。

香港《明报》8月26日发表社论说：“现在（苏联）共产党失却了报纸、电视、广播等传播工具，叶利钦使出‘即以其人之道，还施其人之身’的‘还施神功’，共产党便成为哑巴党了。”

四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凡是要推翻的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苏联发生的情况告诉我们，夺取政权的时候，要紧紧地依靠和掌握新闻舆论工具，要抓紧笔杆子；巩固政权的时候，也要紧紧地依靠和掌握笔杆子。

从苏联的现实中，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应吸取深刻的教训。我们应更好地坚持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更好地宣传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坚定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要警惕和抵制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阴谋，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待西方的新闻传播媒介；要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和群众血肉相联，自觉地做好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尽管是曲折的、复杂的，但它的总趋势是向前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任何势力想扭转这一发展方向均是徒劳的。苏联的前途也必然是光明的。就连为八月事件感到欢

欣鼓舞的一些西方报刊也认为，苏联“很多人仍然相信共产主义”，“他们的信仰不可能很快消失。”

（写于1991年11月）

“8·19事件”与 西方广播新闻媒介

梁 关

1991年8月19日凌晨6时08分，塔斯社发表了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发布的命令：从即日起由他接替戈尔巴乔夫的总统全权，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并在苏联某些地方实行半年紧急状态。但是，3天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使国家和社会尽快摆脱危机”的企图遭到失败。

这一事件成为各国新闻媒介报道的热点。西方广播新闻媒介更是使出浑身解数，配合西方政府，开展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宣传攻势，企图通过广播这一渠道，对苏施加影响。

英国广播公司(BBC)电台从20日开始，每天从早6时45分到中午12时35分用6种频率不间断地对苏播音，并在这段时间增播15分钟的苏联消息。每周播音时间由46.5小时增加到125个小时。它还每天出俄文版号外。BBC广播电台俄文部主任说：“苏联人都知道，不管对苏国内新闻进行什么样的控制，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听到BBC提供的消息。”尽管全天增加这么大的播音量是非常困难的，但BBC国际部主任约翰·杜萨在一项声明中说，“事件要求我们这样做，这

是特殊形势下一种例外。”合众国际社记者直言不讳地报道说：“英国广播公司加倍对苏广播，以此作为对反对推翻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未遂政变的回答。”

美国之音、自由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自戈尔巴乔夫上台推行“公开性”政策后不再受到苏联的干扰。西方记者在外电中炫耀：在全苏，收听这几家电台广播的听众大约有2500—3000万人。

“8·19事件”中，美国之音调整了整个俄语广播中的所有文化和娱乐节目，其内容全部集中到改播苏联最新消息、背景报道、苏联问题专家答记者问、关于苏联政府的变化可能导致的后果的分析等。每天俄语播音为14个小时。除俄语外，还用乌克兰、阿塞拜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乌兹别克等语言播发新闻。除新闻报道外，还大量播发反映美国官方政策的社论、述评、文章，谴责推翻戈尔巴乔夫的“违宪政变”，呼吁帮助戈尔巴乔夫重新执政。紧急状态委员会虽然注意控制苏联部分新闻媒介，但并没有对外界的广播采取任何干扰措施。因此，美国的俄语和苏联各共和国的其他语种的广播未受干扰。美联社记者鲁思·塞奈报道，美国之音发言人乔·奥康奈尔说，在苏联，人们通常通过美国之音和BBC国际台播发的节目证实“他们听到的消息”。《华尔街日报》记者说，美国利用“美国之音”向苏联转播叶利钦的讲话和布什支持叶的讲话，这使叶和布什有了一个向俄罗斯人民发表讲话的重要工具。

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是美国设在欧洲的两个反共电台。“8·19事件”自然成为这两家电台的报道热点。美联社记者在德国法兰克福对自由电台主任安德鲁斯·温布什进行采访。他报道说，安德鲁斯一方面为“数十年来受到共产党当局干扰和漫骂”不满，一方面为“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政策给予这两家由美国政府在慕尼黑建立的广播电台机会，使他们毫无顾忌地干工作”而感到欢欣鼓舞。

自由电台每天24小时用俄语和其他苏联语言广播，自由欧洲电台对东欧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进行播音。自由电台对“8·19事件”当日实况就播送了7个小时，而通常它只播1个小时。该台记者说，包围俄罗斯共和国议会的士兵们也在收听自由电台的广播。自由欧洲电台主任加里·撒切尔说，他的记者一直与波罗的海共和国议会独立发言的领导人接触。他还称，自由欧洲电台是“接近人民的唯一渠道”。该台还在波兰增加了俄语新闻电讯，向在波兰海滨度假的数以千计的苏联旅游者播音。在捷克斯洛伐克，当局给自由欧洲电台无线电波段以扩大它的节目影响。

据外电报道，在挪威首都奥斯陆，还有一家由苏联人建立的独立电台roks向苏联国内播音。

事实证明，西方新闻广播媒介加强对苏广播战的目的是利用苏局势复杂、斗争激烈、时间紧迫这一特点，大量传播西方政府的观点和立场，影响苏联国内人民的思想情绪，左右舆论导向。西方舆论工具的这些活动对亚纳耶夫等人的失败起了重要作用。

苏联记协改变性质

高向明

成立于1959年的苏联新闻工作者协会原是一个具有权威性的群众组织，与世界上80多个国家的新闻机构有交往，国内各共和国都有分支组织，在国内外享有一定的影响和声誉。仅1989年1年，苏联记协就接待来访的和组织出访的新闻工作者各500多人。

30年来，苏联记协的工作一直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可是，现在它的性质在发生变化。苏联记协第一副书记朱波可夫在会见应邀访苏的中国老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说，今后苏共与记协只是“伙伴关系”，记协对党的指示可听可不听。“记协要非意识形态化、非政治化，记协的会员不一定都信仰马列主义，要团结具有各种思想观点的新闻工作者。”

朱波可夫接着说：“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既已消失，记协就成为独立的、不依靠任何政治力量的组织，具有联合会性质，具有像工会一样带有专业性的组织。”今后党和政府定期向记者通报消息，介绍情况，这就需要建立许多新闻中

心。记协要保护新闻工作者的合法权益，在他们当中寻求互相谅解、互相妥协、互相让步。

朱波可夫还谈到今后记协的管理要实现民主化。他说，过去记协的领导成员都是由各报负责人中选出来的，都是兼职；今后记协领导成员要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普通记者只要当选，也可以担任记协领导，今后不再兼职，改为专职。1990年8月初就要召开全苏新闻工作者代表大会，届时将对苏联记协的性质、体制、组织原则、今后工作等作出明确规定，各级领导班子也将有大的变动。

代表团访问过的列宁格勒市记协的领导班子近年全更换了。现在的领导权掌握在持民主纲领派观点的人手中。该市记协一位书记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取消党对报刊的垄断”。他强调“用人就是要用有新思维能力的人”。

由于搞所谓的“公开性”，民主化搞过了头，对过去否定太多，加上党管不了报纸，因此报刊处于失控状况。人们思想混乱，什么话都敢说，报刊什么文章都敢登，乌七八糟，无奇不有，甚至低级趣味、淫秽黄色的东西也出现在报刊上。现在苏联最激进的报刊是《共青团真理报》、《莫斯科新闻》、《星火》杂志、《论据与事实》等。《论据与事实》原是一家小报，发行几十万份，由于迎合读者兴趣，不断刊登一些内幕新闻，发行一下子上升到3000万份。

现在苏党中央意识形态部只能通过熟人关系转告报纸应该刊登什么材料。“天安门事件”一周年前，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就向苏联新闻机构打了招呼，不要刊登支持中国学生反

对政府的材料。但苏联中央电视台、《共青团真理报》等还是发表了莫斯科大学生绝食声援中国学生的报道。面对既成的事实，意识形态部只好电话批评，但无权处分这些单位的有关人员。他们只能提出建议，刊登正面材料以抵消影响。

争夺舆论阵地的斗争，目前在苏联是相当激烈的。持民主纲领派观点的列宁格勒州公开性 5 人小组负责人扬言，他们“不仅要在政治上、经济上摆脱全苏的控制，还要打破苏共对舆论的垄断”。电视台每天须给他们10分钟安排节目。莫斯科市苏维埃也与苏共莫斯科市委争夺《莫斯科真理报》为其独家机关报。原来这家报纸是莫斯科市苏维埃和市委两家的机关报。

（写于1990年7月）

东欧新闻媒介演变浅析

宋立芳

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六国，自1989年下半年以来变化迅速，形势严峻，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媒介在东欧各国的演变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同时，作为反映政局剧变的温度计，东欧新闻媒介的变化尤为明显。东欧新闻媒介的剧烈变化是有其内在和外部原因的。

西方“和平演变”策略的影响

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后，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和发展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长期以来，国际反动势力一直把推翻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他们的既定战略目标。西方国家一直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侵略、干涉、颠覆和渗透。在以对抗为特征的冷战时期，它们试图通过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等手段遏制和困死社会主义，但也未能阻挡住社会主义发展及其影响的扩大。于是，他们改变了策略，

一方面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压力，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而另一方面更多的是强调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他们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格外关注。

50年代初，杜勒斯在美国国会的证词中就鼓吹“必须时刻记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被奴役人民的解放问题”，他主张用“和平的方法”达到这一目的。艾森豪威尔曾说过，“在宣传上花1美元，（其功效）等于在国防上花5美元”。肯尼迪50年代末亦说，“只有通过和平的转变，东欧才能得到自由”。基辛格曾说，一座电台比B—52战略轰炸机中队能更有效地对某个国家施加压力。尼克松在1980年出版的《真正的战争》一书中直言不讳地说：“他们（指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我们的技术，需要同我们做生意，他们无法阻挡我们的无线电广播。当他们打开门伸手去取他们想要的东西时，我们应竭尽全力把尽可能多的真理塞进门去”，最终使西方“不战而胜”。

近年来，美国和西方国家利用国际形势的缓和，以及东欧国家面临的困难，变本加厉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1988年8月28日刊登文章说，尼克松认为，东欧在90年代“将不可避免地发生一场政治地震”，西方应制订一项战略，以“促进东欧的和平变革”，包括利用卫星等现代化通讯工具，“向争取和平变革的人提供物质支持”，对“东欧国家”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等。美国《外交》季刊1989年春季号还披露了尼克松向现任总统布什提出新政府应把欧洲置于其对外政策最优先地位的具体建议，即

“应该施加压力，促使东欧和平演变。应该继续利用现代化大众传播手段，打破东欧政权对其人民的控制。还应向正在铁幕后面为和平演变施加压力的人们提供物质支持。”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1989年7月同法国《解放报》记者弗朗索瓦·塞尔让谈话时则竭力鼓吹西方实行共同战略促使共产主义向多元制和平过渡。他称共产主义已经在经济上“失败”，西方应趁机确立“导致共产主义向多元制度的和平过渡”的“总体战略”，促使东方国家实现“多元化民主”。布什总统亲自出马访问波兰、匈牙利，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还破例讨论东欧问题，商量对策，发动一次又一次攻势。

1990年4月2日布什在美国广播业者协会亚特兰大会议上说，美国政府将继续资助对古巴的电视广播和对东欧的无线电广播。布什宣称，“美国将继续坚持真理，一定不能丧失它的声音，我决心要这样做。”

西方国家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为推行“和平演变”总战略目标，一方面利用东欧国家的经济困难，以经援、贸易为诱饵施加压力，诱使社会主义国家向西方靠拢和依附；另一方面还通过宣扬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鼓吹资产阶级价值观，大搞思想渗透。利用新闻媒介大作文章就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长期以来，他们使用所谓“真实、客观、公正、全面”的报道手法，利用现代化传播手段的绝对优势，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各种新闻媒介向东欧国家大肆渲染社会主义国

家出现的“困难和危机”，标榜资本主义，以此影响东欧政局。他们竭力鼓吹西方的“民主和人权”，“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鼓吹私人创办新闻媒介“能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推进社会发展”，用西方新闻理论影响东欧新闻界。

尤为突出的是，他们还直接向东欧国家的反对派提供各种资助，帮助他们与官方争夺舆论阵地，为反对派上台执政大造舆论。

我们看一看西方三家组织是如何搞渗透的，就可见一斑。

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简称劳联—产联）：从80年代就开始支持波兰团结工会进行反政府活动，《华盛顿邮报》曾发表过一篇题为“我们如何帮助团结工会取胜”的文章。文章说：“如果没有美国工会的帮助，波兰团结工会可能无法阻止共产党摧毁团结工会的努力。”他们在1980—1981年就提供数十万美元，帮助波兰团结工会购买奇缺的印刷机、油印机、传真机和其他必需用西方货币才能买到的东西。美国工会的资金和来自“民主基金会”数百万美元的赠款是经劳联—产联的“自由工会研究所”提供的。此基金会是私人组织，它得到美国国会的资助，是向全世界“民主”运动提供捐款的机构。捐款用来购买数十台印刷机、数十台电脑、数以百计的油印机、数千加仑的印刷油墨和数十万张复写纸，还有摄象机和无线电广播设备等。团结工会电台用美国提供的设备经常打入政府当局的电台节目，向

广大群众传递“希望的信息——团结工会继续存在”。1987—1988年劳联—产联又向团结工会提供了200万美元的援助。1988年元月3日法新社报道说，地下刊物和报纸最近几年在波兰不断发展，尽管一直有警察对禁止的作品进行检查。在西方的支持下，波兰100来家出版社开始从事地下出版活动，每年约出300种书和11000多种期刊。

与此同时，劳联—产联还在苏联、匈牙利和捷克等国寻找目标。在匈牙利，它所属的自由工会研究所的“专家”曾经帮助匈牙利工人创立独立工会运动，脱离过去共产党领导的机构。在捷克和斯洛伐克，他们曾帮助重建8000个罢工委员会，组成统一组织与当时的政府抗衡。

全国民主基金会：由美国政府资助，私人管理的组织，于1983年由国会立法成立。根据国会法案，该基金会不直接开展宣传活动，而是为有利于美国民主思想传播的项目提供经费。这家组织也是美国各种咨询人员、积极分子、志愿人员的国际网络中心。它积极参与波匈捷等国的“民主活动”。他们在东欧局势动荡之际纷纷前往这些地区进行活动。它的大量资金除用于培训人员外，还购买了所谓新闻自由的硬件——电脑、印刷机、复印机和电视摄象机等新闻媒介设备赠给东欧国家的反对派组织。

反对新闻检查基金会：它是由世界新闻自由委员会、泛美报业协会、国际报纸发行人协会、国际期刊联合会、国际新闻学会和北美广播者协会于1987年联合成立的。这是西方6个国际性新闻组织为援助东欧国家新出现的独立的新闻机

构采取联合行动的产物。据1989年12月16日出版的美国《编者与出版者》杂志报道，它正在实施一项具体的“东欧援助计划”。该基金会宣布提供两笔资金，一笔用于帮助将法国《世界报》捐赠的一部印刷机运到华沙，送给与团结工会有密切联系的《选举报》；另一笔将用于帮助布拉格的《人民报》扩大发行。

戈尔巴乔夫“公开性”的影响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以后，在苏共27大确立了以改革为主调的方针。为了推动政治、经济改革，戈尔巴乔夫在新闻界极力主张“公开性”、“透明度”，提出“历史无空白”，“现实无禁区”，苏新闻界确实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与过去相比，苏联报刊、广播、电视的新闻报道领域明显扩大，注重反映群众的呼声，批评性报道显著增加，国际报道趋于实事求是，注重报道形式多样化和灵活性。

然而，在推动“公开性”和“民主化”的过程中，各种思潮大量涌现。新闻界面对形形色色的思潮，舆论导向出现了问题。在“历史无空白”的前提下，出现全面否定苏联70年的革命历史的现象。肃反、农业集体化、工业化都受到了批判。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的历届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均遭谴责，甚至出现诋毁列宁形象的事件。作为立国之本的党的领导作用、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和十月革命都受到怀疑。

对于这一切，报刊、电台、电视台等新闻舆论工具都做了大量的报道。同时苏联的经济和政治改革都面临着许多困难。人们看不到改革的具体成果，对于渴求通过改革获得生活得到改善的人民大众来说，确实感到茫然，思想上造成很大混乱。

对于东欧国家来说，苏联新闻媒介发生的每一个变化都对他们产生直接的影响，彼此之间也产生振荡效应。苏国内新闻媒介在宣传方针、报道思想和内容方面的重大变化无疑起着一种示范和推动作用。东欧各国新闻媒介对苏联改革反映出来的问题做了大量、详尽的报道。对于大多数内心长期积蓄着不满情绪，渴望改变现状，希望自己国家加快改革步伐并得到些实惠的民众说来，戈尔巴乔夫成为他们心目中改革的标志。而对于东欧这些国家的反对派说来，苏联的各项改革也成了他们向政府施加压力的王牌。

苏联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对东欧各国影响颇大。戈尔巴乔夫1986年访捷，他提出各党独立自主、社会主义国家平等的主张。他明确的表态使东欧国家当局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长期以来苏联以“老子党”自居的束缚。他主张对东欧发生的事件，苏联在“道义和政治上无权干涉”，使当局可以独立自主处理国内事务。经过一年来的实践证明，苏联客观上放弃对东欧的支持，使西方对在东欧搞“和平演变”有恃无恐。东欧国家自身的弱点促使它本身更要依附于西方，而不可能抵御西方的“和平演变”。

内在原因

经历了二次大战洗劫，东欧国家都是在苏联的帮助下从法西斯铁蹄奴役之下解放出来的。从此这些国家获得了独立，人民获得自由，当家作主，生产力得到了很大解放。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新闻事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新闻媒介在贯彻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激发人们的斗志方面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他们建立了各自的报刊、广播、电视和出版系统。

长期以来，东欧国家的新闻媒介系统和其他领域一样，一直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其特点是，执政的共产党领导新闻工作并占绝对优势。几乎全部媒介完全归党、政府以及党和政府领导的社会团体所有。从报刊、电台、电视台的创办或停止工作，从领导人员的选择和任命到编辑报道方针的制订都是由党和政府审查和批准的。新闻媒介是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组织群众，为实现党在各个时期的任务为中心的。各种新闻媒介得到来自国家的大量补贴，新闻纸张供应有绝对保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苏联模式不断受到挑战。80年代初，东欧国家相继出现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困难，普遍面临着许多矛盾和艰巨的改革任务。经济失调、通货膨胀加剧、外债累累，劳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民族矛

盾不断激化，群众罢工、集会和游行的规模声势越来越大。同时，执政党内官僚主义、腐败现象的出现，使党和政府的威信严重下降。反对派借机大作文章，致使党和政府受到很大压力。作为执政党和政府舆论工具的报刊、广播、电视片面强调宣传职能。它们往往报喜不报忧，甚至好大喜功，报道内容枯燥乏味，形式千篇一律，内容雷同，越来越不受读者欢迎。致使报刊的读者下降，广播电视的听众观众减少。

在苏联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影响下，东欧各国当局对新闻媒介也由最初强调集中统一管理转为强调公开性，继而发展到控制不住而放任自流，呈无政府混乱状态。其结果不仅没有缓和不满的舆论，反而适得其反。

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口号和它产生的效果对东欧各国新闻界无疑带来很大冲击和压力，西方新闻媒介又乘虚而入。东欧各国的反对派受到西方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支持和怂恿，在“新闻自由”的幌子下沆瀣一气。他们创办自己的报纸、电台，宣传各自的政治主张。在党内外、国内外各种势力、各种思潮的夹击下，作为执政党和政府的舆论工具又不能很好地引导舆论，致使人们的思想越来越混乱，信任危机加剧。面对国内的政治、经济困难，面对五花八门的主张，人们无所适从，看不到国家的前途，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而国内反对派利用新闻媒介大造夺权舆论，步步紧逼，迫使当局让步。他们通过种种方式占领新闻媒介阵地，扩大影响，逐步改变其性质。

东欧六国虽然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不完全相同，但就其变化过程可以看出一些带有共性的内涵。

波兰：70年代由于经济改革政策失误，导致80年代初爆发了工潮。工潮中出现的团结工会接过工人们提出的“要社会主义，不要对社会主义歪曲”的口号，不断搞罢工游行，迅速借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团结工会创办了《团结周刊》和其它小报，并以此做为夺权的重要舆论手段。波当局1981年底宣布全国军管，团结工会被取缔，团结工会报刊被停止出版，不得不转入地下。

1982年波兰开始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最初的五年取得了一定成效。民心稳定，群众对波党的信任逐步恢复。但到1987年后，波兰的改革遇到的阻力和困难越来越大，经济又陷于停滞状态。1988年上半年由于物价改革操之过急，群众不满情绪激增，向西方举债受制，波兰当局困难重重。而团结工会在西方的支持下活动更加频繁，占领新闻媒介的企图更加明显。据《华盛顿邮报》披露：到1985年为止，波兰出版了400多种地下期刊，有的刊物发行量达3万份。每年出版数千种地下书籍。团结工会还利用美国提供的设备经常打入当局的电台节目，向广大群众宣传他们的主张。

1989年4月间，波当局举行各种政治力量的“圆桌会议”后，团结工会合法化。9月波兰统一工人党由于在议会选举中失利，团结工会掌了权。团结工会高级领导人马佐维耶茨基8月底在与总统雅鲁泽尔斯基的会谈中拒绝波党掌握外交部和新闻部。他担任总理后立即宣布：今后“宣传工具

属于我领导的政府”，“新闻媒介隶属政府，因此隶属总理”。在组阁时，政府新闻发言人、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和政府机关报《共和国报》总编辑全换成团结工会的人。卡托维兹、罗兹、格但斯克等地电视台的主要负责人也都被团结工会人士代替。

匈牙利：围绕如何评价解放后40多年的历史 和 现状、1956年10月事件和对纳吉的评价，对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关系及速度，对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实施途径等等问题存在着激烈的争论。随着事态的发展，党内高层领导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越来越突出。在东欧国家中，受西方影响比较大的匈牙利新闻媒介对这些问题的各种看法都进行了大量报道。1988年5月匈党召开了30年来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以格罗斯为首的新中央上台，更换了包括卡达尔在内的最高领导。具有“激进”思想的波日高伊进入匈党政治局，他在1989年1月末未经中央同意，擅自在电台将1956年10月事件称之为“人民起义”，此举在匈牙利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他们在为纳吉平反后，竭力主张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社会主义工人党改成社会党，滑向“民主社会主义”。

1990年3月25日自由选举国会代表前后，匈牙利报刊、广播、电视的报道特别活跃，充满了有关大选的内容。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每天为各党派的竞选宣传平均分配播放节目的时间，经常组织各党领导人就人们关心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进行直接辩论争取选票。匈舆论中心早在1月份就对居民进行抽样调查并在报纸上公布这次民意调查结果。自由大

选结果，民主论坛获胜，执政的匈社会党沦为第四大党。新闻媒介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民主德国：由于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生活水平比较高，在东欧国家受到一致公认，被视为是稳定的。昂纳克从1971年执政以来，在发展生产和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成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福利最好的国家。但是，由于民德党和国家领导人过多强调成绩，忽视了政策中和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对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以及思想情绪等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新闻媒介往往报喜不报忧，未能全面、客观、及时地反映现实生活和存在的问题。群众的呼声得不到充分的反映。因此，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群众逐渐对民德党和政府，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任和信心。

民德位于两种社会制度和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最前线。西方多年来一直把对民德的“和平演变”做为重点对象，对民德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攻势。除“自由欧洲电台”、“美国之音”外，联邦德国新闻媒介长期的煽动和蛊惑宣传，从思想上对民德群众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联邦德国的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节目，民德人都能收听或收看。加之民德人的生活水平比起联邦德国人的生活水平差距甚大，造成的心理不平衡加深了，一些人对民德现状不满。西方为实现“和平”吞并民德的战略目标，利用新闻媒介进行了有组织、有步骤的宣传，煽动大量民德人经过匈牙利和奥地利移居西德。结果造成了人们思想混乱，严重损害了民德党和国家的形象。与此同时，各反对派，尤其是“新论坛”趁势火

上浇油。而民德当局领导层处理以上矛盾分歧公开化和处理不力以及波兰、匈牙利形势的影响等因素，终于导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示威。在1989年年底召开的特别党代会后昂纳克辞职，克伦茨和居西先后当选为民德主席，统一社会党更名并通过新党章。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表示了加速对社会进行改革的决心，坚决摒弃“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具有鲜明党派性质和执政者舆论工具的新闻媒介，在摒弃过去模式的过程中经历了这次剧烈的动荡后也呈现了多样化。

罗马尼亚：多年来齐奥塞斯库搞个人崇拜和家族统治，经济上搞高积累。尽管他宣布罗已于1989年3月底还清了全部外债，但他推行的扩大出口、压缩进口的方针使罗国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从1980年以来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每况愈下，老百姓不满情绪在增长。新闻媒介受党和政府的控制比较紧，对齐氏夫妇歌功颂德，在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报道中报喜不报忧，浮夸现象严重，使读者和听众感到厌烦。1989年3月11日，包括罗共前中央第一书记在内的6名高级领导人联名给齐写了一封公开信，指责齐造成国民经济崩溃，要求改变罗马尼亚现状。这封公开信是通过英国广播公司记者交给自由欧洲电台播出的。公开信广播后，使齐在国内陷入更加孤立和被动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对罗政局如此迅速的巨变起了催化剂作用。直至岁末事变，执政24年的齐奥塞斯库被推翻，罗救国阵线委员会掌权并组成新政府。作为“集权型”的新闻媒介也随着齐政权的结束而瓦解。罗马尼亚国家通讯社从1990年初停止工作，改名为罗新闻社，成为

现官方喉舌。党报党刊更名易帜，新闻媒介从报道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捷克和斯洛伐克：40多年来在捷共领导下，捷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和挫折。70年代以后，捷社会上要求为1968年事件平反和苏联从捷撤军的呼声越来越高，各种力量以维护“人权”为旗号，发起“七七”宪章运动，形成与捷共对抗的反对派。戈尔巴乔夫也在幕后不断对捷施加影响。1989年在西方“和平演变”的强大攻势下，捷反对派趁机不断挑起事端，步步升级。捷共领导迫于种种压力节节退让。作为党的耳目喉舌的舆论工具本应很好地把握大局引导舆论，但却采取了忍让甚至大开绿灯的态度。某些新闻媒介凡是以前肯定的现在就否定。各种各样的煽动者、野心家和投机者则以“重新评价”为名制造轰动性新闻、散布怀疑情绪。他们常常随心所欲地解释过去，在某些印刷品的版面上出现了荒诞无稽和很不文明的东西。这种所谓“真实”地解释历史，全部否定革命的过去，否定唯物主义世界观、马列主义理论和方法，使人们的思想陷入混乱，人们对捷共和政府失去信心，在民德和匈牙利等国发生剧烈冲击下，捷政局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短短的3个月内，由40多个反对派联合组成的“公民论坛”就控制了政府、议会的重要部门。自1989年11月以来两次更换了电视台、广播电台和捷通社的主要负责人，议会通过了一项新闻法，取消新闻检查，允许本国和外国人自由出版刊物。

保加利亚：由于共产党的基础比较好，保共培养了包括

从事新闻媒介工作的一大批知识分子。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政局一直比较稳定。1975年欧安会强调的人类进行普遍交流、民主、人权等口号的诱惑和波兰团结工会的成立对保加利亚颇有影响。属于保加利亚党和政府的新闻媒介对此最为敏感。在国内，他们最先报道了这些消息。日夫科夫近年来由于民主作风差，保共内部发生了分歧。日夫科夫本人不想跟戈尔巴乔夫走，但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样子并不甚清楚。对于改革的理论通过新闻媒介讨论得多，但付诸实施的少。从1988年底，保出现了一些反对派组织。他们在1989年6月前还处于地下状态。日夫科夫下台后数目激增，迅速发展到20多万人。其中以“保卫人权独立委员会”为最甚。他们与英国广播公司、自由欧洲电台、德国之声等有联系。他们通过广播公开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指责保“侵犯人权”、“破坏人的平等生活环境”。1989年10月由欧安会组织的国际环保会议在首都索非亚举行之际，由部分社会名流组成的“生态公开性”组织抓住这一时机公开举行活动。他们借题发挥大搞上街游行和组织签名，攻击保“没有新闻公开性”、“没有民主”、“没有人权保障”，矛头指向保共和政府。他们要求当局同意平等使用新闻媒介的权力。

三年来，不能忽视的一种现象是，东欧六国的新闻媒介由于所起的主导作用成为各种变革和改革受影响最直接和最敏感的领域之一。而这些国家的反对派组织在美国和西方一些敌对势力的培植、收买和支持下，近年来获得很大发展。

官方新闻媒介在揭露这些组织、团结群众、引导舆论方面又很不得力。出于不同目的某些新闻媒介甚至助长了这些反动宣传。

反对派组织深知大造舆论、掌握新闻媒介领导权、争取群众、宣传扩大自己力量的重要性。他们从一开始便把目标集中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并逐步形成一个个地下合作网络，为夺权做舆论准备。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同西方代表团或人士会见，进行联系，或向西方媒介发表谈话，散布谣言，攻击本国政府或借助外部势力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美国合众国际社在1988年年终稿中披露：美国自由欧洲电台介绍了保、捷、民主德国、匈、波和罗马尼亚六个东欧国家的99个独立组织和数百个鲜为人知的组织的情况。这些组织不仅“关注新闻自由、环境保护、同性恋”，而且“更为关注它们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困难以及克服这些问题的可能办法”。

一年之后，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对此进一步报道说，一些东欧国家反对派组织已建立广泛的地下合作网络。捷克和斯洛伐克新成立的反对派组织“公民论坛”致电其他国家的持不同政见组织，对它们的支持表示感谢。名单就象东欧共产主义反对派的“名人录”：波兰的团结工会、东德的新论坛、匈牙利的社会民主联盟和保加利亚的生态公开性组织。

这个地下网络遍及东欧并伸展到苏联。它不仅组织出版杂志和地下出版物，而且为持不同政见者开正式的研讨会，甚至还创办了一个持不同政见的通讯社——东欧新闻社。这

家新闻社在匈牙利、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和苏联都有记者，它和持不同政见的出版物交换文章，并随时报道其它持不同政见组织的情况。

在东欧一些国家，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教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仍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东欧风云突变中，宗教势力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这方面，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较有代表性。

波兰有3780万人口，全国有37个教会和宗教团体，全国人口85%是天主教徒，此外还有东正教、路德教。其中天主教报刊就有90多种，每期发行量为200万份。这使教会拥有巨大的权势。特别是当波兰红衣主教沃伊蒂瓦1978年成为罗马教皇约翰一保罗二世之后，天主教会的影响进一步加强。反对派利用宗教媒介宣传对抗和削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反社会主义势力张目，为反政府活动提供有力的保护和支

持。

近些年来，罗马教皇拒绝从东欧各国政府建立的神甫协会的成员中任命主教，而要任命那些站在反政府立场上的人当主教。在波兰1980年8月工潮中政府做了让步，国家电台开始定期转播教堂做弥撒的实况。据路透社报道，就在当天华沙圣十字教堂作弥撒的实况转播中，主教耶日·莫泽莱夫斯基宣读了布道稿，他要求为教会获得机会利用一般新闻宣传工具，而不仅仅是利用电台进行祈祷。与此同时，各地教堂的神甫宣读了波兰主教团的一项公报，指责波兰新闻界散布他们所称的“不诚实的宣传”。从70年代以来，美国历任

总统都要飞抵罗马朝拜教皇。1987年里根还中断了威尼斯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召开前4天的休假，专程拜会罗马教皇，双方就苏东地区的改革以及苏美关系举行了会谈。

这些年教皇保罗二世也接连不断地访问波兰，他明确表示，波兰教会“必须把争取人权和政治多元化放在首位”，强调教会“应该把团结工会的目标和策略接受为自己的目标和策略”。他亲自出马到社会主义国家布道传教，公开亮出“政治多元化”和“保护人权”的旗帜。在匈牙利，教皇要这个国家的听话主教“发奋努力和设法多做事”。他的号召业已产生影响。

1989年4月26日波兰议会开始辩论政教关系的法案。该法案包括使教会拥有广播星期日的弥撒和宗教节目，建立电台和电视台，出版报纸和书籍，建立新闻机构和创办出版社。5月议会已通过该法案。过去政教分家，中央电台和电视台从不报道宗教节目。由虔诚的天主教徒马佐维耶茨基组成团结工会政府后，教会亦可分享电台和电视台。现在，中央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在波兰全国节目中每周用一小时，克拉科夫和卡托维兹这两家地方电视台每周用15分钟专题播放宗教节目。

捷克和斯洛伐克全国1500多万居民中有1/3以上的人都“与宗教有密切关系”，目前共有20个教会和宗教团体，其中大部分是罗马天主教徒。这些教会和宗教组织都有自己的杂志（包括周刊、半月刊、月刊、季刊）和其它各种简报。教会总共出版33种刊物。天主教报在国内发行量大约23万份。在

这次国内局势的剧变中，宗教也起了一定作用。大主教托马谢克积极支持捷反对派的活动，并且和反对派采取联合行动向当局施加压力，迫使政府做出让步。

在东欧政局的剧烈动荡中，东欧各国新闻媒介和它的政局一样发生重大的变化，这决非偶然，令人深思。这种新的形势有可能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将持续下去，甚至更为复杂激烈。

通过探索东欧新闻媒介的演变，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世界各国的新闻媒介不论是属于政府和某一执政党控制，还是所谓某个垄断集团控制的，乃至私人所有的，都是为某个政党和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的。所谓“客观报道”，都带有鲜明的立场和倾向性。新闻媒介系统作为国家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与其国家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制度相适应，否则就无法生存下去。东欧新闻媒介的演变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其政局的变化，而东欧国家政局发生急剧的变化必然导致新闻媒介的根本变化。

（写于1990年8月）

西方宣传机器与东欧政局

冬 岩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了使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采取各种手法，以图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其中利用新闻媒介造谣惑众，煽动情绪，进行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鼓噪，就是一个重要方面。

1989年东欧政局发生了剧烈动荡，其时间之迅速、振荡之巨大，令人震惊，发人深思。尽管东欧各国具体国情有所差异，政坛变化的具体时间先后各不相同，但西方宣传机器对东欧各国政坛变化的表现却如出一辙：竭尽挑拨煽动之能事。它们对反对派都显示了特殊的厚爱，扮演了特殊的角色。

众所周知，当今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以及法新社四大西方通讯社，以每秒1200字的速度，通过卫星、微波、电缆、光纤、光缆向全世界的报纸、电台、电视台提供80—90%的国际新闻。这些国际新闻，极力标榜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对社会主义国家遇到的严重困难和在改革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大做文章。

在众多的西方宣传机器中，以美国几家对外宣传机构表现尤为突出。

美国新闻署：成立于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任职期内，直属白宫管辖。新闻署署长由总统任命，直接向总统报告工作。它集中了对外文化交流和宣传的主要手段，宣传美国的对外政策和意识形态。自1953年建立以来，其宣传体系发展很快，到1986年底，已在128个国家设置211个新闻处（在美驻外使馆内）和近2000个宣传活动点。从机构设置上，除了按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电影等不同宣传手段分设四个部门之外，又按地理位置，分设了7个地区办公室，其中包括为加强对苏联东欧地区的宣传和渗透而设置的苏联、东欧地区办公室。

针对东欧六国局势的变化，推销宣传美国的形象是美新署的重要任务。据1990年6月香港《明报》报道，美新署和美国各杂志出版商还签署协定，把美国许多过期未售完的杂志运往东欧各国。美国驻波兰大使不久前回报，有80多种杂志供不应求，其中最抢手的是《花花公子》和专供女性消闲的妇女杂志。

全球电视网：美新署1984年11月15日开办的，以扩大它对外宣传。它是在美国驻各国使馆内建立的卫星电视接收站，目前已达150多个。由于采用了全球通讯卫星先进技术手段，这个网络可供外国记者采访美国政府人士，美国政府可直接向其他国家发表讲话。在1989年东欧六国政局发生连锁反应时，该网络反应迅速，发挥了作用。

无线电新闻资料服务：美新署总部使用电脑控制的无线电发射台向美驻各国的125个文化处发布有关美国政府政策、官员讲话、新闻发布会材料，解释、介绍政府政策和措施。这些新闻资料以美国政府国内国际活动为主，同时也发布不涉及美国的国际活动的新闻和评论。世界各地的美国使馆的新闻文化处以此作为它日常对外宣传的信息来源，发行大量新闻稿，免费提供给外国的新闻和传播机构。

美国政府支持控制、受美新署监督的还有它西柏林的广播电台。开始是有线广播，后来发展为西欧的几家大电台之一，拥有3个广播网，开办了特别节目。其中不仅有新闻、评论，还有宗教、音乐、知识性节目。内容以讽刺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昂纳克政权和苏共政权为主。80年代初，联邦德国政府以10倍于美国的财力补助这个电台。但是，美国电台仍然是西柏林的美国代表，这显示了美国对民德的特殊兴趣。

美国之音：美国新闻署领导的美国之音创办于1942年2月，是美国国务院的美国新闻总署下属五大部门中最大的一个。作为美国对外宣传重要喉舌，全部经费由政府拨款，台长由美国总统直接任命，几乎所有部门的负责人都由美国外交官担任。美国历届政府对美国之音非常重视。据有关材料统计，从1983年起在前总统里根执政的头四年任期中就拨款10亿美元专门作电台广播经费。1986年它的经费为1.6亿美元。1990年这家美国政府全球性的国际广播电台每天以43种语言向世界各国广播，累计广播的时间每周达1200—1300多

小时，听众总人数估计达1.2亿。

这家自诩向全世界各国人民提供客观、准确、广泛消息来源的新闻机构，实际上是一个配合美国对外战略的宣传机构。80年代西方报界曾披露当时任美国之音副台长的尼古拉德斯在1981年9月21日所写的一段话：“我们应当破坏苏联及其卫星国的稳定，促进它们的人民和政府之间产生摩擦……我们要尽量在共产主义集团各国领导人之间打入楔子，使他们相互不满和相互猜疑，我们应当煽起民族主义的火焰，鼓励铁幕宗教感情的复萌。”

近年来，美国之音改变了过去赤裸裸的反动宣传手法而采用了更隐蔽的手段，即乘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之机，大量宣传所谓西方传统的“民主”、“自由”、“人权”观念，诋毁和丑化社会主义制度。1990年4月尽管由于削减预算290万美元，取消了36种语言的广播，但1990年2月它又投资了几亿美元在以色列的内格夫沙漠修建转播站，向东欧、亚洲和非洲广播，转播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的节目。

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和自由广播电台：它们是美国设在西欧的专门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宣传的大型广播电台。该台成立于50年代初，1976年10月合并后改为公司。现有工作人员1700多人。现任总电台负责人佩尔曾在莫斯科当过记者，并担任过美国之音台长。

从名义上看，这两家电台是私人资助的“独立的”私营电台，但实质上是受美国政府严格控制和由国家提供经费的“国家电台”。70年代以前其经费是由中央情报局提供的。

1971年与中央情报局脱离关系后改由美国国务院提供经费。1973年后，则由美国国际电台管理局提供经费并接受其管理和监督。

为了配合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宣传，美国花了数十亿美元发展这两个电台。仅1989年财政年度就拨款2.28亿美元。

它的总部设在慕尼黑，并在波恩、布鲁塞尔、伊斯兰堡、伦敦、纽约、巴黎、罗马、华盛顿和布达佩斯设有记者站。据称，它们同许多苏联、东欧问题的机构和专家有联系，并和大批西方记者有“合作关系”。向其提供稿源的材料记者、专家达1600多人。这两家电台目前还在西德、西班牙、葡萄牙等地设立了9个转播台、48个发射台、总功率达9070千瓦。

据两台自己统计，每周播音时间达1097个小时。它们用21种语言对苏联东欧国家广播，听众每周约5600多万人。其中“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的听众有3400万人。“自由广播电台”是专门对苏广播的。它每天用俄语和其它11种苏联少数民族语言播音，听众有2250万人，与“美国之音”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总听众人数持平。由于自由欧洲电台每天用保加利亚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匈牙利语、波兰语等9种语言播音（其中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每天播音达21小时45分钟，波兰语长达19小时45分钟，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保加利亚语每天分别达19小时15分钟、13小时45分钟和9小时），因此，在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收听这两个电台的总人数则远远超过“美国之音”。

这两家电台公布的宗旨说，其主要任务和目的是从美国利益出发，通过向苏联、东欧国家的人民，特别是青年，“传播国际以及苏联、东欧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介绍西方社会的成就、生活及价值观念等来建立“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苏联、东欧的“言论自由”和“人权原则受到尊重”。在1988年—1989年东欧政治风云突变中，这两家电台所起的作用尤为突出。连他们自己也毫不讳忌地承认：它们是“美国之音对东欧和苏联的发展进程施加影响的最强大的工具”。

这两家电台使用的宣传手法都很有针对性。它们通过播发消息、新闻分析、述评、综述、专题、采访等多种形式吸引听众，而绝大部分是当前世界重大新闻事件。此外，还有文化、历史、政治、经济、贸易、妇女等专题节目。

在波兰，自由欧洲电台雇用反波兰当局的记者、编辑达30—40人。它从成立以来一直对波兰进行攻击，大肆散布社会主义的危机和失败。它大量报道波兰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煽动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不满情绪，大量报道地下组织和反政府分子的活动，宣传反对派的政治主张及所谓波兰的“内部消息”。电台还多次采访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和宗教领袖，借他们的影响号召波兰人民起来改变波兰的制度。1989年8月29日曾多年担任自由欧洲电台波语部主任，现任美籍波侨代表大会领导成员之一的扬·诺瓦克—耶焦兰斯基抵波访问。这位战前波兰国家军总司令部的信使，曾参加过华沙起义，自1944年10月2日逃离波兰后，首次返

回他逃离45年后的波兰。在机场上，他毫不掩饰地对团结工会人士说：“世界发生了变化。是由于你们才发生了变化，你们一直处在战斗的最前线，我们只是提供了武器。”

对匈牙利，这两家电台则采用请西方“专家”和匈牙利持不同政见者进行辩论的方式进行宣传。它们不仅大谈改革的“本质”和党的领导层需要变化的重要性，还播发在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的境况，煽动民族情绪。在1989年布什访问匈牙利时，就有1900名西方记者前往采访报道。

根据捷克斯洛伐克的具体国情，自由欧洲电台的广播近几年来则利用宗教和民族问题进行反宣传，花大量的时间报道了前两年“其它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强调（在捷克）发生变化和试验的可能性”。1989年2月9日捷共中央总书记雅克什在布拉格对新闻界负责人发表讲话，指责西方一些政治集团和报刊掀起反捷运动。他说，反社会主义势力和各种集团的活动加剧是捷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反社会主义势力得到了西方广泛的支持和帮助。自由广播电台、美国之音等直接参加了他们组织的活动。捷共中央理论和政治杂志《新思想》月刊1989年7—8期合刊文章揭露道，近几年来，西方通过对捷广播进行攻击性宣传大大增强。每一个抱有这种目的的电台，特别是自由欧洲电台和美国之音，在利用宗教信仰和教会达到反社会主义政治目的的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正是因此，1990年4月美国总统布什说，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维尔等人感谢“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对东欧的广播。

在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倒台后西方记者蜂拥而至。自由欧洲电台不仅对罗国局势发展进行了连篇累牍的大量报道，渲染伤亡情况，而且在专题节目中向从混乱中破土而出，昔日反动政党、今日反共先锋国家农民党传授如何利用“民主”和“自由”，宣传自己，扩大队伍，向当权者进行“合法斗争”的经验。

法国新闻媒介在东欧局势剧变前后也是非常卖劲的。法国国家电台1989年将俄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广播增加了一倍，为此受到法国外交部的表扬。

据统计，1989年12月30日、31日两天之内，布加勒斯特收到法国《解放报》1万份、《世界报》7千份、《费加罗报》及《十字架报》各2千份，《人道报》5千份。而在此之前，从1981年开始，《世界报》9年只卖了300—500份。巴黎报刊发行公司制定了今后6个月的发行计划，预计每日一专机、每周一专车，向罗马尼亚运送报纸，并向政府申请补贴250万法郎。

法《解放报》1990年4月4日刊载文章承认该报和西方新闻媒介故意编造和夸大蒂米什瓦拉事件死亡情况。文章说，在这个有30万人口的工业中心，12月15日有几十人示威游行，反对驱逐一个牧师。当时没有一个新闻记者在现场，随后才有些报道，这些报道又是根据边界搜集的间接证词而写成的，甚至电讯宣布发现一个有4000多死者的堆尸处。而该市机械学院的大学生在1990年3月份把蒂市分成69个区，

挨家挨户进行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1989年12月15日—22日发生的蒂米什瓦拉事件，死亡147人，失踪25人，335人受伤。他们发现4000多死者是制造的假现场。

利用罗马尼亚人有四分之一的人懂法语的特殊优势，法国政府不仅官方媒介大力渲染东欧各国的动荡局势，而且鼓励私人视听机构加强对东欧的工作。例如加强广播电视节目，在当地合办或帮助当地建立发射和转播设施。法国负责国际文化关系的国际秘书要求，政府及议会拨出预算，以实行“东欧计划”，包括在民主德国建立一个法德文化电台，向全德播音。

香港《明报》1990年3月26日报道，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政权垮台之后，第一个自由电台UN—FUN就是由法国FUN电台赠给布加勒斯特大学学生的。这家电台组织了汽车车队，千里迢迢运来了上千张欧美流行歌曲唱片，还有40卡车食物、药品和衣服。在布加勒斯特市广播室墙上贴着守则：“本站广播不受政府影响的节目，尊重思想与意见多元化；不得成为一个政党的电台。”法国FUN电台方面的立场是，大学生一旦不遵守“客观、独立”的原则，他们马上收回价值30万法郎的广播器材。

法国FUN电台深知，开办一个新电台扩大自己的影响投资太昂贵，于是投资500万法郎于1990年2月中旬在波兰中世纪小城卡拉柯维隆重开播，而法波合作的“小波兰FUN电台”一台长正是前团结工会地下电台负责人。它的中波广播网遍及波兰南部130个城市，覆盖人口达2200万人。

在匈牙利，某协会在法国支持下建立了第一家私人电台，每天播送“巴黎—布达佩斯”法语节目。法国“欧洲一台”制定了计划，打算联合电视四台等与莫斯科电视台合作播送西方经济和广告。当局声称，已制定了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华沙的工作计划。5月之后将在布拉格和布达佩斯开播。

从1987年起，法新社成立了欧洲第一家建立私人卫星发射网的通讯社。这一全球通讯网由法新社的一个附属机构**Polycom**管理。1989年5月12日法新社和联邦德国最大的新闻通讯社德新社等组成了一个新的联合公司，通过卫星播出新闻和图片。从1991年初开始，该卫星通讯网将逐渐代替有线通讯网。美联社和路透社尽管不是这家新公司的伙伴，但要求它们成为顾客。

英国广播公司在1989年年底罗马尼亚局势骤变时，将对罗广播增加2小时。1990年2月3日该公司的海外部主任又宣布对罗广播还将增加85分钟，与此同时，它还将增加资金以加强保加利亚语和俄语的广播。

在民德，西方新闻媒介1989年不仅大量报道了民德人经匈牙利涌入联邦德国的消息，而且还突出报道了反对派《新论坛》的活动。西德《图片报》公然在9月12日第一版上刊登了民德党和国家领导人昂纳克去世的谣言。随着民德成立40周年的到来，英《泰晤士报》则在宣传昂纳克面临越来越大要其下台的压力。在戈尔巴乔夫10月参加民德40周年庆祝活动，美联社和西德电视台反而报道民德一些地区警察和

示威者发生冲突。

随着保加利亚大选的到来，美国、英国、法国、西德等主要西方国家都以不同方式对其施加影响。保加利亚新闻媒介报道，美国国务卿贝克曾两次抱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的“民主进程大大落后于”波、捷、民德等国。BBC记者在保电视台大谈英国的“民主选举制度”，一些实业界人士也“慷慨解囊”。其中英国马克斯韦尔公司几个月前已向保加利亚提供了1000吨新闻纸供选举用。他本人再次到保访问，同有关领导人进行会谈。法国则专门向其派竞选顾问，支持民主力量联盟。前总统希拉克还亲临集会并发表鼓动性讲话。据统计，1990年6月初以来“德国之声”、“自由欧洲电台”和英国广播公司都加强了对保加利亚的广播，并相互协调了宣传内容。西方及东欧国家党派代表及新闻记者早在3月份就把索非亚市的旅馆饭店的床位订购一空。

以上事实不难看出，西方国家宣传机器如何为东欧政坛的巨变摇旗呐喊，为东欧各匡反对派夺权喝采助威，对东欧形势发展幸灾乐祸。这恰恰再次暴露了他们一贯的反社会主义的本质。

（写于1990年8月）

苏联东欧党报地位与作用的变化

文有仁

1989年下半年以来随着苏联东欧政局的巨大动荡，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有的公开宣布改变性质为社会民主党，有的虽未宣布改变性质但也对党章作了重大修改。在这些国家里，党报、党刊的地位与作用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些国家近几年关于新闻改革的做法。在这方面，他们抛弃或大大修改了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到列宁时代在革命斗争中适应革命需要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些根本性原则。

一、关于党报、党刊与同级党委的关系

1847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帮助下建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这是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者组织。1848年2月，马克思在巴黎当选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同年6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创办了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新莱茵报》，马克思

任总编辑。恩格斯1884在《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中回忆这段历史时指出，“编辑部的制度简直是由马克思一人独裁”；“马克思的独裁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和无庸置疑的”；“首先是有赖于马克思的洞察力和坚定立场，这家日报成了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1页）

19世纪90年代，只是在德国党中央处在右倾机会主义强烈影响下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恩格斯才提到过建立“一个不直接从属于执行委员会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刊物”，“形式上独立的党的刊物”（参见《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2年11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17—518页）。恩格斯还提出，执行委员会对党的刊物“保持相当大的道义上的影响”，执行委员会“应该而且可以以此为满足”。（《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1年5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88页）

1905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举行三大时，党实际上已分裂为孟什维克派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这年7月，列宁明确提出，“党的一切报刊，不论是地方的或中央的，都必须服从党代表大会，服从相应的中央和地方党组织。”

（《〈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的序言》，《列宁全集》第9卷第152—153页）这一年11月，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明确提出，“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

（《列宁全集》第10卷第26页）1920年，列宁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一文中重申，“不管整个党目前是合法的或是

非法的，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一切出版机构都应该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列宁全集》第31卷第185页）

从这以后，各国共产党在处理党报和党的关系方面遵循着这个原则。这项原则有利于党的舆论工具成为党的耳目喉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群众为实现党的目标而斗争。

但是这个原则一直遭到党内外反对派的否定。近几年，苏联东欧各国反对这一原则的言论越来越多。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这些国家的党纷纷举行党代会，通过新的党纲党章。他们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大体有以下两种。

（1）继续维持党机关报从属同级党委的做法。

苏共于1990年7月举行了二十八大。1990年2月苏共中央向这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草案规定，“在相应的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任命党的出版物的总编辑；党中央舆论工具的总编辑和其他领导人必须由苏共中央主席团任命；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总编辑应由苏共中央全会批准任命。”

（苏共民主纲领派1990年1月提出的纲领则主张：“党的舆论工具不再从属于党的执行机关”，“它们只向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报告工作。”）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989年10月举行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宣布党结束，另外成立匈牙利社会党。匈牙利社会党党章规定，党的全国性报纸是《人民自由报》，党的理论刊物是

《社会评论》，党的周刊是《新论坛》，各报刊的总编辑由党的全国委员会任命。

波兰统一工人党1990年1月举行十一大，宣告党解散，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这个党的章程一方面规定：“党的中央一级刊物和出版机构的总编辑由最高委员会任命，省一级刊物的总编辑由省委员会任命”；另一方面又规定：“党的报刊属于全党并为全党服务”。

（2）党机关报刊不再从属于同级党委，而与同级党委一起从属于同级党代表大会。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1988年8月决定，原保共中央机关报《工人事业报》和机关刊《新时代》成为保共的报刊机构，即不再从属于中央而是从属于全党的机构。这在当时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中是第一个作出此类决定的。

保加利亚共产党1990年2月举行的第十四次特别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进一步明确规定：“党的新闻媒介的中央机构根据党代表大会的决定建立和取消，党的新闻媒介的地方机构根据全乡会议的决定建立和取消。”“党的新闻媒介的工作受党的章程、纲领性目标及党代表大会的决定的领导。”

“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的总编辑由党的代表大会，地方党的机关刊物的总编辑由乡代表大会和全体会议选出。编委只对选举自己的机构负责。”党机关刊物的总编辑向代表大会提交工作报告。这就是说，党刊不再从属同级党委，而与同级党委一样从属于同级党代表大会。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89年12月举行非常代表大会通过的暂行组织章程规定，党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的编委会，象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第一书记一样，都由代表大会选出。

二、关于党报、党刊的作用

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都一贯认为党的报刊是党的耳目喉舌，是党的工具，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马克思1849年2月在《〈新莱茵报〉审判案》中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75页）他和恩格斯同年12月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中再次指出，“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页）

列宁1912年7月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中说：“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针的一切公开发行的俄国报纸，目前已成为向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进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公开喉舌。”（《列宁全集》第18卷

第206页)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立即指出，“报纸刊物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3至4月，《列宁全集》第27卷第239页）他强调，要“使报纸成为启发群众、教导他们生活、教导他们不依靠地主和资本家建设自己经济的工具”。（《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1921年2月，《列宁全集》第32卷第120页）列宁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主张：“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从何着手？》，1901年5月，《列宁全集》第5卷第8页）

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就提出，报刊是“群众性的讲坛”，其任务是支持公开性，提供信息，对当局进行“民主监督”。

戈尔巴乔夫1986年2月在苏共二十七大的报告中提出公开性问题，强调“时时处处都要讲真话”。这年9月，他再次强调，“应当扩大公开性，应当将更多的事公诸于众。”次年1月他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说：“报刊应当支持国内的公开性原则，应当向我们的人民提供信息”。这年5月他在答复意共《团结报》问时说，舆论工具“是实行公开性的最具有代表性和群众性的讲坛”；它要“通报全国所进行的讨论”；还要“成为民主监督的保障”。他在这一年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中说，“我们力求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有更多的公开性。人们既应知道好事，也应知道坏事，以便扬善除弊。”

实行这种方针的结果，正如苏联内务部长巴卡金所说：

“新闻界现在是一团糟。”（转引自美国《纽约时报》1989年10月23日）苏联《真理报》1989年10月也承认，许多新闻报道“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甚至使人们张惶失措”。《真理报》批评某些新闻机构“并不总是采取同党的方针相适应的立场”。

针对这种情况，苏联当局对报刊提出了两个层次的要求。

第一个层次是针对党报党刊的。苏共中央1990年2月提出的纲领草案明确宣布，“苏联共产党把自己在中央和地方新闻机关看作实现自己的政策和思想，进行组织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工具并指导它们的工作。”戈尔巴乔夫1988年9月15日对苏联中央电视台谈话时重申：“报刊应当成为列宁想像中的那个样子，既是集体的宣传员，又是集体的鼓动员，还是集体的组织者。”1989年10月23日，他在《真理报》编辑部讲话时强调，“《真理报》应该奉行党的方针、党的立场，在同其他社会运动，包括所有愿意参加这种讨论的运动的代表对话时，坚持党的方针、党的立场。”

另一方面，由于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不断在反对派面前退让，最后终于承认实行多党制并放弃了苏共的领导地位，与此相适应，某些报刊转化成不受党领导的“独立”或半“独立”报刊，一些新创办的报刊成为不属于党的同仁报刊。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当局对报刊提出了第二个层次的要求，即针对所有报刊提出的最低要求。当然，党的报刊更要遵循这最低要求。

第二个层次要求主要反映在1990年8月开始生效的苏联新闻出版法中。此项法律规定，“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这意味着以任何形式，包括通过报刊和其他舆论工具发表意见和见解、寻找、选择、获得和传播信息的权利”；国家机构、政党、各种团体和年满18岁的苏联公民都有“创办舆论工具的权利”等等。另一方面，这项法律也规定，不许利用舆论工具“呼吁用暴力推翻或改变现行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宣扬“构成国家机密”的消息，“宣传种族、民族、宗教特殊性或者偏执性”等等。

1990年7月1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随着“政治多元化的实际形成”，国家电视和广播职能的行使“应该是独立于政治和社会组织的，是为我国发生的现象作客观、全面报道服务的”；不允许任何政党、政治派别或集团垄断。

在80年代直到1989年波兰政局巨变以前，波兰统一工人党认为舆论工具的作用应当是：（1）实行公开性，提供广泛信息。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1987年12月在议会说，“我党倡导公开性”；“民主的变革是同发展新闻报道和宣传密切相连的”；应使人们广泛了解国家、经济、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2）展开对话和辩论。雅鲁泽尔斯基说，“我们需要与读者和听众进行真正的对话”（1982年2月在波党七中全会讲话）；“真正的讨论，包括在大众传播媒介上已推广的讨论和辩论，是需要经常进行的”（1986年6月在波党十大的报告）。（3）实行社会监督。“要关心舆论对领导机构的活动不断发挥影响”（雅鲁泽尔斯基1985年6

月在波党二十中全会讲话)。雅鲁泽尔斯基还表示,党的宣传工作者必须“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988年2月在波党七中全会讲话);但是,波党不垄断波兰社会舆论的制造工作(1983年10月在波党十三中全会讲话)。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1988年8月通过决议说:在目前,报刊的主要使命是提供有关错综复杂的改革进程中丰富而准确的信息,它毫无例外地将各级管理机构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

保共1990年2月通过的新党章一方面规定,“党的新闻媒介是全党的机构,是党组织用来宣传党的政策、战略目标、直接任务的机构,是用来就重要的社会问题及事件、选举前的宣传和鼓动等表示态度的机构”。另一方面又说,“党的新闻媒介为所有的社会民主力量、社会活动家、记者和公民提供论坛”。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89年12月通过的行动纲领说,捷共主张“信息交流的完全自由”;“所有政党、团体、社会组织以及尊重宪法的个人具有出版定期报刊的平等权利”;“电台和电视的播放必须对所有政党、社会组织和公民平等”。

三、关于是否允许在党的报刊上展开自由论战和批评党的方针、政策、策略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总的说来是持明确否定态度的。他

们1871年9月在《伦敦代表会议决议》中写道：“代表会议预先声明，如果国际的任何机关报效法《进步报》和《团结报》，在它们的篇幅内当着资产阶级公众讨论那些只应在地方委员会和联合委员会以及总委员会的会议上、或者在联合会代表大会或全协会代表大会讨论组织问题的秘密会议上予以讨论的问题，那么总委员会今后有责任一概予以公开揭露和拒绝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60页）

他们有时也提到在报刊上展开“讨论”，但这只是为了批驳和揭露敌对分子。恩格斯1847年9月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中说：“党刊的任务是什么呢？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驳斥和推翻敌对党的妄想和论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00页）

只是在前文提到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恩格斯曾说：“你们在党内当然必须拥有一个不直接从属于执行委员会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刊物，也就是说这种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2年11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17—518页）

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但党内还没有形成马克思主义的统一领导，党内各派斗争十分激烈。在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列宁1900年9月在《〈火星报〉编辑部声明》中表示：“在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觉悟工人面前开展论战是必须的和适当的”，“我们决不反对同志们在我们

的机关刊物上进行论战”。与此同时，他在这一声明中又强调：“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机关报变成形形色色的观点的简单堆砌。相反地，我们将本着严正的明确的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全集》第4卷第316—317页）

1905年4月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别举行了自己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确定了各自的策略路线，出现了“两个代表大会——两个党”。（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580页）这以后，列宁提出，“党的政治行动必须一致。不论在广泛的集会上，不论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发出任何破坏已经确定的行动一致的‘号召’都是不能容许的。”

（《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1906年，《列宁全集》第10卷第412页）1912年1月布尔什维克正式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此后，列宁强调，“出版机构不得滥用职权。执行不彻底的党的政策。”（《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185页）

列宁明确提出，不容许反党派别在党的报刊上自由发表言论。列宁说，“工人创办自己的报纸是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了让它按照资产阶级‘学者’的心意来歪曲马克思主义。”（《给编辑部》，1914年1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81页）“必须把党的一切定期机关刊物移交给完全由共产主义者组成的编辑部。”（《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1920年7月，《列宁全集》第31卷第173—174页）在谈到坚持反对党中央的立场的波格丹诺

夫时，列宁说，“坚持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工人报纸和杂志，为什么再不让亚·波格丹诺夫参加写稿了呢？是因为亚·波格丹诺夫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的‘改变’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企图”。（《关于亚·波格丹诺夫》，1914年2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112—113页）列宁提出，“坚决无情地反对在所有文人和所有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占主要地位的下列倾向：企图把一张报纸降低到普通‘半独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表‘意见’、观点和进行争吵的机关报的水平”。（《关于副主席工作的决定》，1922年4月11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301页）

1921年3月举行的俄共（布）十大通过了由列宁提出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大会宣布禁止任何派别活动，责令立刻解散一切派别集团。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强调要在报刊上展开讨论和辩论，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实行广泛的社会监督。

他于1986年9月说，“时代的重要特征是广泛的公开性、公开讨论我国社会生活最紧要的问题、国家的发展”；“通过辩论和讨论，也许有时是热烈的讨论和辩论，甚至是过份激烈的辩论和讨论，通过摆看法和观点，通过深思熟虑，在人们的思想上以及对当前时期的独特性的认识心理上就会发生变化”。1988年6月，他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说：“公开性要求在对内政策和国际政策的任何问题上的舆论多元化，要求自由对比各种不同的观点并进行争论”。他一再强调，“对于这种讨论来说是没有禁区的”（1987年5

月答意共《团结报》问)；要“消除不受批评的禁区”(1988年10月答西德《明镜》周刊问)

在谈到舆论工具的监督作用时，戈尔巴乔夫说，舆论工具应当“成为民主监督的保障，监督决议是否正确，是否符合群众的利益和需要，然后监督这些决议的完成情况”(1987年5月答意共《团结报》问)。“我们正在党内，国家和各部门开放批评区”(1988年9月对苏联中央电视台谈话)。

“对社会监督和批评来讲，我们这里并无禁区。这也完全适用于舆论工具”(1989年7月在各级党组织第一书记会议上的报告)。

1990年2月公布的苏共中央纲领草案说，应当保障党内“意见的多元性”和“立场与纲领的多样性”。(苏共民主纲领派提出的纲领明确要求，“恢复派别和集团、思想流派自由；废除俄共(布)十大《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确认建立党内横向结构的可能性”。)

波兰党在这方面是迈步最早的。早在1982年10月，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在议会讲话中就提出实行公开性，说政府要“像在拉开帷幕的舞台上工作一样”。1983年举行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十二中全会宣布，要反对“限制公众生活的公开性，毫无理由地对党内生活实行保密，对于信息进行有选择的报道并加以美化，限制讨论，限制批评的范围”。(转引自雅鲁泽尔斯基1985年6月在波党二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81年7月举行的波党九大通过的纲领提出，要实现自下而上的监督，坚持对领导机构、政权机关进行社会监督，恢复

舆论的真正意义和作用。雅鲁泽尔斯基在波党二十中全会上强调，要“关心舆论对领导机构的活动发挥经常性影响”。

波党还主张在报刊上发表不同观点和意见，不设“禁区”。1986年6月，雅鲁泽尔斯基在波党十大上作报告时说，“真正的讨论，包括在大众传播媒介上已推广的讨论和辩论，是需要经常进行的”；“我们能容纳各种观点和意见，即使是不正确的观点和令人难堪的意见”。1985年11月他在波党第二次思想理论工作会议上说：“马列主义及其科学特性和阶级的、革命的本质，不承认有‘禁区’，不承认有可以沉默和严格保密的领域。”雅鲁泽尔斯基1987年在波党六中全会、四中全会上还宣布：“在党内可以存在怀疑、批评和持不同立场”；波党“对各种意见和观点敞开大门”。

在新成立的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的党章上规定，“党的报刊属于全党并为全党服务。各种派别均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而且权利平等。每种派别和党的领导机构均可以创办自己的刊物。”

保加利亚共产党1990年2月举行第14次特别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新闻媒介可以“组织党的讨论”，宣传“党内的联盟及党员个人的决定和观点”，“为党内所有的观点提供论坛”。“党内的联盟”也可以设立自己的新闻媒介。党“在与新闻媒介的相互关系中贯串公开性和透明度的原则”。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89年12月举行的非常代表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说，捷共主张“信息交流的完全自由”，“所

有政党、团体、社会组织、以及尊重宪法的人具有出版期刊的平等权利”，“电台和电视台的播放必须对所有政党，社会组织和公民平等”。

匈牙利社会党党章规定，“允许党内的和社会上出现的各种观点、意见和流派的存在”；承认“党内公开活动的各个派别”。它在1990年2月发表的竞选纲领说，“社会党希望新闻法能保护公开性”；“社会党不主张按党派观点来划分新闻媒介”；“新闻媒介是进行社会监督的一个重要手段”。另一方面，这个纲领又说，“新闻媒介最多只能独立于一些政党。私人报刊一般反映为其提供经费者的利益，国营新闻单位任何时候都要反映政府的立场”。

毛泽东1962年9月24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作报告时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苏联东欧事态的发展完全符合这一论断。东欧一些国家共产党人丢失政权，有诸多的内外因素在起作用，但这些国家党内外反对派几乎都是首先攻破舆论阵地，利用舆论工具给党、给社会主义抹黑，甚至造谣诬蔑，破坏了党和社会主义在人民中的威信，最后夺取了政权。

（写于1990年8月）

剧变后的波兰新闻界

王京臣

随着1989年波兰政局的剧变，波兰的新闻媒介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闻体制急剧演变，旧的新闻体系逐渐被新的新闻体系所取代，新的新闻法规开始实施；新闻媒介迈向私有化和“多元化”，西方新闻媒介趁机而入。

旧的新闻体系被新的新闻体系取代

波兰团结工会1989年9月取代共产党人掌权后，为维护其新的制度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开始颁布和实施新的新闻法规，以新的新闻体系取代旧的新闻体系。

取消书报检查法。波兰议会于1990年4月11日通过决议，废除《书报检查法》，取消书报检查制度。《书报检查法》是1984年1月由议会通过的。该法明确规定，由书报检查机关对报刊、书籍、影片等的出版发行予以监督。

修改《新闻法》。1984年1月26日，议会通过了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新闻法》。这是一部重要的新

闻法律。该法先后于1988、1989和1990年三次予以修改，尤其是后一次更是实质性的修改。当时因波兰的国名、国徽、团体都已修改，书报检查制度及书报和演出监督总局业已取消，《新闻法》也必然相应地修改。将《新闻法》中的新闻事业必须“为巩固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制度服务”，“要通过发布消息和表达意愿，为发展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服务”等等许多段落删去。

报刊私有化

剧变后的波兰报刊正迈向私有化。

允许自由办报。1990年5月1日，东欧第一家反对派报纸《消息报》在波兰出版发行。初期为每周出版2次，发行量为20万份。一周之后，即5月8日，团结工会的机关报《选举报》在华沙创刊发行，发行量为15万份。6月2日，团结工会的机关刊物《团结周刊》复刊（该刊由团结工会全国协议会创办于1981年4月，1981年12月13日波兰实行军管后停刊）。

自1990年6月起，创办报刊只需在波兰省级法院登记注册（如不登记则被罚款），而不再像以前那样需经新闻检查当局的许可。自1990年6月到1991年2月中旬，在全国已登记注册的新的定期报刊达663种。仅在华沙省法院登记的，1990年一年就有274种，1991年头45天又有95种。登记创办报刊者中很多是曾经同团结工会一起反对波兰统一工人党的

各种小党派和团体，也有不少是个人。原波兰记协主席、现任《每周评论》总编辑阿·霍夫赞竟然一人独立申办6种报刊。有些报刊刚办了几个月就因经费困难等原因被迫停刊。也有一些老的报刊，因经营管理不善、严重亏损而被迫停办，其中包括《前景》周刊、《其它等等》周刊等。

据《共和国报》1991年10月3日报道，自1989年底到1991年8月，波共出版4000多种地方报纸和杂志（其中地方杂志达1200种），但其中113种已停刊。据对656种报刊进行调查的结果是：200种是与地方当局（乡政府）有关系的，100种是由协会等创办的，100种出于私人之手。其他报刊是由公司、公民委员会、工会、政党团体等创办的。记协创办的只有3种，而教会的报刊达15种，少数民族创办的报刊达30种。

政府放弃自己的机关报。政府新闻发言人扎莱布斯基1991年2月4日说，政府放弃政府的机关报《共和国报》。政府打算同该报签订“商业合同”，想在该报刊登有意思的消息和法律文件等。《共和国报》不再为政府所垄断，也不再为政府的议会服务。

公开拍卖报刊。1990年3月20日，团结工会政府决定取消原波兰统一工人党拥有的“报刊、书籍、发行”工人出版合作社，同时决定成立该出版社取消委员会，“独立自主地”负责拍卖该社出版发行的107种报刊。公开拍卖自1990年10月29日开始，原计划1991年第一季度结束拍卖，到3月初，24种报刊已有买主，10种正在拍卖，17种等待拍卖。因

亏损而停办的19种报刊（如《前景》周刊等）无人问津，这些报刊收归国家。在报刊的买主中有党派团体，也有个人（包括外商的股份）。办报有方、一直赢利的《政治》周刊和《每周评论》周刊分别被各自报社职工成立的合作社买去。两刊也宣布各自成为“不隶属于任何党派团体”的独立刊物。工人出版合作社原有的11家印刷厂已卖掉6家。

私人开办电台和电视台

1990年10月25日，议会通过一项法令，允许私人开办电台和电视台。从此，波兰的私人电台和电视台相继出现。

波兰第一家私人电视台——“回声”电视台于1990年2月6日在波兰西南部重镇弗罗茨瓦夫市开始播音。播放的节目有时事新闻、当地消息、音乐、电影、广告等。每天播出4.5小时。

目前，私人广播电台已有四五家，大都为地方电台。位于华沙的有“Zet”电台、“团结”电台，位于克拉科夫的有“Fun”电台。“团结”电台是华沙地区的团结工会的电台，是商业—社会性电台，也报道一些新闻和政论文章。

“Zet”电台是华沙地区最有影响的电台。该台是1990年9月28日开播的。该台台长安·沃依切赫夫斯基说，他们是“白手起家”。他们一帮青年人向银行借了5万美元，另借了一台无线电发射机，在华沙市找了间房子就开播了。由于经营有方，有利可图，几个月后就还清了贷款，添置了三

台新的无线电发射机。如今迁入新居，已拥有卫星联络和电脑遥控的播音室。这位台长说，该台的收听率高，华沙地区有收音机者的半数都听该台。该台成功的秘诀在于一个“快”字。最新消息比别的电台早两个小时广播，是波兰唯一每30分钟播放一次新闻的电台。新闻在该台节目中占4个多小时，昼夜广播，比其他任何电台都多。记者在现场采访后可直接将消息播发。另一个原因是，该台现有工作人员150人，平均年龄25岁，只有3人原来在电台干过，其余为新手。这些年轻人政治上活跃，事业上积极肯干。

议会于1991年9月13日通过了《广播电视法》。该法规定，公共电视台和电台将提供消息、娱乐，为文化活动提供方便。公共电台和电视台的节目不能宣传违背法律、道德与社会利益的东西。“电台和电视台应该真实地阐述事件的多面性质并有助于自由形成公民的看法”。

根据《广播电视法》规定，波兰的电台和电视台将不再由广播电视委员会领导，而将由9人组成的广播电视全国委员会管理，该委员会由议会、参议院和总统任命。该委员会主席由委员中产生，任期3年（公民议员团希望主席由总统任命）。该委员会可以确定电台电视台用户付费标准，颁发私人申办电台和电视台的批准书，也可以批准外资不超过33%的股份公司。委员会的成员应多数是居住在波兰境内的波兰公民。

《广播电视法》目前虽经参议院批准，但总统拒绝签发，故尚未生效。此前，审批申办私人电视台和电台的申请

书仍由邮电部办理。邮电部自1990年以来规定已办私人电台和电视台需每3个月向邮电部申请办理延长有效期限的手续，但是“回声”电台自1990年2月开播以来，一次也没有办理延长手续，理由是，当初开张前已办理了批准手续。邮电部1991年9月30日又发布指示说，现有的“回声”电视台、“团结”、“Fun”、“Zet”电台均可继续存在下去。根据《广播电视法》规定，迄今的中央电视一台将成为一个电视一台（TVI）国库股份公司，而中央电视二台将权利下放，组成一个由11家地方电视台公司组成的电视二台股份公司。电台也将成立播送中央节目的电台公司，以及17家地方电台公司。

《广播电视法》还规定允许成立商业性电台和电视台。据波兰国家电讯局的消息说，波兰全国可建立3个全国性电视台，每个大城市可建1—3个地区性电视台。全国最多可建30个电视台，但迄今已收到202份开办电视台的申请书。国家电讯局认为，波兰全国性电台可建9个，地方性电台可建至少600个，迄今申请建私人电台的申请书已有583份。

波兰电视台演变引起风波

在“新闻媒介多元化、私有化”的口号下，团结工会几乎完全控制了广播电视业，将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马佐维耶茨基1989年8月就任总理伊始就借口“打破”

波兰统一工人党对新闻媒介的“垄断”，宣称“新闻媒介隶属于（团结工会）政府，因此隶属总理”。他立即任命团结工会人士为政府新闻局局长和政府新闻发言人。随后任命团结工会成员德拉维奇为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同时将广播电视委员会的三位副主席和两名部长助理（当时这5人都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全部更换。此外，中央电视台负责人及其节目负责人，一些地方电视台台长也都易人。中央电台和地方电台负责人也都有变动。

别莱茨基1991年1月4日就任政府总理后，也加强控制新闻媒介。他首先任命雅·科兹沃夫斯基为政府新闻局局长，任命安·扎莱布斯基为政府新闻发言人。1月7日任命马·泰尔莱茨基为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同时免去安·德拉维奇主席及其3位副手的职务。上述两位部长助理也被免职。据《政治》周刊报道，泰尔莱茨基主席就职头3个月就取消了广播电视委员会中的6个司局级单位，免去了46名领导干部的职务，新任命了33名领导干部。中央电视台的一些节目主持人、中央电视台的体育部主任、民意调查主任都换了新人。克拉科夫、格但斯克、罗兹、波兹南、卢布林等地的电视台台长也都换了人。广播电视委员会职工自1990年以来也被大量裁减。

泰尔莱茨基就任后不久，便把晚间新闻节目《观察家》撤掉，并解除了该节目主编达·卡尔巴尔奇克的职务。这一行动在波引起轩然大波。波兰记者们认为，瓦文萨任命的一些人在设法压制批评并把马佐维耶茨基的支持者挤出波兰电

视台。2月19日，《观察家》节目的编辑小组开始静坐示威。波兰许多知识分子认为泰尔莱茨基的行动侵犯了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波兰笔会号召在一封致总理别莱茨基的信上签名。《选举报》发表评论说，“电视台的言论自由被取消了”。

2月22日，议会新闻委员会对中央节目制作总部及地方节目制作中心发生的一些冲突表示“极大担忧”。新闻委员会指出，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必须尊重新闻工作的自由。该委员会认为，从电台撤销《观察家》节目及其他一些节目，“是有害于波兰知识分子生活，违反多元化原则的”。同一天，泰尔莱茨基宣布，他决定从3月1日起恢复《观察家》节目并恢复前编辑小组和主编的工作。3天后，即2月25日，《观察家》节目的编辑人员停止罢工。据悉，《观察家》节目计划于1991年第四季度改为《观察家报》出版。

广播电视委员会进行新闻垄断。波兰议会7月19日对波兰电台和电视台工作进行了评价，并发表了一项决议。决议说：“波兰共和国议会对电台和电视台现状，特别是对它们推行的违反舆论工具报道真实性原则的新闻报道政策表示极大不安。我们认为，限制对各种立场、观点的报道自由或者实行某种政治审查是不能允许的。”“我们不安地看到，电视台成了同议会作斗争的工具。电视台在封锁真实的消息的同时，对议会工作进行歪曲的报道。”“波兰共和国议会注意到电视台越来越多地向社会不真实地、不客观地报道国内政治生活。这在即将举行议会选举的时候尤为危险。电台和

电视台委员会的领导用自己的政治好恶来领导工作，亲近一些政治力量，疏远一些政治力量。这是不能允许的。”波兰电视台于1991年8月17日正式成立了电视新闻社。该社将取代波兰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并负责全国电视新闻的采访、编辑和发布工作。格但斯克电视中心副主任里·格拉鲍夫斯基任电视新闻社社长。其副手是有经验的波兰电视台记者安·杜尔斯基。

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7月初向报刊发出最后通牒，要他们若采用电视台的节目内容的话，每份报纸交50兹罗提。

《共和国报》就此发表评论说，该决定是非法的，《共和国报》号召其他报刊拒不付款。

通讯社的变化

1、成立独立通讯社。独立通讯社（NAP）于1989年与1990年之交，由一些独立的新闻记者们创建。社长是彼·拉赫坦。该社每天向波外交部提供最重要的国内新闻。该社自1991年9月起编发新闻稿、华沙电讯稿，介绍波兰国内政治组织、工会组织和青年组织的活动。新闻稿是根据67家报纸和144家周刊编写的，计划每周出版两次。新闻稿还有英、法文本。

2、波通社将完全独立。波通社创办于1944年，原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的耳目喉舌，受党中央的直接领导，1989年9月，团结工会政府上台后它成为政府的通讯社。1990年原社

长博·雅哈奇(原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被天主教教徒伊·鲁特凯维奇取代。新社长一上任就对波通社总社、国内分社和国外分社进行人事大换班。

波兰电讯社(成立于1918年,为当时的国家通讯社,1939年随同波兰资产阶级流亡政府一道到伦敦进行活动)于1991年2月27日与波通社合并。中央图片社(1951年成立的专供图片资料的机构)也将与波通社合并。

波通社的团结工会组织要求政府“从法律上和组织上改造波通社,调整干部和领导班子,改善波通社的经济管理体制”,否则将采取抗议活动。

鲁特凯维奇表示“波通社应停止作为政府的通讯社”,“应成为完全独立的通讯社,当然同政府合作并向政府提供消息”,目前尚未定案。波通社仍靠国家财政补贴维持生计。

3、波兰国际新闻社独立。波兰国际新闻社创办于1967年,作为波兰对外宣传总汇,“对波兰发生的事件进行解释工作”(其前任社长格翁宾斯基语)。1991年2月,原(团结工会)公民议员团新闻发言人雅·扎科夫斯基被任命为波兰国际新闻社社长。原社长扬·格热拉克被免职。波政府新闻局局长雅·科兹沃夫斯基1991年2月4日宣布,国际新闻社将成为国家新闻社,而且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新的国际新闻社并非一定跟政府相联系。

(写于1991年11月)

当前波兰新闻界的一些情况

关迪谦

1991年11月8日至20日，记者参加以周传仁为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了波兰的华沙、克拉科夫和格但斯克。在波兰的12天，正值议会大选刚刚结束、政府组阁紧张进行的时候。这个已经“西方化”的国家，看来经济、政治都面临重重困难。波兰官方承认：“波兰1991年1至10月工业生产在1990年减产25%的基础上，又下降了12%。国家财政赤字猛增，外汇储备减少，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华沙市中心的商店里充斥着西方商品，马路上奔驰着各式各样的小轿车，餐馆、酒楼比过去多了，赌场、妓院也合法、半合法化了。而大多数消费者，尤其是低工资的、领退休金的、新从学校毕业的人，却更深地陷入贫困和失业的境遇之中。用他们的话说：这里是“西方国家的物价，第三世界的工资”，“东西虽有，只能在橱窗里看看”。社会上失望、怀疑和不满的情绪增长，团结工会的威信和瓦文萨的威信都在下降，人们对政治感到厌倦、表现冷漠。这些在大选结果出乎预料、政府内阁一再难产等最近发生的事件中，都反映出来

了。在这样的经济、政治情况下，波兰新闻界的动向是错综复杂的。

3家记者协会

波兰现在有3个记者协会。

接待我们的“波兰共和国记者协会”，是最大的记者协会，是在波兰实行军管以后于1982年成立的。秘书长齐姆斯基（ANDRZEJ ZIEMSKI）介绍说：“我们的记协是继承传统的记协，会员有8500多人，占全国记者总数的70%左右，其中持左翼观点的不少。现在它以开展‘创造性的职业活动’为方针，向所有人开放，而不问其政治倾向。在最近举行的选举中，40名领导成员中，有6名是老的；15名最高领导成员中，有2名（主席波德科文斯基和他本人）是老的。它拥有自己的出版发行机构和餐厅、别墅等实体，每年各项收入包括会费在内约50万美元。同一些国际新闻组织和一些欧洲国家以及中国的新闻团体保持联系。”访问中，我们感到这个自称“传统”、“左翼”的记协，在华沙和一些地方的影响力量是实际存在的。齐姆斯基含蓄地解释说：“在波兰，它可能是个例外吧！”

和波兰共和国记者协会并立的，是“波兰记者协会”。它是在团结工会合法化时成立的。据齐姆斯基说：“这个记协号称有1500多人，其中持右翼观点的居多数，也有跨身两个记协的。”显然，它的状况和团结工会掌权的局面并不相称。

波兰共和国记者协会和波兰记者协会，一直为财产归属问题争执。双方妥协结果，共和国记协为对方腾出部分房屋，两家在一栋楼里办公。在记者求职和别墅经营等方面，也进行一些合作。但是纠纷仍不时发生。

此外，正在酝酿组织的，还有“波兰天主教记者协会”。它的情况，包括会员人数、机构组成和办公地点，齐姆斯基也说不清楚。这个记协的出现，意味着天主教会在社会各个方面包括新闻界，正不遗余力地扩充势力。

“独立”和“中立”的背后

在华沙，代表团专访了《选举报》、《共和国报》、《华沙生活报》、《政治周报》以及波兰通讯社、波兰中央电视台，同它们的负责人进行了交谈。在克拉科夫和格但斯克，也接触了当地一些报刊的编辑、记者。

《选举报》创刊于1989年5月，原来是团结工会机关报，现在支持以马佐维耶茨基为首的民主联盟。总编辑米赫尼克（ADAM MICHNIK）是著名的反对派。这家报纸成立时名义上由私营公司经营，实际得到西方国家金钱、物质的支持。副总编辑斯卡尔斯基（ERNEST SKALSKI）介绍说：“报纸目前发行50万份（包括12个地方报），周末版超过60万，是当前波兰第一家大报。每天出24版，周末40版，重大节日达到48版；同时在华沙和其它4个城市印刷。它的方针是‘客观、全面、快速、专业地’报道国内和国际

新闻。现在70%收入靠广告，1990年上半年还有亏损，下半年开始出现盈余。报纸和政府没有直接关系，但对政府政策一般持积极评价的态度；也不代表民主联盟，但赞成民主联盟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赞成自由民主大会党的观点。”

《共和国报》1944年创刊。过去是波兰统一工人党政府的机关报，1989年9月由团结工会政府接管。总编辑达·菲库斯（DARIUSZ FIKUS），由当时的总理马佐维耶茨基直接任命（他从1981年至1982年担任记协秘书长。此记协在波兰全国军管后于1982年被解散。此后他长期从事地下活动）。据菲库斯介绍：报纸发行24万，仅次于《选举报》，在全国居第二位。每天16版。特点是及时印发政府和议会文件，刊登它们的决议、计划；同时开辟经济专栏，介绍国内外经济信息。读者主要是政治、经济和其它各界上层人士，发行量的80%是预订。1991年2月，同法国埃尔桑（HERSANT）报业集团合资，对方据有49%的股份。每天清晨接收该集团的《费加罗报》电讯，从2月至今采用了204条，有关苏联的64条。1989年，政府还给予补贴（一说“免税”）。现在已有盈余，外资主要用于更新设备。

《华沙生活报》创刊于1944年。以前名为同仁报，实际受波兰统一工人党华沙市委的领导。现任总编辑和副总编辑是1990年6月派来的。副总编辑托·沃维克（TOMASZ WOLEK）自称，他反对统一工人党政府有15年了，曾失业10年。沃维克向我们介绍说：“报纸发行20万份，其中华沙市13万份，周末达到35万份。方针是‘保持民主主义立

场’，不向左右倾斜。不久以前，报纸成立股份公司，意大利撒丁岛（Sardegna）一家公司收买了49%的股份。”

从这3家大报的情况看，团结工会和它的后继党派在人事和财政上支配了它们；西方国家的大报业集团通过合资经营也加强了对它们的渗透、影响。在谈话中，尽管它们的负责人一再强调，自己的报纸是“独立”和“中立”的；却正如齐姆斯基所说：“独立和中立需要条件，包括大量资金；到现在为止，还谈不上有哪一个大报是真正独立的。”

波兰通讯社和波兰中央电视台的现状，同这些大报大同小异。

波兰通讯社 它是国家通讯社，仍受政府补贴。副社长、国际部主任米·查尔内茨基（MICHAL CZARNECKI）介绍说：“通讯社正逐步走向商业化经营，向接受电讯的新闻单位和政府部门收费。由于财政困难，还需大力精简机构、节约开支。目前正考虑成立股份公司，但不吸收外资。通讯社领导人员，将由监督理事会（成员包括总统办公室和总理办公室代表）委派。”

波兰中央电视台 是国营电视台，受政府广播电视委员会领导。副台长、国际部主任斯·诺瓦克（STANISLAW NOWAK）说：“电视台有三个频道。一台主要是新闻和政治、经济节目；二台是文化节目，包括故事片；三台刚刚建立，已播放一些地方节目。政府补贴没有保证，将来要靠广告收入和用户交费来维持。领导成员是由政府任命的，团结工会两届政府换了两茬人；以后可能由监督委员会（成员包

括总统、议会任命的代表）委派。”

值得提及的是，我们从华沙和克拉科夫、格但斯克一些报刊的编辑、记者口中，听到的一些议论：

《政治周刊》总编辑比亚克（JAN BIJAK）：“不少重要的报刊被本国和外国资本买走，不能不反映它们的立场。为了保持真正的独立，一些报刊包括我们《政治周刊》，宁可在困难条件下，走由编辑、记者共同组织合作社的道路。”这家持左翼观点的周刊创办于1957年，前任总编辑是拉科夫斯基（波兰最后一届统一工人党政府总理、最后一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目前发行量仍保持30万份。

格但斯克《波罗的海日报》前总编辑沃·希维奇茨基（WOJCIECH SWIECICKI）：“我是1953年的大学毕业生，当了几十年记者、编辑。团结工会政府成立，把我‘扔出去了’。我不得不另谋出路，和人合办了个广告性的报纸——《七天自由报》（SEVEN DAY'S FREE）。”据克拉科夫记协人员说，克拉科夫《回声报》总编辑也是被“扔出去”的。

格但斯克《海岸时代周刊》副总编辑耶·莫德尔（JERZY MODEL）：“报刊拍卖不那么干净，有政治味儿。团结工会后继党派是优先的，比如中间派协议会买走了华沙的《晚快报》（EXPRESS WIECZOROWY），独立波兰同盟买走了《在一起》（RAZEM）。他们还要买《青年旗帜报》，被编辑、记者抵制了。现在《波罗的海日报》也在拍卖，我们周刊所属的东南运输公司出价高，仍然竞争不过

团结工会，这个问题已经形成法律诉讼。”据莫德尔说，他自己过去还是位同统一工人党常闹别扭的人。

再引用齐姆斯基的一段话：“两年多来，属于团结工会的政治力量，想方设法组织自己的新闻机构和报刊。在我看来，这个努力已经失败。现在，在这些新搞的报刊中，站得住的只剩下民主联盟的《选举报》。老出版社出的报刊，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少数从左翼滚到右翼，或者改持中间立场；但是还保留了一些既革新了内容、又维护了传统的报刊，它们依然有自己的市场。人们的心理状态是，对新的仍有怀疑，对老的也不抛弃。至于那些侦探的、算命的以至色情的一类东西，有的发行量大，生命力却不强，它们当然算不上什么新闻读物了。”

两个深刻的印象

在这次访问中，我们得到的一个深刻印象是：在波兰新闻界，西方的新闻观点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传统思想还留有影响。许多记者、编辑心情很不安定；既不想回到过去，又不满于现在，更无法预测未来。西方的，特别是欧洲的报刊、广播和电视大量涌进，黄色的、灰色的东西畅行无阻，这些都引起正直的记者、编辑的忧虑。而许多新闻媒介，为右翼政治势力和天主教会把持，也遭到持传统观念以至自由思想的记者、编辑的抵制和反对。已经出现的迹象是，不少新闻从业人员除了担心失业和贫穷外，还担心失去自己的独

立。总之，随处可以听到怨言，可以感受到不满的情绪。在格但斯克，一位被戏称为“老共产主义者”的老报人，陪同我们参观一个博物馆时，指着几幅战时被破坏、战后重修建的古城照片，说：“团结工会指责共产党40多年没干好事，这是不真实的，照片就是证明。”在克拉科夫，一位大学新闻系教授、虔诚的天主教徒，明确表示反对右翼党派和天主教会关于“彻底铲除共产主义残余”的叫嚣，说：“这是一种疾病，或者说是疯狂，只有极端分子才做得出来。”同时在座的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女记者说：“我相信上帝，但是不相信那些神甫。”就连我们接触到的一些持“激进”观点的人，对当前波兰的形势，也不抱乐观态度。《华沙生活报》副总编辑沃维克坦率承认：“以前认为实现了自由市场，一切都迎刃而解，现在逐渐懂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以反对派身份批评别人容易，自己动手干就难了。”

在波兰，我们得到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除了个别例外，绝大多数编辑、记者和其他方面人士，尽管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不一样，在对中国表示友好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一些曾经到中国访问的人，交口称赞中国这几年进步快，商品丰富，秩序井然。没有来过的，也表示羡慕中国的传统文化，希望加深对中国地了解。一位老报人形象地说：大家“排着队等候着访问你们的国家”。令人难忘的是，克拉科夫市那位新闻系教授、天主教徒，60多岁了，人长得胖胖的，陪我们参观一整天，不停地走路、说话，累得气喘吁吁，临别时一再对我们说：“我爱中国！我爱中国！”波兰

人对中国表示了这样的感情，原因可能很多，但是，正如克拉科夫市记协副主席杜季克（ZDZISLAW DUDZIK）指出的那样：“重要的是，在欧洲，波兰有不少敌人；而在中国，遇到的却只有朋友。”

（写于1991年11月）

匈牙利新闻界的变化

邹国昌

匈牙利政治制度改变之前，新闻阵地主要由一个通讯社（匈通社）和四家中央报纸（《人民自由报》、《匈牙利新闻报》、《匈牙利民族报》和《人民之声报》）所占领。此外，还有匈牙利电视台，匈牙利柯苏特电台和裴多菲电台。

匈通社为国家通讯社，隶属政府。电视台和电台亦然。

《人民自由报》为当时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党报，《匈牙利新闻报》是政府的喉舌，《匈牙利民族报》是爱国阵线的报纸。《人民之声报》则是工会全国中央理事会的新闻工具。这些新闻机构的宣传方针均由党中央宣传鼓动部制定。可以说，整个舆论工具基本掌握在匈党中央手中。

戈尔巴乔夫上台，“新思维”的出现，“公开性”被强调到高于一切的地位。这一切，对匈舆论机构影响甚大，要求新闻“自由”、企图摆脱党的领导倾向日益强烈。1987年，匈牙利开始出现经济危机，党内斗争激烈，人民不满情绪增长，党中央逐渐放松了对舆论工具的控制。1988年3月，作者当时在布达佩斯分社工作。当时的匈通社外事部主

任纳吉·洛尤什就对记者说：现在，有关宣传方针主要由通讯社编委会自己来定。1987年，党中央宣传鼓动部每周还把通讯社和各中央报纸的总编召在一起，介绍国内外形势，提出一些宣传要求（此时已不是硬性规定），帮助总编掌握宣传方向。现在，连这种情况的介绍会也没有了。由通讯社和各报刊自己掌握宣传方向。

在匈党中央放松对舆论机关领导的情况下，新闻界自由化倾向迅速上升。最明显的事例是1987年12月，《匈牙利民族报》竟然刊出一批知识分子集会所作出的、同党对形势估计完全相反的决议。1987年7月间，有160多个著名知识分子在佩斯州的洛基泰莱克小镇集会，分析国内形势，并作出决议。也就是在这次集会上，建立了反对派组织“民主论坛”，它后来成为现在的执政党。现仅引用这个决议的一段话，就可看出这个决议具有多么大的煽动性。决议说：“匈牙利已陷入自己历史上一次严重的危机。他们的人民运动力量已经分化，自信与坚定性已经动摇，凝聚力悲惨地松懈，自知之明可怕地减少。他们正面临着受到崩溃威胁的经济危机。匈牙利的民族特点已史无前例地支离破碎。我们的民族失去共同的前景。”这个决议把形势描绘为一团漆黑，它无异于是向党发起攻击的檄文。当时的党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格罗斯·卡罗伊就明确指出，这是向党进攻的信号，必须进行反击。为此，匈党中央还专门召开中央会议，研究如何反击问题。然而，此时党内斗争进一步加剧，特别在1988年5月党代表会议之后，老政治局委员全部下台，“激进派”占据优

势。党再也没有能力对敌对的意识形态进行反击。相反，报刊却出现大量所谓揭露“阴暗面”的文章。正如当时党的主席卡达尔·亚诺什所说：“揭露阴暗面已成为一种时髦。”

1989年，匈党宣布接受并倡议建立多党制后，反对党纷纷建立。这些反对党一开始就注意抓舆论工具。尤其是以知识分子为主组成的民主论坛和自由民主者联盟这两个党更是这样。它们在新闻界大力招募党员，使报纸、电台、电视台逐步成为它们的宣传工具。这段期间，建立多党制的呼声、对过去40年的揭露，充斥报刊版面。它们公开宣扬社会主义道路行不通，把共产党描绘成为“独裁者”，全盘否定40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匈牙利舆论工具已成为匈政治制度改变的先行者。

1990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丢失了政权，原反对党民主论坛、小农党和基督民主人民党成为执政党。政权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匈牙利舆论工具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变化之一：报刊不再是人民的宣传工具，相当一部分报刊落入外国资本家手中。在这方面，《匈牙利新闻报》是一只带头羊。它早在政治制度变化前的1988年底就宣布出卖股份，于是外国资本家纷至沓来，经过激烈争夺，最后英国报业大王罗伯特·马克斯韦尔买走40%的股份。此后，马克斯韦尔又乘这家报纸急需扩大技术设备，硬压《匈牙利新闻报》让出更多的股份。结果，这家报纸55%的股份落入马克斯韦尔手中。

匈牙利前社会主义工人党（后为匈牙利社会党）党报《人

民自由报》也由于难以在经济上支撑，于1990年7月30日把大部分股份卖给当时的西德的阿克塞尔·施普林格公司。这样，这家报纸也就不完全为匈牙利社会党所有了。

曾是匈牙利第三大报的《匈牙利民族报》的命运也不比上述两家好。这家素以内容新颖、新闻真实、笔锋犀利、文字流畅为标榜的报纸，颇受匈读者、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欢迎。然而，就是这家自认为“具有民族气节”的报纸也不免要在外国资本家面前折腰。它在连年亏损的情况下不得不向瑞典的博尼耶公司和法国的埃尔森出版公司乞求，把40%的股份卖给他们。这个称之为《匈牙利民族报》的报纸也就不完全为匈民族所有了。

其它报纸，如《改革》周刊、《经济周报》、《观察报》、《晚报》等也都被外国资本家染指。

变化之二：报刊内容不再严肃认真，而是充满猎奇和黄色新闻。现在，人们随时可以在报刊亭橱窗上看到各种各样充满黄色画面的报刊。甚至西方记者都说，这些报刊的黄色程度并不亚于西方报刊。1990年初，美国的《花花公子》在匈问世，匈牙利成为东欧第一家出版《花花公子》的国家。名为《改革》的周刊更是充满黄色新闻，它常以刊登女性裸体照片吸引读者。仅以1990年11月23日这期为例，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东西：一幅专门展示女性线条的裸体照片，四五幅穿着各种奇装异服、袒胸露腿的女郎照。还有这样一些标题：《嘿，我只是一个热恋者，而不是疯狂的热恋者》，

《从下看更时髦》，《令人神魂颠倒的女人》，《穿着睡衣

的美人》、《她比香水还更香》。由于黄色报刊充满街头，引起不少居民和教员的抗议。为此，匈政府不得不作出“在距离学校200米的范围内不得展示黄色报刊”这样可笑的决定。

变化之三：报刊不再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而是各个党派进行争斗的阵地。现在各党都有自己的报刊，如执政党民主论坛就持有日报《新匈牙利》、周报《匈牙利》和《匈牙利论坛》。各个反对党也有自己的报纸。这些报纸都貌似客观公正，实质都具有党派偏见。如基本由自由民主者联盟控制的《匈牙利新闻报》就不断发表揭露现政府的文章。执政党也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对其他党派报纸施加影响。9月13日匈牙利记协主席团发表声明指出：“某些负责的政治力量企图限制新闻自由，一些中央机构正在利用垄断手段不允许某些报刊获得方便，并用权力来限制一些报刊的发行。”在人事任命方面，也可看出这种党派之争。1991年匈政府总理安托尔两次提出任命电视台、电台副台长的人选，都被总统根茨搁置起来，不予签字批准。这除有总统和总理个人争夺权力的因素外，也反映出执政党和反对党在争夺电台和电视台的领导权。

在争夺新闻阵地方面，外国资本家也积极插手。最近在《匈牙利民族报》，就发生外国资本家股东无理解雇几位副总编的事件。引起该报编辑部的集体抗议。匈记协主席团就此发表声明说：“匈牙利新闻界以日益忧虑的心情注视着《匈牙利民族报》事件（很遗憾，不只是在《匈牙利民族报》

发生这种事件)，从实质看，这是反民主、践踏法律的事件。”“报刊新的老板企图控制为公众服务的舆论工具，这严重地威胁着报刊的自由。”

这就是多党制下今日匈牙利报刊的面貌。

报刊情况如此，匈通社的情况又如何？匈通社原是国家通讯社，有职工2000多人。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国内各州都派驻记者。过去，它一直经营有方，年年盈余。但自匈牙利政治体制改变之后，这家通讯社却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首先它不被政府所重视。1991年，匈通社预算支出为13亿福林，而政府给匈通社的拨款却只有1.65亿福林。匈通社社长说：“我们是后娘养的。政府给匈通社的钱只够填补一点牙缝。”

其次，匈通社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1990年年底，匈通社出现巨额财政赤字，不得不以高达28%的利息向国家银行贷款6500万福林才勉强渡过难关。为此，匈通社不得不出售汽车、裁减职工、减少出版物，甚至出售原有的大楼以维持生计。

第三，匈通社前景不佳。现在匈各报刊都在进行激烈的竞争，基本都采用自己记者采访的新闻和撰写的稿件。从报纸看，除少量国际新闻采用匈通社消息外，基本都是本报消息。在非常强调“公开性”的匈牙利，匈通社已失去垄断消息的地位。面对这种形势，匈通社如何运转，确有不少困难和问题。

从匈牙利新闻界变化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

论：把“新闻自由”奉为高于一切的匈牙利新闻界今天并不自由，它不仅要受各党派争斗的制约，受经济危机的困扰，而且还要受外国资本家的约束，要看这些外国老板的眼色行事。

剧变后的保加利亚新闻界

王金柏

1989年11月10日，保共中央全会决定的人事更迭导致了领导保加利亚社会主义事业近35年的托多尔·日夫科夫政权的结束。新当选的以佩特尔·姆拉德诺夫为首的新领导强调“11月10日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标榜他们要“彻底扔掉集权主义的包袱”，“抛弃社会主义和民主集中制”，主张实行“多元化”“多党制”和“公开性”。于是社会上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抓住时机，猖狂进攻，以姆拉德诺夫为首的保共新领导步步退让，在为期几个月的执政过程中，演出了更改党名和丢失政权的悲剧。

政权的更迭和社会制度的演变，使保新闻界也在劫难逃，经历了盲目兴奋之后，陷入了困惑与痛苦的深渊。坚持党性原则的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丧失殆尽，在“多元化”和“公开性”的口号下出现了几十家党派报刊和中立于党派之间的电视台、电台和通讯社。

新闻界的演变过程和后果

1989年11月10日发生的政权更迭，在一部分感染了“民主病”的记者和编辑人员中，很快被编成了“改朝换代”的小品和政治笑话到处流传。一时间，对日夫科夫等人的指名和不指名的谴责与揭露，对新领导“变革勇气”的颂扬，充斥了电视荧屏和报纸版面。

日夫科夫被迫辞职的第二天，当时的党报《工人事业报》就在第一版右上方刊登了一位画家的素描，题为“不倦的普罗米修斯”，喻意保新领导正在以不倦的精力烧毁旧政权，开辟新时代。画的左边是该报欢呼“改朝换代”的社论。社论称11月10日的保共中央全会“有划时代意义”，是“新旧时代的更换和交替”。

接着，11月15日，新领导作出了第一件轰动新闻界的平反决定，恢复《工人事业报》记者格奥尔基·塔姆布耶夫的党籍，为他在三年前因报道日夫科夫家乡某乡党委的腐败行为而受到的开除党籍处分平反。平反决定揭露了塔姆布耶夫被处分的原委，并将记者揭发的当事人与日夫科夫亲属与亲信的关系网公开曝光。

借着这股浪潮，一些受过压制的记者、作家、学者都获得了平反，被禁止出版的某些报刊也重新问世，反对过日夫科夫的某些政客成了“英雄”。党报11月24日发表社论要新闻界“开放报刊辩论”，“实行公开性和民主化原则”，强调

变革的时代“需要各种各样的思想，需要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的人”。刹那间，报刊上的言论自由和开放程度一下子缩短了保加利亚同西方国家的距离。各种裸体照片、巧立名目的脱衣舞比赛的报道、暗娼同警察的对话、攻击共产党和季米特洛夫、列宁的文章，不断在电视节目和形形色色的报刊上出现，使社会风气日益恶化。正统的新闻工作者在其职权范围内避免编发此类新闻，却引来了“压制民主和公开性”的指责。一些反对派组织乘机集会发表声明，要求在新闻界实行人事更迭，扬言要把“公民意志较强的记者”充实到新闻队伍中去，以保障“公开性和意见多元化”的施行。

面对反对派的要求和压力，保共新领导在上台后的第18天会见了新闻界的负责人和代表，要求他们采取措施加速制订新闻法，纠正过去“压制民主和公开性”的错误。嗅觉灵敏的反对派从这次会见中悟出了他们应采取的对策，一方面阻碍新闻法出台，一方面则千方百计制造事端，煽动静坐示威和绝食，围攻电视台和电台，以求控制大众新闻工具。多次的事端、摩擦和冲突，迫使国民议会作出了全国性新闻机构非党化的决定，停止电视台和电台内部的党派活动，协调各党派利用广播和电视的原则和时间，使反对党在利用大众新闻手段方面占了上风。接着，原属于政府的保通社和原属于保共中央的索非亚新闻社、以及全国记协也相继变成了中立于各党派的新闻机构。这些机构内部的党派组织和俱乐部一律解散。在这种形势下，记协正副主席、保通社正副社长、电视台和电台的负责人以及一些报刊的主编均被撤职。

其他记者、编辑和工作人员也得声明与“红色党派”脱离关系，方可留用。

变化后的四家全国性新闻机构，财政经费比过去大大缩减，致使保通社不得不把国外分社压缩到最低数。保通社北京分社也在1991年年初关闭。电视台也大大压缩了国外采访和拍摄活动，并向西方国家开放，合办节目，以求得到西方资助。原来属于保共中央的索非亚新闻社，由于专门从事对外宣传和外文出版，从国家获得的经费在各家新闻机构中本是突出者，但在失去了依附的条件下，也只好自谋财路，除提高外文出版和国外供稿的收费外，还开辟了为外国记者提供服务、为国内各党派团体组织记者招待会等新的业务项目，并在国内扩大广告、图片等经营范围，提供经济信息，开办咨询业务和经济中介人公司，以求支撑职工的工资和奖金等。

变化后的新闻界，或由于政治原因，或由于新闻纸短缺、报刊停办等原因，不少新闻工作者处于半失业状态，部分人被迫改行。为了安置新闻界失业人员，记协不得不巧立名目，以各种形式募捐和筹集了一笔资金，以备救济失业之需。

困惑与忧虑重新出现

目前，在保加利亚新闻界，多元化和多面孔成了主要特征。从新闻角度看大致分为两类：非党化新闻机构和报刊；

维护其党派利益的派报派刊。属于前一类的是电视台、电台、保通社、索非亚新闻社和记协主办的《视线报》；属于第二类的报刊约有50多种，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是：由共产党演化过来的保加利亚社会党的《言论报》和《新时代》杂志；作为反对党联盟出现的保加利亚民主力量联盟的《民主报》；在党派纷争中持中间调和立场的广泛群众性组织祖国联盟的《祖国报》；两派农民党实现了统一之后的保统一农民联盟的《农业旗帜报》；反对党营垒中最大的党派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的《自由人民报》；保社会党内部的独立派别——独立社会党的《今日报》，等等。

在新闻报道方面，立场比较客观、态度比较严肃的除通讯社和电视台、电台外，还有保记协主办的《视线报》、祖国联盟的《祖国报》。

《言论报》虽是社会党的党报，但由于它的前身是共产党中央的机关报《工人事业报》，多年来一直是全国第一大报，至今仍保持着大报的地位，除维护社会党的立场外，对其他许多问题的报道仍比较客观、严肃。

反对党的共同报纸是《民主报》。它对许多问题的报道往往观点偏激，但由于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改进了编排和印刷技术，又经常揭示过去一些事件的“内幕”，报纸的发行量不断增加，目前已成为第二大报。

随着演变过程的深化和发展，对过去的争论已渐趋减少。新的现实迫使新闻工作者反思。一些正直的记者常常要在记者的良知、责任感与帮派利益之间作出抉择。一位政治

观点属于反对党的保电视台《一周评论》节目主持人曾向笔者诉说过他对剧变后新闻标准的困惑：1990年8月26日，位于索非亚市中心的保社会党中央大楼被一群暴力分子纵火焚烧。对这种暴力行为进行谴责和揭露是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在事件发生的当时，他出于责任心和对公开性的理解，带领电视拍摄小组冒着烈火和浓烟，冲进黑烟滚滚、火光冲天的大楼底层，用电视镜头把火烧现场和施暴者的行为记录下来。他说，“当时我是百分之百履行记者职责，在现场遭到纵火者的横眉和白眼是预料之中的。但是，事后，竟有些同行也指责我帮了社会党的忙。这实在是对记者良知的亵渎。”他认为，这种违背公开性原则的批评指责同过去处分某些讲真话的记者，性质是一样的。

剧变后的一个时期，“阵痛疗法”的经济主张和等待西方援助的幻想几乎充斥了各种报纸的版面，连社会党的《言论报》也把解救经济危机的希望寄托于西方贷款。然而，二年过去了，困扰保加利亚的经济危机却是雪上加霜，越来越深重。记者们对医治经济困难的药方和计划的效应产生了疑虑。现在，报刊上出现的关于经济困难的报道和对土地私有化可行性的争论越来越多。

在保新闻和文化界享有盛名的作家，现为《言论报》总编兼记协主席的斯特藩·普罗德夫前不久发表了一篇题为《一篇献给部长、议员和其他此类人物的读物》的文章，全然没有了他当初为政权更迭叫好的喜形于色，却现出了一脸愁容和困惑。他在文章中痛心大声疾呼：

“保加利亚书籍正在死亡。寻找赞助人。

保加利亚电影正在死亡。寻找赞助人。

保加利亚音乐正在死亡。寻找赞助人。

保加利亚戏剧正在死亡。寻找赞助人。

保加利亚博物馆正在死亡。寻找赞助人。

保加利亚读书室正在死亡。寻找赞助人。

“所有与文化相关的东西都在走向死亡。成千上万的创作者和知识分子忍受着饥饿的威胁。我经常收到哭诉信。沉重的和粗野的东西从我们的心田里淌过，打破了刚刚萌发的奢望。

“议会里最枯燥的辩论是关于精神事业的预算辩论。对人民的面包的担忧使得这种辩论成为多余的了。还谈什么你的文化！——某些议员这样说，把精力用到那些与外国投资有关的条文上去了。剧院象乞丐一样寻求救济。‘索非亚音乐周’也在乞讨……有些人可能要说，没有歌剧也行。诚然，也行，但是否理性？问题有千万个，而市场是饥饿的，况且它也不想思考这些。今天我们都在搞政治，没人对美感兴趣。如果美想存在，就得让它学会经商。一切都在出售和被出售。让文化也上路吧……是否有救呢？鬼知道！”

观点混杂的党派报刊

演变后的保加利亚实行多党议会制。大小党派只要到指定的法院办理完注册手续，都可以组织自己的活动，拥有办

公地点和报纸。由于经过合法注册的党派已达70多个，所以各类报刊充斥于市的情况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影响较大的全国性日报由原来的8家变成了12家，党派期刊增加了40多种（各种专业和学术性刊物除外）。

1990年上半年大选之前的一个时期，由于纸张需求量大，新闻纸供应紧张，各报刊向政府索求新闻纸的行动几乎造成冲突和夺抢。后来虽经调整和合并，但五花八门的报刊仍然不少。

目前能正常出版的中央级报纸有：

《言论报》，保加利亚社会党党报，前身是保共中央机关报《工人事业报》，1990年2月底保共改名为社会党后，报纸改名为《言论报》。目前是保发行量最大的日报。发行量大约在50万份上下。该报总编是斯特藩·普罗德夫，他同时兼任保记协主席。

《民主报》，议会反对党“保加利亚民主力量联盟”的机关报，是参加反对党联盟的各党派共同报纸。目前的发行量仅次于《言论报》，立场和观点往往同《言论报》针锋相对。该报主编是沃伦·西德罗夫。民主力量联盟在1991年11月的大选中获胜，现已成为执政党。《民主报》的地位也随之升迁，成了保加利亚的主要报纸。

《祖国报》，人数最多的广泛群众组织祖国联盟的报纸。该组织是中间派组织，成员在100万人以上。该报偏重文化性，政治观点往往居中。主编是柳宾·盖诺夫。

《农业旗帜报》，保加利亚农民联盟的报纸。剧变之后

的一年多时间，农民联盟曾分裂成两派，两派各有自己的报纸。后来，经过谈判协商。1991年春天，两派农民党又实现了统一，报纸保留一种，即《农业旗帜报》，口号是“为和平、面包和人民政权而奋斗！”

《劳动报》，保加利亚独立工团联合会(前身是保工会)的报纸。

《人民青年报》，民主青年联盟的报纸。

《自由人民报》，议会反对党“保社会民主党”的报纸。该报从一开始就有强烈的反共情绪，现在是反对党营垒中的“保守派”，在保大国民议会制订和批准宪法问题上同社会党持相同立场。

《土地报》，原来的《合作农村报》，是保合作总社的报纸，也是唯一的以报道农业生产为主题的报纸。

《军队报》，原来的《人民军报》。实行了军队非政治化之后，《军队报》也成了超党派的报纸。

《索非亚晚报》，是保加利亚唯一的一份晚报。

《索非亚新闻》，索非亚新闻社的报纸，用英文、俄文、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出版，观点是超党派的，在国外颇有影响。

《视线报》，保记协的报纸。该报以评论性报道和综述为多，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深入报道超过其他各报。

影响面较小的党派期刊有：

《新生活报》和《保加利亚》，捍卫民族利益全国委员会的报纸，主要影响在南部的克尔贾里地区，是针对土耳其

少数民族的保加利亚人的报纸，口号是“为人民的声音和意志而奋斗”。

《生态政策》周刊，保加利亚绿党期刊，基本方针是为保护生态环境而奋斗，口号是“人际关系是超党派的”。

《拯救》报（周刊），捍卫宗教权力、信仰自由和精神财富委员会的报纸，是反对党营垒中的极右势力论坛。该组织的主席是赫里斯托伏尔·舍贝夫修士。一年多的演变过程中，他一直是绝食示威和抗议活动的煽动者和组织者。

《生态公开性报》，是在保最早公开活动的反政府组织“生态公开性”组织的报纸。该报现不定期出版。

《选举》月刊和《民主一周》周刊，保反对派组织联盟的主要成员组织——“公开性和民主俱乐部联盟”的刊物。

《今日报》，保社会党内的左派独立派别“未来社会主义联合”派的报纸，口号是“决策的才智和远见是必须的，激动和消极要不得”。《今日报》为独立社会党党报。

《黎明报》，保民族—民主党机关报，口号是“具有保加利亚色彩的民主”。

《保加利亚周报》，保加利亚民族激进党机关报，口号是“为统一和不可分的保加利亚而奋斗”。该报的主要观点带有强烈的保加利亚民族情绪，反对对土耳其族让步。

《基督教民主报》，1990年4月新成立的保基督教民主党的报纸。

《挺进报》，是带有地区特色的“保民主中心”的报纸，主要影响力在布尔加斯地区。

《祖国言论报》，持中间立场的保加利亚“新民主”全国联盟的报纸，口号是“使祖国永远光明！”。

《祖国报》和《祖国》杂志是“祖国联盟”（前身是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的机关报和杂志。在知识界和保侨民中有较广泛的影响力。

《今日妇女》，保民主妇女联盟的杂志。

（写于1991年11月）

捷克斯洛伐克新闻事业 现状和发展趋势

杨永忠

捷克斯洛伐克原为社会主义国家，它的报刊、电台和电视台都是党和国家的宣传工具。新闻宣传的内容要受国家有关机构的统一领导和检查。

1989年底，捷右派势力利用共产党执政时期所犯的“错误”在捷发动了一场“和平演变”，推翻了共产党的领导，建立了以右派为主体的、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

新政府上台后，公开提出不要社会主义，要搞资本主义。并进而提出要在政治上实行多元化，在经济上实行私有化，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系列复辟资本主义的方针和政策。

经过1990年6月的大选后，以马里安·恰尔法为首的捷新政府执政。新总理恰尔法于7月3日在联邦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的施政纲领讲话中明确表态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要“保证新闻、报刊出版自由，坚决制止宣传媒介垄断化。政府将要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新闻事业的多元化和独立性”。

政权的更迭和社会制度的改变使得表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新闻媒介也发生重大变化。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扼

要谈一谈。

一、捷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发展情况

捷克斯洛伐克原来只有两个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一个是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又叫“布拉格广播电台”和“布拉格电视台”，即捷国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它们的台址设在布拉格，负责用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向全国及其邻国宣传国家和政府及各政党的政策和方针。

另一个是斯洛伐克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或者称“布拉迪斯拉发广播电台”和“布拉迪斯拉发电视台”，台址设在斯洛伐克共和国首府布拉迪斯拉发。它主要为斯洛伐克共和国服务，主要用斯洛伐克语向斯洛伐克进行宣传。布拉迪斯拉发电视台也向捷全国播放电视和新闻等节目。但它只用斯洛伐克语，而不用捷克语。

自从捷联邦议会于1990年通过了允许私人经营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规定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广播事业开始向私有化发展。

在日益加剧的经济困难的压力下，面对着国际商业性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挑战与竞争，国营的斯洛伐克广播电台也开始向私有化过渡。据了解，它已同邻国奥地利一家公司合作，将该电台的一个频率改为一个播放法语的商业性广播电台，名叫“CD国际广播电台”，使用101.8兆赫的频率，从布拉迪斯拉发向斯洛伐克和奥地利广播。主要内容是播放激光

唱片的流行歌曲和一些简明新闻节目。该电台每天工作20个小时，在斯洛伐克和奥地利地区相当受欢迎。

近来由法国大学联合会广播电台（FUN Radio）与斯洛伐克大学生联合会合资兴办的布拉迪斯拉发——法国广播电台（FUN Radio Bratislava）也颇引人注目。这个电台从1990年6月开始试播的，使用频率是94.3兆赫，每天工作24小时，一半时间用斯洛伐克语广播，一半时间用法语。主要广播简明新闻、世界趣闻和流行音乐与歌曲等，主要对象是青年人。

目前商业广播电台在捷克斯洛伐克还没有得到明确的肯定。然而有几家申请开办商业性电台的从业者，经国家宣传机构批准，也陆续开始营业。

据悉，捷克斯洛伐克目前已有83家私人广播电台和51家私人电视台的从业者向政府有关当局申请开播。

对捷广播和电视节目的发展趋势值得一提的是：近两年来，捷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播发西方的新闻和电影节目逐渐增多。特别是捷电视台每周六晚上，从11点左右开始播放西方的色情电影、电视和文娱节目。播放到次日早晨5时左右。

另据当地报纸近日报道，捷政府立法委员会最近正在筹备一项有关广播和电视法律草案。报道说，该法律草案将明文规定，必须打破迄今的国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垄断局面，建立所谓的“双轨制”，即除了迄今的国营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捷克斯洛伐克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与斯洛伐克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外，还将允许私人建立广播电台或电视台。但

同时还规定国营和私人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要尊重公众的利益，而不能成为一部分公民发生冲突的工具。报道强调说，此法律的目的是要帮助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很好地行使其“民主职能”。报道指出，此法律通过后，那些私营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不仅是允许的，而且也是合法的。

二、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的演变

捷克斯洛伐克新闻通讯社简称捷通社（CSTK），成立于1918年10月29日。解放后它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通讯社，为捷共起着“耳目喉舌”的作用。但自1989年事件后，捷通社宣布，它要作一个独立自主的通讯社，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和团体。但由于它主要经费来源仍然靠国家供给，所以它的主要任务转变成宣传右派控制的国家和政府以及各主要党派、团体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向国内外通讯社和报刊提供消息和新闻图片。同时也收集世界各国对捷的反应，供捷现在的执政当局决策时参考。

三、主要报纸的变化

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和平演变后，由于捷共退出了领导地位，再加上新执政当局提出了新闻自由，取消在意识形态上对新闻进行检查的制度，所以在报刊领域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以下4种情况：

1、一些刊物自行停刊。比如前捷共思想理论刊物《新思想》和《党的生活》等，因捷共在政治上失去了领导地位，它就失去了经济来源，自行停刊。

2、有的报纸改换门庭，有的报纸改弦更张。1989年事件发生后不久，前捷共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未经捷共中央批准，编委们自行决定把该报纸改换成左派报纸，1991年又改换成独立报纸。但由于此报实力雄厚，目前仍是捷全国最受欢迎的报纸。它现在的发行量为41.3万份，仍是全国报纸发行量最多的一家。

前捷共青团中央机关报纸《青年阵线报》在1989年事件后不久，编委们将其名称改为《今日青年阵线报》，该报1991年在全国的发行量仅次于《红色权利报》，共发行39.9万份。

3、一些报纸保留了原来的面貌。如《劳动报》（捷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机关报）、《农民报》（捷农民党中央机关报）和《自由言论报》（捷社会党机关报）等，在1989年事件之后，这些报纸除了报道内容方面比原来有所松动之外，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在全国也算是比较受欢迎的报纸。《农业报》的发行量为16.6万份，《自由言论报》的发行量为15.4万份，《劳动报》的发行量为14万份。

4、新创办了一些报纸。1989年事件后，右派在捷全国处于执政地位，因此，它们先后在捷创立了一些为右派势力效劳并为之说话的报纸，比如《人民报》（Lidove Noviny）、《公民日报》（Obcansky Denik）和《人民权利报》（Pra-

vo Lidu)。由于这些报纸的内容不怎么受欢迎，所以发行量不大。除《人民报》在全国的发行量达9.7万份左右外，《公民日报》的发行量为5万份，《人民权利报》仅有1.2万份。

捷共因失去领导地位后，紧接着又失去了《红色权利报》这块宣传阵地。然而捷共虽受到各种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压力，但到目前为止，按时交纳党费的党员仍有约70万人，仍然是捷最大的一个政党（执政的右派党—公民民主党仅有党员约2万人）。为了宣传自己的纲领、主张和政策，它于1991年5月份又创办了一家自己的报纸《哈罗报》（Halo Noviny），并已开始正式发行。

引人注目的现象还有，1989年事件之后，西方的英文和德文报刊，特别是色情报刊大量流入捷克斯洛伐克，尤其是捷首都布拉格和斯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发的市场。这种现象虽屡遭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宗教界人士的反对，但这种报纸的发行趋势，却有增无减。

（写于1991年11月）

德国统一后东部地区的 新闻媒介

王德峰

从1990年10月3日以资本主义联邦德国吞并社会主义民主德国的方式实现德国统一起，社会主义制度在原民德地区已不复存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在这一举世瞩目的历史大变动中，作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上层建筑范围内一个领域的新闻媒介，自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原民德党政机关报刊陆续停办

民主德国时期东部地区共有通讯社、广播电视台，各种报纸、刊物等新闻单位不下200家。德国统一后，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和各专区党委的机关刊，部长会议、所属各部以及专区政府部门办的报纸、刊物，很快就停办了。

一些同党政机关关系并非十分密切的报刊，比方说《自由世界》、《为你》、《地平线》、《体育回声报》、《晨报》等11家报刊，在德国统一后，借助于在民德各地读者中

较大的影响，曾打算坚持办下去，并且也确实维持了一段时间。但终究经受不住德国统一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和思想观念等方面巨大冲击，到1991年年中前后迫不得已相继关闭了。

广播电视为西德同类吞并

德国统一后不久，民主德国电视台就改称德国广播电视台。其用意是打算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同德国电视一台、电视二台并存成为德国第三电视台。

但是，受当局委派接管原民德电台电视台的特派员鲁·密尔芬茨尔却明确指出，德国统一后在全德国范围内只准许有德国电视一台和电视二台及所属地方台，原民主德国的广播电视台必须归附于西德广播电视体系。

这就是说由西德电视一台或二台吞并原民德广播电视台是德国当局的既定方针。为实现这一方针，明里暗里、有意无意给德国广播电视台制造了种种政治、经济、财政方面的困难，使它实在难以为继，到1991年年初，就不得不按照当局的设想，把原民德电视一台并入西德一台，其频道的绝大部分时间由原西德一台支配，作为地方台每天只能在17：20到19：58这两个多小时里自己安排节目。原民德电视二台虽然可以自己编排节目，但同样也只能作为一个东德地区范围内的地方台，主要为原民德地区观众编排节目。

此外，原民德地区的各地广播电台也已经或正在同西德邻近地区电台合并。1991年8月联邦德国各州州长已为此签

署了条约，德国当局设想，从1992年起，西德电台的节目要在原民德地区占主导地位。

报刊私有化进程大体完成

1990年3月18日民德大选之后，国营报刊私有化的问题就已在酝酿之中。到1990年9月份德国统一前不久，柏林出版社及其所属的《柏林日报》，《柏林晚报》和《广播电视节目报》就已经成了英国马克斯韦尔和德国汉堡格鲁纳和雅尔出版社合资的私人企业。1990年秋天，开姆尼茨的《自由新闻报》和哈雷市的《中德意志报》，也为西德两家私人报纸所购买，率先实现了私有化。

德国统一之后，为托管局所属的原民德专区级报纸的私有化进程更加快了步伐。1991年4月托管局决定将尚剩下的11家原民德专区报纸向私人出售后，到9月，不到半年的时间，这11家报纸已全部为西德地区性报纸买去。托管局只此一项共收入约15亿马克。

1991年11月初托管局又提出把它所属的54家报刊图书出版社私有化的计划，预计年底之前能全部售出。

另外还在讨论地方广播电视台私有化的问题，有的地方已经出现了私人广播电台。

一些新闻单位正在夹缝中求生存

德通社、《新德意志报》、《论坛报》、《青年世界报》，以及DT64青年广播电台等民主德国时期影响较大的新闻单位，虽并未随民主德国被吞并而关闭，但却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举步艰难。

它们都无一例外地改变了民德时期的编辑方针，在揭露所谓民主德国时期的问题，反斯大林、反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反华方面，比起西德地区的新闻媒介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它们也反映东德地区在统一后所遇到的问题，东德人的失望和不满情绪，严重失业及社会问题等。看起来是想八面讨好，而实际上是左支右绌，既没能博取当局的青睐，又为许多真正的，拥护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民德40年有感情的人所不满。

德通社在德国统一后自然失去了国家通讯社的地位，但又不甘心为德新社所吞并，所以早在统一之前就改成股份有限公司，大大压缩编制，裁减人员，撤销几乎所有的驻外分社，工作人员由1500减到300上下。

《新德意志报》原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机关报。德国统一后并未随之停办，而是继续作为从德国统一社会党演变而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党即民社党的喉舌。但它也变为股份有限公司，受托管局托管。工作人员一减再减，已由原来七八百人压缩到目前的70多人。影响已大大缩小，发行量大大减

少，仅剩下20000多份。尽管如此，德国当局也不放过它，1991年9月以来通过政党财产清理委员会和托管局，又发起了旨在搞垮《新德意志报》的新攻势，使这家报纸遇到几乎无法克服的财政困难。它不得不呼吁社会向它捐助。在德国当前状况下，这样的报纸前途未卜。

民德时期的全国总工会机关报《论坛报》，青年团中央机关报《青年世界报》以及青年广播电台DT64，也是在勉强维持，其处境实际上同《新德意志报》相差无几。

新闻队伍发生分化

在目前的原民德地区新闻工作者中，自然不能说就没有依然拥护社会主义的记者、编辑，但他们当中更多的是服务于所在编辑部新报道方针的工具。一些不改初衷的坚定的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或者改行，或者“提前退休”，或者加入失业者的行列。而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转到西德各新闻机构供职。不过这些人多把自己的这种一技之长作为自己谋生的手段而已。

真正出卖灵魂、卖身投靠的也不乏其人。这种人攻击起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来，言辞激烈，用语刻薄，使西方资产阶级记者行列中的一些反共老手也不得不甘拜下风。一些人过去对中国不能说不友好，可是而今反起华来凶相毕露，不惜捕风捉影，小题大做，甚至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同西方一向敌视中国的资产

阶级记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德通社驻京记者奥托·曼，中文名字马振东，在德国统一之前就改换门庭，现在是已被马克斯韦尔出版社买去的《柏林日报》驻京记者。从民德政局动乱起，他写了不少蓄意反华的文章。奥托·曼可以被看作是这种人的代表。

今后将充满更激烈的竞争

1991年年底前后，原民德地区新闻部门私有化的进程可基本结束。当局除对尚存的《新德意志报》等继续限制直至停办外，将会允许被西德报刊所购买去了的其它报纸、刊物、出版社等，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则进行竞争。

目前，这种竞争的势头就已经十分明显。1991年年初以来，这里的几乎所有的报刊都采用物质刺激手段争取新订户。一些报社把报纸拿到大街上去出售，穿着报社服装的“报童”利用红灯停车的短暂时间到车队里去兜售。一些报纸增加了星期日刊。更多的报纸则从内容和形式上下工夫吸引读者。在这种竞争中，连德国统一前后新办的报刊中也有70多家已经败北。

可以预见，随着联邦政府和联邦议院迁址柏林工程的进展，原西德地区的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对东部地区将会越发关注，一些报刊还将会重点东移。那样一来，原民德地区新闻领域里的竞争，无疑将会更加激烈。

（写于1991年11月）

罗马尼亚新闻界现状

张汉文

1989年12月罗马尼亚政局发生了剧变，尼·齐奥塞斯库政权被推翻，罗马尼亚共产党从罗政治舞台上消失。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罗新闻界也与事变前有天壤之别。

过去，罗新闻界由罗共中央领导和统管，报道方针由中宣部确定，领导成员由中宣部指派。总的报道方针是宣传、贯彻罗党中央确定的对内对外政策。在80年代，报刊、电台和电视台增加了一项新任务：吹捧齐奥塞斯库个人的所做所为。1989年12月以前，罗共中宣部定期或不定期召集新闻界头面人士开会，总结经验，确定任务。中宣部对报刊发稿控制很严，重要稿件一律交上级审批，报刊领导班子无发言权。

罗解放后，到70年代中期为止，新闻报道是实事求是的、认真的、受群众欢迎的，对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贯彻党的对外政策起了重要作用。新闻界也涌现出一批经过实践锻炼、业务能力强的骨干，确保了这项事业的发展。但

是，齐奥塞斯库在晚年大搞个人迷信，政治上独断专行，经济上决策失误，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新闻事业受其影响，每况愈下。

（一）罗政局剧变后新闻界变化情况

一、罗共中央机关刊物改名和停刊。罗第一家大报、罗共中央机关报《火花报》在政局剧变后改名为《真理报》，领导班子全部换人。原党刊《社会主义时代》在1989年12月以后改名为《思想论坛》月刊，并正式宣布与罗共脱离关系。《思想论坛》出版几期后，因无销路而停刊。

二、大多数报刊改变原有的从属关系，改为“独立”办报。如原为罗共青团机关报的《青年火花报》改名为《自由青年报》，独立办报，不与任何政党挂钩。《自由罗马尼亚报》原属罗社会主义团结阵线（相当于我国的政协）。1989年12月以后，已成为罗最大的右派报纸。《消息报》是罗首都的晚报，发行量大，读者甚多，是布加勒斯特市政府的机关报。1989年12月它改名为《自由报》，不再受布加勒斯特市政府的领导。《劳动报》，原为罗工会报，改名为《罗劳动报》，实行独立办报。

三、少数报刊成为右翼势力的宣传工具。最典型的是《自由罗马尼亚报》，它完全站在右翼势力一边，鼓吹反对共产主义。《自由火焰报》（原先叫《火焰报》）也属于这类立场突变的报刊。

四、大批新报刊问世。它们占领了相当大的新闻市场，其中一些是新建立的政党主办的，另一些是持不同政治观点的人物开办的。政党主办的报刊有：《今日报》（救国阵线机关报）、《晨报》（原为救国阵线机关报，《今日报》创刊后它改为独立办报，但倾向救阵）、《未来报》（国家自由党机关报）、《正义报》（国家农民党机关报）、《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言论报》（匈牙利民主联盟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社会主义劳动党机关报）、《全国信使报》（罗政府主办）。还有些新问世的报刊，如《大罗马尼亚报》、《蜿蜒曲折报》、《快报》、《欧洲》周报、《22周报》等，它们表面上宣称不与任何政党挂钩，但政治倾向性很强。其中《22周报》就是一家支持各右派政党的反共报纸。

五、少数民族文字报纸民族主义立场鲜明，是罗政府的反对派。少数民族办的报纸中以匈牙利文报纸首屈一指。匈牙利文报《前进报》，现改名为《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言论报》（以下简称《匈人言论报》）。这家报纸过去是社会主义团结阵线的机关报（《自由罗马尼亚报》也是社会主义团结阵线机关报），后变为匈牙利民主联盟的机关报。该联盟是匈牙利人的政党，它在罗议会中占有的席位，仅次于救国阵线，名列第二。《匈人言论报》是匈人党的喉舌。另外一些少数民族，如日尔曼、犹太、塞尔维亚、乌克兰等也办有自己的报纸，除德文报外，其余的发行量很小，影响极为有限。

六、专业报刊继续存在，只是名称和领导班子有所改

变。《体育报》改名为《体育运动报》《社会主义农业报》改名为《罗马尼亚农村报》，《保卫祖国报》（罗军报）改名为《人民军报》，《为了祖国》月刊（内务部机关杂志）改名为《自由祖国》月刊，《世界》周刊（介绍罗外交政策和国际重大事件）改名为《今日世界》周刊，《经济周刊》改名为《经济论坛》，《新时代》月刊改名为《世界博览》。

《妇女》杂志、《科技报》、《首都文化周报》、《历史杂志》、《罗马尼亚画报》等报刊未更名。

（二）几家大型报刊介绍

1、《真理报》，1989年12月以前叫《火花报》，1931年创刊，是罗共机关报，1989年12月23日改名叫《人民火花报》。二天后，即12月25日又易名为《真理报》。是罗最大的日报，日发行量在100万份左右。齐奥塞斯库政权被推翻后，该报执行独立办报方针，不受任何政党左右（注：政局剧变后，罗国内有数十个政党问世），但在国内外重大问题的立场同救国阵线以及1990年5月救国阵线组成的政府接近。从1991年下半年起，《真理报》与救阵拉开距离，在一些问题上采取中立态度。

目前该报不设社长、总编、副总编等职，由“指导委员会”领导报社全盘工作。“指导委员会”由5个成员组成，他们是：杜·蒂努（前国际部副主任）、塞·安东（前报社编委、现罗记协主席）、维·塞洛然（前国内部副主任）、

克·图·波佩斯库和康·帕维尔。该报原社长达·诺沃恰努（罗著名西班牙文翻译家，因翻译西班牙长诗而在西获奖）在1991年年初因意见分歧退出报社。

《真理报》在宣传报道中对中国态度比较友好，经常刊登关于中国的消息和文章，其中绝大部分比较客观、友好。1991年1月10日该报发表该报社记者写的文章说：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贫困和饥饿的国家，达到了相当繁荣的水平，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文明的社会，她所达到的发展水平甚至连东欧都难以与之相比；现在，应该纠正历史上对中国的偏见。但由于该报标榜新闻自由和对中国情况不了解，有时也根据西方来源刊登一些有损我形象的消息和报道。1989年12月以后，《真理报》保持了与我《人民日报》的定期交往关系。

2、《自由罗马尼亚报》，1943年创刊，1989年12月以前为罗社会主义团结阵线机关报，此后改为独立办报。该报发行量约为40万份，是罗第二大报。1990年1月罗极右派分子马齐鲁（救阵前副主席）疯狂反共，《自由罗马尼亚报》同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通过揭发此人的真面貌使马齐鲁名声一败涂地。但从1990年2月起该报发生了急剧变化，完全站到了右翼势力一边。该报标榜独立，但立场偏激，经常攻击共产主义，同政府唱对台戏，在罗被视为右派报纸。

《自由罗马尼亚报》社长奥·帕列尔，作家，原为罗共中央委员、大国民议会代表、记协主席。此人政治态度右倾，是新闻界右翼势力的代言人。该报有两名主编。他们是米·克良格和彼·伯干努。

《自由罗马尼亚报》对中国的态度有两面。一方面，愿与我发展关系，主动要求与《光明日报》恢复交往，并在1990年由主编米·克良格率团访华，回国后发表了不少在中国采写的报道，赞扬我国在各方面的成就。该报记者维·拉扎尔曾发表文章，称赞我改革说：中国放弃了教条和经济上的过度集中、闭关自守的做法，全面实行改革，因而取得了巨大成就；对外开放是中国采取的最有生机和最有成效的措施；现代的中国使人震惊，中国的繁荣出人意料；实践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比苏联的改革搞得好。另一方面，该报从右翼立场出发对我国内政策亦有不同看法，经常发表一些诸如审判罪犯、处决罪大恶极分子等消息。1991年1月罗总统伊利埃斯库访华时，该报刊登一些照片、漫画，攻击伊利埃斯库访华是为了学习“天安门广场经验”。

3、《自由青年报》，前身是罗共青团机关报《青年火花报》，1989年12月以后该报宣布独立办报。其政治立场偏向救阵和救阵领导的政府。该报愿意同中国发展关系，1990年11月该报主编斯·米特罗伊应《中国青年报》邀请来华访问。米特罗伊认为我虽在经济上取得了成绩，但人民还缺乏“自由”。该报曾援引西方报刊歪曲我解放军入藏、“六四”平暴，胡说什么中国“因血腥镇压天安门的示威者而招致了国际社会的制裁”。

4、《自由报》，1989年12月以前叫《布加勒斯特消息报》，是布加勒斯特市政府机关报，相当于该市的晚报。罗政局剧变后，该报在罗国内重大问题上立场比较温和，表态

更多地倾向政府，不刊登反对共产主义的文章。该报刊登国际新闻少，对华报道不多。这家报纸新的领导成员多次向我记者表示，愿意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并想同中国某一报纸建立往来关系。它的发行量为40万份。

5、《**全国使者报**》，1990年下半年创刊，是政府主办的报纸，在首都发行。该报以消息和经济信息为主，评论较少。该报对我态度比较友好，对中国对外关系大事报道客观，对罗总统、总理助理（副总理）访华也报道得全面、充分。但该报偶然也发表对我不友好的文章。

6、《**晨报**》，1990年1月创刊，起初为救国阵线机关报，但1991年4月《**今日报**》（救国阵线机关报）创刊后，它宣布独立办报。在该报工作的负责人、记者、编辑都是救国阵线成员或同情救国阵线的人，因此报道方针与《**今日报**》雷同。发行量35万份。在对华报道方面，《晨报》在所有的罗政治性报刊中对中国最友好，创刊以来未见有反华言论。该报积极要求与我报刊建立联系并应上海《文汇报》邀请在1991年派团访华。

7、《**今日报**》，1990年4月创刊，是执政党救国阵线的机关报，发行量20万份。亚·伯尔拉德亚努（罗参议院议长、前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为名誉社长。该报在社会主义、共产党、民族问题上立场较为温和、不偏激。该报对华友好。

8、《**未来报**》，国家自由党机关报，1990年2月创刊，是右派反共报纸，知识分子是其主要读者。该报经常攻

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1990年5月产生的罗政府的内外政策。该报对我态度不友好，经常发表有损我国形象的报道。该报社长阿·丁卡曾著文攻击我对内实行“扼杀国内反对派声音”的政策。

9、《**正义报**》，国家农民党机关报，1990年2月5日创刊，刊头上写着：“反对共产主义的机关报”。该报政治观点同《未来报》相同，是典型的右派报纸。该报对我不友好，经常攻击我内政、外交，诬我镇压“民主”，说我改革更多是为了“换取西方的信任”，改革并非“真心彻底”。主编帕乌内斯库，作家，解放后被捕（1947—1964年），1972年逃往西德，1989年12月政局突变后回国。发行量不详。

10、《**大罗马尼亚报**》，是1990年4月创刊的政治小报（周报），政治观点倾向救国阵线。该报常发表一些在别的报刊上见不到的东西，如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前党政领导人答记者问等。罗匈关系、罗族与罗境内匈族人关系是报道重点之一。该报对匈族人时常流露民族主义情绪，因此是罗境内匈族人最反感的报纸。社长为尤·巴尔布（名作家、前罗共中央委员），总编辑是科·伏·图多尔。

11、《**蜿蜒曲折报**》，1990年1月在布加勒斯特创刊。这家政治小报常刊登一些道听途说的政治、社会新闻，消息可靠性不强，但不少人爱读此报。该报创刊后经常发表一些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救阵的报道。1990年9月，齐奥塞斯库时期的红人帕乌内斯库（诗人）当了该报总编，使报道方针有很大改变。

12、《**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言论报**》，原为社会主义团结阵线机关报，称《前进报》，1989年12月以后成为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联盟的机关报，用匈牙利文出版。发行量为30万份。主编为贾尔马特·亚诺什。

13、《**欧洲**》**周报**，1990年年底创刊，主要报道罗国内政治、经济动向。该报支持罗社会主义劳动党（该党自称是罗共的继承党），反对各右派党和救国阵线中罗曼派。

14、《**今日世界**》，原为《世界》周刊，先由罗新社主管，后脱离罗新社独立经营，是宣传罗对外政策和介绍国际重大事件的杂志。对外表态比较谨慎，一般是客观报道，评论很少。对我态度友好，愿与我发展关系，已同我世界知识出版社恢复了关系并开始了人员交往。该刊经常发表有关中国的报道。但一些文章中也有对我不友好的言论。

15、《**经济论坛**》，原叫《经济周刊》，侧重介绍政府的经济政策，经济学术研究，不参与党派之争。已同我《经济日报》恢复了交往关系。该刊刊登过介绍我改革开放的报道。

（三）罗马尼亚新闻社

1989年12月后，罗马尼亚通讯社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名称的改变。1990年1月2日由罗马尼亚通讯社（简称罗通社）改为罗马尼亚新闻社（简称罗新社）。原有的领导班子全都下台。社长亚·约内斯库（罗共中央委员）退休回

家。其余的副社长、总编室负责人也都离开了罗通社。但中层领导干部、记者编辑队伍绝大多数人留下继续工作。政局突变后的罗临时政府在1990年1月立即任命了新的社长和副社长，明确规定罗新社是罗国家通讯社。

罗新社下设总编室、国内部、国际部、对外部、摄影部、技术局、经营局等。罗新社对外用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发稿。它在罗国内40个县（相当于我国的省）均有常驻记者，负责向总社发稿。罗新社在70年代以前曾有驻外记者，如在莫斯科、北京、巴黎、维也纳以及东欧各国首都都有常驻记者，但后来罗共中央以外汇短缺为由不再向国外派常驻记者，只是在国外发生重大事件时才派人临时出国采访。因此，在七八十年代罗通社主要根据包括新华社在内的世界大通讯社的消息来源编发国际新闻稿。

罗新社现任社长尼亚库·乌德罗尤生于1940年4月3日，布加勒斯特工业学院毕业，曾在几家报社和电视台当编辑，1979年起任罗通社责任秘书（社一级编委），曾作为罗通社特派记者在国外（联合国）工作。他在美国进修一年，通晓英语。出版过几部通讯集和新闻专业著作。1989年12月以后被政府任命为罗新社社长。乌德罗尤在1991年1月曾随同罗总统伊利埃斯库来华。1991年5月20日至6月3日率领罗新社代表团访华，并在京同穆青签署了新华社和罗新社之间的新闻合作协定。乌德罗尤说，中国搞改革开放是正确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是高速度的，社会发展的实践是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中国搞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也

只有中国取得了成功。

（四）罗广播电视事业现状

罗马尼亚的广播电视也比较发达，是一种相当强的宣传工具。1989年12月事变期间，反齐奥塞斯库的人先占领电视台和电台，进行煽动，使局势迅速发生变化。1989年12月以前，齐奥塞斯库以缺电为借口，使电视台每天只有3小时播放时间，而且播放的节目政治性过强，说教太多，结果收视率相当低。罗政局剧变后，广播电视也出现了根本性变化，节目时间长，内容繁多，收视率比过去大大提高。

过去，罗由“广播电视委员会”统管全国的广播电视。政局变化后，该委员会被取消，政府设立了“罗广播电视台”，并任命了这个台的总裁和总台长。电视台、布加勒斯特电台和地方电台受政府控制，播放的节目不得与政府的现行政策相违。到1991年11月为止，罗只有一家政府开办的电视台，没有私人电视台。首都和地方电台也均由政府主办，不受非执政党的领导。

（写于1991年11月）

实行多党制后的南斯拉夫新闻媒介

王 森

1990年南斯拉夫实行多党制后，南新闻媒介发生巨大变化。原南共联盟党刊党报停刊、官方新闻工具纷纷独立，各种党派刊物和私人刊物出现。南统一的新闻体系解体。在“新闻自由”的幌子下，新闻媒介成为各共和国执政当局推行民族主义政策的工具。

一、实行多党制前新闻媒介概况

据南斯拉夫1988年统计，南斯拉夫全国共有4400多种报刊、220多家电台、9家电视台和一家通讯社。在4400多种报刊中发行量较大的报纸有20多家，其中全国性的有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以下简称“社盟”）的机关报《战斗报》、南共联盟机关报《共产主义者》周报、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机关报《劳动报》、青年联盟机关报《青年报》、南斯拉夫人民军机关报《人民军报》等，其余报刊大多数为各共和国、自治省、市、区、厂矿、机关、学校、文化和社会团

体等部门的刊物。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报纸主要是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的报纸，在塞尔维亚是《政治报》，克罗地亚是《信使报》，斯洛文尼亚是《劳动报》，马其顿是《新马其顿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是《解放报》，黑山是《胜利报》，伏伊伏丁那自治省是《日报》，科索沃自治省是《再生报》。

这些社盟主办的报纸由社盟领导，办报方针由社盟确定，干部由社盟选定。由南共联盟主办的党报《共产主义者》周报和党刊《社会主义》的办报方针和干部任命均由南共联盟确定。党刊党报主要刊登有关党的各级组织的活动、党内生活、党的方针政策、对外关系情况和理论文章等内容。

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电台和电视台由各共和国和自治省政府管辖，而全国性的通讯社南斯拉夫通讯社则是联邦政府管辖。

根据南斯拉夫宪法和有关规定，南斯拉夫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是真实、客观、全面。南公民享有充分的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但记者和编辑应对所撰写的新闻和报道负有完全责任，应符合国家法律和党的方针政策。一旦报道触犯国家法律规定，有关人员则须承担应有的政治责任和刑事法律责任。

二、南共联盟党报党刊被取消， 社盟的刊物独立自主

1990年南实行多党制后，南共联盟因出现内部分歧而宣

布解散，南共联盟主办的机关刊物《共产主义者》周报和《社会主义》杂志随之停刊，报社全体职工被迫失业，只好另谋生路。1991年11月，《共产主义者》周报社又将其办公楼拍卖。

随着南共联盟的解散，原由南共联盟领导的各政治组织的统一战线南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和各共和国、自治省的社盟组织随之消失，它们或变为社会党，或变为社会民主党，而由其主办的机关报也随之变为独立自主的刊物，其财政、编辑方针和干部选聘完全自理。

南斯拉夫实行多党制后举行了多党制选举，各共和国和自治省选出的多党制议会和政府取代了原来由南共联盟领导的议会和政府。根据1990年初南斯拉夫议会通过的“企业法”、“社会资本法”和“外资法”的规定，原来由政府领导的电台、电视台和通讯社均变成独立自主的新闻单位而失去政府官方机构的性质。

三、官方新闻媒介走向私有化

1990年南议会通过的旨在实行私有化和向市场过渡的一系列法律，使南斯拉夫摒弃了实行45年之久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放弃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而改为公私混合所有制和私有制，南斯拉夫的工矿企业变为股份公司，南公民和外国公民及公司均可向南企业投资或建立独资企业。根据这些法律规定，南斯拉夫的新闻媒介也均由公有制变为公私混合所有制。

或私有制。

在实行私有化方面，南国内最有影响的《战斗报》走在了前面。1991年3月，由于国家停止向原官方新闻单位提供资金，造成《战斗报》资金不足而一度停刊。为了补充资金，1991年7月《战斗报》决定发行总值为4.8亿第纳尔的股票，吸收社会剩余资本，把该报变为股份公司。在所发行的4.8亿第纳尔股票中，该报原创建者南联邦议会仅象征性地投资5万第纳尔，占总资本的万分之一。《战斗报》投资14395万第纳尔，占总资本的30%。其余向社会公开发行的70%的股票，可由公民和社会团体任意购买。

通过这一步骤，《战斗报》将从一个过去依附国家和党的刊物变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多元化的、超越国家和党派的现代化的股份公司”。它不再是任何政党和国家机构的机关报，也不再依附任何一个政党和国家机关。在新的“战斗报股份公司”中，国家的影响将变得微乎其微。新的《战斗报》的一切事务将由股份公司自行管理。该公司将设立由80名股东代表组成的股东大会和由20名成员组成的管理委员会。股东所持股票数量决定股东的管理权的多少。股东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它的职能是决定报社章程、发展计划、工作纲领、经营政策、编辑方针和财政事务等。管理委员会是股东大会的执行机构，由股东大会任命，它的职能是负责日常工作、制定工作计划、编辑方针，任命公司经理和总编辑等。

《战斗报》计划通过改革，在3年内由1991年发行7万

份增刊11万份，年收入达到300万美元。

其他一些报纸也准备采取同样步骤，或计划同外资合作，允许外国资本投资。1991年11月，贝尔格莱德的《时代》周刊已同法国一家报业公司签订了联合投资合同，准备共同出版该刊。这是南斯拉夫第一家与外资合资经营的刊物。

四、私人新闻媒介应运而生

随着所有制多元化和公有企业私有化进程的发展，南国内私人报刊纷纷出现。一些政党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纲领和扩大本身影响，也开始创建自己的刊物、电台和电视台。尽管南迄今没有公布有关新闻媒介私有化的数字，但这种私人刊物和党派刊物已为数不少。仅塞尔维亚就有88家私人报纸。目前已初具影响的有《时代》周刊、《自由克罗地亚》、《独立日报》和《共和国报》等。1991年11月，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组织还成立了“阿克萨”和“米纳”新闻社。

1990年8月，以南斯拉夫总理马尔科维奇为首的改革党以联邦政府的名义在萨拉热窝筹建了“尤特尔”南斯拉夫电视台，同各共和国的电视台展开竞争，宣传自己党的观点和报道“南斯拉夫的真相”。鉴于资金不足和注册期限届满，南联邦交通和通讯联络部于1991年10月决定暂时禁止该电视台继续广播。但该电视台台长德·斯坦科维奇声明说，他不会服从联邦机构的决定。同时他已表示该电视台将重新申请

延长注册。

五、南斯拉夫原有统一的新闻体制解体

新闻媒介已成了各共和国和各党相互争权夺利和推行民族主义政策的工具。

由于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各共和国纷纷独立，250多个党派之间纷争，南原来统一的新闻体系四分五裂，原全国统一的新闻组织机构变成了以共和国为单位的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新闻组织。各共和国电台和电视台共同体已不复存在，联合广播节目取消。联邦新闻机构失去权威性，各共和国的新闻机构和新闻媒介各行其是。“新闻自由”成为各共和国执政当局控制舆论的“自由”。新闻媒介完全变成了各共和国执政当局推行民族主义政策的工具。

在宣布独立的克罗地亚共和国，《信使报》实际上已成了克罗地亚执政当局推行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工具。在克罗地亚谋求独立的行动中，舆论界起了不小作用。它们同塞尔维亚舆论界一直论战，争吵不休，极力宣传和煽动民族主义，从而加深和扩大了两个共和国之间的矛盾和仇恨。塞尔维亚的《政治报》实际上也成了塞尔维亚执政当局推行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工具。它极力宣传和煽动民族主义、煽动塞尔维亚族对克罗地亚族的民族仇恨。在这种民族主义宣传中，斯洛文尼亚的《青年报》最为突出。还在1989年南斯拉夫没有分裂前，《青年报》即首先攻击南斯拉夫人民军，进

行反军反共宣传，攻击塞尔维亚，鼓吹取消人民军，将兵役制改为不拿枪的“民役制”，同时极力鼓吹斯洛文尼亚独立。应该说，这家《青年报》在分裂南斯拉夫和鼓吹斯洛文尼亚独立方面，起到了“先锋”作用。

为了对新闻媒介施加影响，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独立后立即建立了自己的新闻社——斯洛文尼亚新闻社和克罗地亚新闻社。内战期间，为了控制新闻界，斯洛文尼亚还实行了新闻检查。1991年11月9日，克罗地亚议会也发布关于实行新闻检查的命令，禁止新闻媒介报道战场上的战况、军队动向、作战计划、部署情况和后勤供应情况等。规定各报刊所发表的新闻报道必须经过克罗地亚共和国新闻部审查才能发表。否则，对任何违法者将处以5年以上徒刑。不久前，克罗地亚当局还通过一项《战时新闻法》。根据这项法律，克罗地亚当局以“威胁克罗地亚独立和完整”为名，相继将《新马其顿报》、南通社和《政治报》驻萨格勒布的记者驱逐出境。

塞尔维亚也对新闻界加紧控制。塞尔维亚当局不久前通过一项《塞尔维亚电台和电视台法》。这项法律规定，只有塞尔维亚政府才有权创建电台和电视台，塞尔维亚所属贝尔格莱德电台和电视台、伏伊伏丁那电台和电视台以及科索沃电台和电视台的台长及管理委员会都必须由塞尔维亚政府任命。通过这一法律，塞尔维亚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的宣传工具已完全控制在当局手中。

（写于1991年11月）

阿尔巴尼亚新闻界的变化

王洪起

阿尔巴尼亚自1990年年底开始实行多党制以来，政局一直剧烈动荡，政治、经济、社会形势十分严峻。这个国家的新闻界，犹如其它社会领域一样，目前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新闻界原状

长期以来，阿尔巴尼亚唯一的执政党——劳动党（即共产党）始终领导国家的新闻工作并占独一无二的优势，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介均属党、政府领导的社会团体所有。从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的创办，领导人员的选择与任命到编辑、报道方针的制定等，统统由党和政府审查批准（由党中央新闻处主管）。新闻媒介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组织群众，为实现党在各个时期的任务为中心。各种新闻工具均得到国家的大量补贴，尤其是电台、电视台的费用、设备及各家主要报刊的新闻纸张的供应，都得到优先且绝对的保证。

阿尔巴尼亚通讯社（简称阿通社）是全国唯一的通讯社，成立于1944年12月29日。它作为中央官方新闻机构，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言人”，它“根据党的马列主义原则和霍查教导，宣传党的政策，反映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祖国等各领域取得的成就，反映党在国际上执行的方针，为各家报刊和广播电视提供国内外新闻”。

地拉那广播电台系国家广播电台，对外用20余种语言播音，另外在四个边区设有四家地方广播电台（科尔察、库克斯、斯库台和吉诺卡斯特广播电台）。阿尔巴尼亚电视台为国家电视台，1981年开播彩色电视节目，是全国唯一的电视台。电台与电视台统属广播电视总局。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为其规定的任务是，“它作为新闻宣传与教育群众的重要工具，要广泛反映劳动群众的生产、社会和文化活动。”

阿尔巴尼亚全国共有120余家报纸和杂志，总印刷量达6400万份，其中主要的是“中央八报二刊”：阿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之声报》、民主阵线机关报《团结报》、工会机关报《劳动报》、军队机关报《战士报》、青年团机关报《青年之声报》、作家艺术家协会机关报《光明报》以及《人民体育报》和《教师报》；劳动党中央机关刊物《党的道路》和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所学术刊物《政治—社会研究》。另外，阿尔巴尼亚全国26个行政区的区党委均有机关报（每周2期）。这些报刊统称为“人民报刊”，其宗旨是：“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的学说为指南，反映人民为

社会主义建设而进行的各种活动，宣传和解释党的路线，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其特点是：“高度的党性、原则性、真实性、战斗性及同反动思想斗争的不妥协性”。

阿尔巴尼亚的上述新闻媒介自创立至1990年年底之前，其性质一直没有改变。但是，应当指出的是，长期以来，阿已故领导人恩·霍查一直推行极左、僵化的方针路线，使阿尔巴尼亚成为“贫穷社会主义”的典型。作为执政党和政府的舆论工具的通讯社、报刊、广播电视，一直片面强调其宣传职能，往往报喜不报忧，甚至好大喜功，大搞个人迷信，霍查语录满天飞，霍查形象无所不在，报道内容枯燥无味，形式千篇一律，内容雷同。阿《人民之声报》原总编辑纳米克·多科尔承认，“在霍查时期，《人民之声报》讲了许多假话，但有时也讲真话。”其结果是，报刊的读者人数不断下降，广播电视的听众与观众日益减少。据笔者了解，多年来，阿尔巴尼亚群众最喜欢读的报纸是《人民体育报》，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是足球实况比赛，更有不少人收听、收看周边国家（意大利、希腊、南斯拉夫）的广播与电视节目，收听“美国之音”和英国BBC等电台的广播。

新闻界现状

自1990年以来，阿尔巴尼亚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尤其是在西方极力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东欧各国发生的剧变的冲击下，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特别是从1990年冬

开始地拉那的青年学生在地下反对派的鼓动下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并且提出了要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宗教自由及自由建党、自由选举”等“五大自由”的口号。原阿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现任总统阿利雅迫于内外压力，允许实行多党制，从而导致全国局势急转直下而不可收拾。正如他不久前多次所称，“阿尔巴尼亚目前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形势不仅严峻，而且危险，甚至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面对日益恶化的局势，已经由执政党沦为参政党的劳动党（现已改名为社会党）放弃了原来的原则立场，不断妥协让步，实现了自身的蜕变，由它控制的舆论工具实现了非政治化和非党化，应运而生的其他反对党也竞相出版自己的报刊，为全面夺取政权大造舆论。

阿尔巴尼亚第一个反对党——民主党于1990年12月获准成立之后不久，便在党纲及竞选纲领中同时提出“新闻自由、独立”的要求，并打着“新闻应当客观、真实”的旗号，实现新闻的“公开性”、“透明度”和“民主化”，妄图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加剧信任危机，使人们看不到国家的前途。它们通过种种方式和手段占领新闻媒介阵地、扩大影响，逐步改变其性质。

1、通讯社、广播电视实行非党化和非政治化。

在反对党的压力下，于1991年召开的首次多党议会相继通过《新闻法》及其他有关法令，规定：阿尔巴尼亚通讯社、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为法人和政府的直属机关，并从属于

议会、接受议会的监督；它必须独立于政党，其中工作人员不得参加任何政党和政治组织，已是党员者必须以书面方式声明退党，确保新闻自由、禁止新闻检查，禁止垄断新闻媒介；新闻活动坚持客观性、透明性、平等性、独立性、多元性，并遵守道德准则；经费自理，等。

这些法令公布后，反对党领导人宣称，“这是反对党取得的巨大胜利”。然而，他们为了加紧夺权，并不甘心于此，而是企图全面控制舆论工具。就在苏联发生“8·19事件”之后，民主党便指责阿通社及电视台仍为“保安机关和秘密的共产党人服务”，并扬言采取“决定性措施”，实现“真正的民主”。该党还纠集共和党、社会民主党这两个有影响的反对党一起集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其中特别强调：

“一些新闻媒体、广播电视、阿通社、地方电台和报纸目前仍起着一党专制工具的作用，对民主自由思想实行新闻检查。因此，我们要求按社会多元化的新结构重新改组新闻机构。为此，议会有关部门应当干预更换广播电视台台长及各编辑部主任，用联合执政的各党一致同意的人取而代之，议会新闻委员会要成立一个多党委员会对广播电视台实行监督。”声明还要求：“为各党机关报提供同等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各区多党执委会应根据新的形势任命地方报刊的编辑人员，并将编辑部置于自己的隶属范围”（原属劳动党区委会机关报）

1991年9、10月份，在以上三党的鼓动下，独立的自由工会曾多次组织罢工和绝食活动，要求撤换新闻媒介的负责

人，要求广播电视台尽快制订工作纲领和章程，致使新闻界再次出现混乱。

2、劳动党机关报改头换面。

1991年6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召开了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这次被称为“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的大会上，劳动党改名为社会党。随即，党报《人民之声报》报头上“镰刀与锤子”的图案以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也同时消失，党刊《党的道路》宣布停刊，并于7月份开始发行新的社会党机关刊物《今日》。由于劳动党中央与马列主义研究所被关闭，其学术刊物《政治—社会研究》也自然消亡。

由于社会党的威信大幅度下降，其党报党刊的发行量也急剧减少。目前，《人民之声报》的发行量只有2.7万份，而过去则高达12万份，系全国第一大报；党刊《今日》的发行量仅5000份，其前身《党的道路》曾发行数万份。

《人民之声报》原总编辑、社会党全国领导委员会成员多科尔曾表示：“为了使《人民之声报》更少一些共产主义的味道，也考虑改名”。近几个月来，该报主要报道了如下方面的内容：批判劳动党和霍查的错误，要求社会党员与过去划清界限，强调阿尔巴尼亚目前的危机是霍查选择和推行的政治制度造成的；不断发表专文，公布有关数据材料及事例，揭发批判前领导人的特权、腐败行为，甚至提出“将他们送交法庭审判”，呼吁“尽快填补目前的意识形态真空”，并声称，阿尔巴尼亚“从过去称为社会主义向被全世界称为

资本主义的社会过渡，是时代的需要”，竭力宣传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失败了，过去的经济模式、政策和意识形态失败了，而“民主社会主义才是解决第三世界和东方国家发展问题的途径”。与此同时，该报还连篇累牍地介绍西欧社会党掌权的经验。不难看出，今天的《人民之声报》已经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

3、《团结报》标榜中立。

《团结报》作为阿尔巴尼亚最大的社会组织——民主阵线的机关报，原系全国第二大报，发行量达5万份。1991年7月，民主阵线正式宣布进行“彻底改革与改组”、不再是“劳动党为达到其目的而使用的工具和传递带”、不属于任何政党，而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的全民性组织”，其机关报也将成为一个“更加民主、更具趣味性和可读性、更贴近各阶层人民的报纸”，它作为一份“完全民主化、多元化的机关报，独立于各政党，反映各党派团体的观点与活动”。

¹1月，该报正式改名为《民族团结报》。

近期以来，该报大量刊登阿前领导人搞特权、挥霍浪费的“调查报告”，也曾刊登一些对我国不甚友好的文章。据透露，该报已与美国之音电台阿语广播部进行了接触。目前，其发行量约3.3万份。

至于其他原有报纸，如《光明报》、《青年之声报》等已成为观点十分“激进”的报纸。其观点并不亚于反对党的报刊。

4、各反对党派的报刊纷纷出笼。

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根据人民议会主席团于1990年12月17日颁布的关于允许成立政治组织和团体的法令，同时根据反对党的要求，于当年12月28日作出决定，允许各社会政治组织与团体出版报纸、刊物及其他出版物。决定中规定，所有报刊和出版物不得有法西斯、种族主义、鼓吹战争和反民族的内容，不得挑动民族仇恨，不得号召以暴力推翻宪法规定的社会制度，不得鼓吹恐怖活动和煽动宗教、地区分裂活动，不得要求外国人干涉阿内政，不得泄露国家机密。

同日，阿政府批准反对党——民主党出版机关报《民主复兴报》。该报于1991年初创刊后出版不到一个月，就在全中国发行5万份，其中仅在首都地拉那就发行1.7万份。目前，民主党已发展成为与社会党人数相当的大党，《民主复兴报》也已成为能同《人民之声报》相抗衡的大报，而且发行量已超过了《人民之声报》，近6万份。

近期，民主党领导人利用该报掀起一次又一次攻击原劳动党、现社会党及总统阿利雅的浪潮，为夺权制造舆论准备。如，该报不断翻出劳动党的历史老帐，把过去的“反党集团”案及其他“冤假错案”逐一抖搂出来，叫嚷要彻底铲除阿尔巴尼亚的共产主义。与此同时，还连续载文，指责阿利雅过去与现在，强烈要求他辞职，回家去写回忆录。

如今，除民主党外，其他新成立的政党与团体也都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如共和党的《共和报》，社会民主党的

《选择报》，民族团结党的《民族报》，宇宙党的《宇宙报》，农民党的《进步报》，生态党的《阿尔巴尼亚报》以及独立工会联合会的《工会委员报》和科索沃政治爱国协会的《科索沃报》等。另外，阿尔巴尼亚还出现了私人报刊，但影响不大。

5、新老记协并存。

作为阿尔巴尼亚官方机构的新闻工作者协会，迄今已有40余年的历史。它在阿劳动党改名后也进行了“更新”，成为一个接纳各党派记者的“多元化组织”，现有成员1000余人，暂由国家资助。1991年，该组织重新加入了世界记协组织，并扩大了国际交往，派记者前往苏联及东西欧国家采访或参加培训班。

1991年9月下旬，一批反对新闻工作者协会的报刊记者（大多为年轻记者）自发组织了“独立记者联盟”。目前阿通社、广播电台及电视台以及各党派的150名记者加入该联盟，其中还有阿名记者、社会党领导成员、作家艺术家协会主席阿果利。据悉，该组织已与欧安会新闻局建立了接触，并得到“完全的支持”。

“独立记者联盟”从成立之日起就对新闻工作者协会发起猛烈攻击，说该协会系阿劳动党的产物，是“一党独裁体制的工具”，“它在多元化的今天，其存在只是一种空想，注定要消失”。

（写于1991年11月）

附录1

变化中的蒙古新闻媒介

王义民

蒙古是一个只有200多万人口的小国，但历来出版的报刊种类却不少。据统计，1989年以前，全国18个省和包括首都乌兰巴托在内的3个直辖市均出版自己的报纸，在乌兰巴托出版的面向全国发行的中央级报刊还约有40余种。

1990年后，随着政局的演变，特别是在政治多元化和经济私有化不断深入的总前提下，过去基本上按系统和按行业出版报刊的格局已逐渐被打破，除了原有的报刊纷纷改名并改变其办报刊的方针外，一些新出现的政党和社团组织也相继创办了自己的报刊。据蒙通社1991年11月间提供的材料，当时蒙古全国出版发行的各类报刊已超过150种，其中报纸90余种，刊物50余种。

在众多的报刊中，发行量最大的只有政府机关报《人民权利报》，其发行量在1991年第四季度为72562份。另有《蒙古青年报》、《真理报》、《政府通报》、《劳动报》、《快信报》、《明鉴报》、《教师报》、《民族进步报》、《啄木鸟》、《民主报》、《时代报》和《首都新闻报》以

及《乌兰巴托报》等13家报纸的发行量超过万份，其余的都在万份以下，且订户极不稳定。

蒙古报刊的出版发行现状，同过去那种多年不变的情况相比，主要有以下变化：

（一）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不少报刊逐渐改变过去那种“吃大锅饭”的状况，开始想方设法创造和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并以与众不同的独家新闻来提高报纸的知名度。在这方面，1990年9月份创刊的由蒙通社主办的《明鉴报》表现得尤其明显。该报主编告诉我们说，为了提高报纸的知名度，他们在创刊号上特意刊载了中国前驻蒙大使许文益写的有关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的长篇文章，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和同行的普遍关注。1991年年中，他们又根据从政府权威人士处获得的消息，首次在报纸上揭露了涉及政府首席助理总理（即第一副总理）在内的多名高级官员参与的银行炒汇案的丑闻，从而轰动了全国。这位主编风趣地说，正是由他们刊出了引人注目的和爆炸性的新闻，尽管他们的报纸创刊时间并不长，但发行量一下跃居为全国各报发行量最大的前六七位。不然的话，他们就很难有立足与发展的空间，就可能面临失业和挨饿，就可能要到苏赫巴托广场去静坐。

（二）在标榜言论与新闻自由的幌子下，有的走斜路的报纸在“斜”字上下功夫。它们随心所欲地发表社会上的传闻或者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在访蒙期间，我们听到这方面的事例不少，如有家报纸竟根据社会上的流言蜚语撰写了谈

蒙古现任总统彭·奥其尔巴特身世的文章，说蒙古总统是位只有母亲而没有父亲的总统，并且提问道：“我们为什么要一位只有母姓的人来当总统呢？”又如新成立的自诩是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前身——蒙古人民党的法定继承者的“蒙古人民党”，在它的机关报《蒙古真理报》创刊号的刊头上首次刊出了7位蒙古人民党创始人的照片，把早期被处决了的鲍道、丹增列为该党的第一、二位创始人，而把过去被公认的党的创始人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分别降到第四位和第七位。

（三）由于原有的部长会议报刊书籍审查局等主管新闻出版机构已不复存在，加之又无具体的新闻出版法规可循，致使报刊书籍的出版发行现在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在今天的蒙古，什么人都可以办报，报纸随便骂总统、总理已不是什么新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过去比较严肃的报刊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如过去一直居各报之首的蒙古党政机关报《真理报》，现在的状况很不景气，其发行量已由过去的18万份下降到目前的18382份；过去发行量居全国各报前列的《劳动报》，其发行量也由过去的8万多份下降到目前的14337份。与此相反，一些并无什么影响的小报却满天飞。在蒙通社向我们提供的1991年第四季度的报刊订单上，我们看到有的报纸订户虽然只有七八十份，但却照样出。如一家名叫《蒙古之声报》的小报，乍听起来名字似乎很吓人，其实办报的只有3人，且分别是蒙古人民革命党、民族进步党和民主党3个党的党员。

（四）由于一些政治性的报刊所代表的党派不同，所以报刊间的相互攻讦情况较为严重。在这方面，特别是新成立的一些政党的机关报，它们为了党派的利益，常常颠倒黑白，造谣惑众。如1991年的苏联“8·19事件”后，有人竟编造出蒙古人民革命党事先知道此事，并借此提出要求取缔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封闭它的机关报《真理报》。

面对上述情况，观点不同的人反映截然不同。一些持“自由派”观点的人认为，这种状况好得很，这正是从1989年年底开始在蒙古出现的“新气象”和“民主运动的具体成果”。而持正统观点的人则认为，这种混乱状态糟得很。

同报刊出版情况大体相一致，从1990年开始，蒙通社和蒙古电台、电视台的情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1959年，当时的蒙古部长会议决定，将蒙通社、《现代蒙古》杂志和乌兰巴托广播电台3个机构合并，组建成部长会议辖属的新闻广播事业局。1964年，该机构扩大，改称国家新闻广播委员会。1967年，蒙古电视台建成后改名为部长会议国家新闻广播电视委员会。该委员会实为蒙通社、广播电台和电视台3个机构的综合体。

1990年后，蒙通社正式从原国家新闻广播电视委员会中分离出去成为独立机构，留下来的广播电视部分仍自成体系，两个机构均不再享受部级待遇，分别降为政府下属的两个总局一级建制。目前，蒙通社的编辑、记者和工作人员只有七八十人，连同其下属的国家图片社总共也只有150人左右。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编辑、记者和工作人员约有1200人

左右。

如果说同报刊出版稍有不同的话，上述两机构都由政府直接领导，而不属于任何党派。为“摆脱政党观点对宣传的影响”，根据1991年通过的政党法规定，在这两个机构工作的编辑、记者等，同在外交、国防、公检法等机构的工作人员一样，均必须同包括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内的所有政党脱离关系。我随新华社记者组访蒙时曾询问过一些在蒙通社工作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他们说，现在他们已不是该党党员。但也有人表示，他们虽然不是该党党员，但在思想上仍然支持该党，仍然要为自己的信仰和社会主义而奋斗。

在对外关系上，蒙通社与塔斯社的传统关系日渐疏远。在同西方通讯社尚难建立密切关系的情况下，急于恢复与发展同新华社的关系，想借此提高其在国内外的声誉和地位，并解决目前面临的困难。我们这次访蒙期间，曾看到几期蒙通社国际新闻电讯稿，虽然刊头标明消息主要取材于路透社、塔斯社、美联社和新华社以及英国广播公司、美国之音等电台，但相当一部分消息是从新华社英文电讯稿翻译的，其中有一天几乎占到消息总量的1/3。蒙通社国际新闻编辑部的同行告诉我们，新华社的报道是他们了解世界情况和向报刊提供国际消息的主要来源，他们打算今后还要增加对新华社消息的采用量。

（写于1991年12月）

附录2

新闻自由与造谣自由

唐约翰

美国几家大报的总编辑本月初在布拉格与东欧新闻界人士座谈，主题是新闻自由。剧作家出身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总统哈维尔也出席会议发言。哈维尔受原美国传媒推崇为自由化的英雄，但他在发言中批评了报界搞煽情耸动，并强调新闻的自由必须与责任并存。哈维尔的新闻秘书让可夫斯基更讲到不能不对报道假消息的记者予检控甚至判囚。美国编辑们对此很不以为然，后来撰文批评；主办该次会议的美国外国记者中心和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的两位负责人，还联署文章，指责哈维尔“地位变了，思想也变了”。

参加会议的《华盛顿邮报》执行编辑布雷德利，可以说是概述了美国传媒对新闻自由的观点，谓：“新闻自由包括了出错的自由，甚至可以有不负责任的自由。政府的干预（诸如检控）和威胁（诸如投狱），鲜有是恰当的。对付错误报道最有效的纪律行动，就是让公众知道报道的错误。”依这些准则衡量，难怪美国编辑们认为捷克的自由化未合格。

捷克总统的新闻秘书让科夫斯基以前是路透社驻布拉格记者，他叙述了几个事例。其一说：1989年11月17日，捷克学生示威，让科夫斯基接到“民主论坛”一名活跃分子彼得·乌赫尔的电话（乌赫尔如今是捷克通讯社社长）。乌赫尔告诉他，一名示威学生被警察杀死。乌赫尔声称有一个学生死亡。让科夫斯基于是拍发了这条消息，“美国之音”即据此广播，这触发了11月20日的20万人大示威；由此开始了连串发展，最后导致了旧政府倒台。让科夫斯基说，关于学生被警察打死的报道，可能是引起种种变化的最主要一件事。

他说，当时捷克政府曾否认有学生被打死，并把乌赫尔关进监狱；但人们不相信政府的否认。

让科夫斯基接着说，事后却查明该消息果然是假的；“没有学生被杀，只有一个便衣警察躺在地上，盖着布装死。”他表示，“技术上说，乌赫尔应该仍服刑。他和我都报道了假消息，而且很具有煽动性，实际上可以造成很大破坏。……幸而结果一切大吉。”

如此这般，捷克的政治剧变就由这一项谣言诱发。就连《华盛顿邮报》的布雷德利，也避免回答有关乌赫尔应否囚狱的问题。乌赫尔入狱，却没能阻止谣言产生影响，因为社会上有导入传谣的客观环境，更酝酿剧变的态势。哈韦尔和让科夫斯基，则深感前车之鉴，认为必须及早阻吓造谣者。

（原载1990年7月24日香港《大公报》）

附录3

东欧实施新闻自由并没有解决 新闻的所有问题

罗纳德·科文

编者按：东欧国家政局发生剧变后，西方国家的新闻记者作了大量报道。由于他们立场的限制，不少观点值得商榷。此文报道的诸多事实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早晨6时布拉格开始卖报。到6时半，自从共产党被逐出权力中心之后新创办的捷克斯洛伐克刊物就卖光了。最大的共产党机关报《红色权利报》发行量为100万份，到中午才卖完。

人们对于敢于发表新观点的新闻媒介颇感兴趣，其中许多报刊还象它们以前作为地下出版物时一样办得很有生气。一位小汽车司机说：“过去有许多不同的报纸，但买一张以上就没有意思了。因为它们报道的全都一样。而现在，甚至这些老的党报也报道彼此不同的事情。”

整个东欧仍受着旧的新闻框架的控制。一些新的报纸受到印刷数量的限制，而新闻纸数量由国家垄断，受老党员控制。新的新闻机构得不到足够的新闻纸，而旧的新闻机构却得到足够的纸张，甚至比他们需要的多。

一次对在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新闻媒介的考察刚刚结束，考察队在这几个国家遇到许多有独立见解的记者，他们纷纷抱怨。他们说，新政府的政策与老共产党体制是一样的，“不迫害”意味着不管旧的执政党采用什么样的新标签，这些机构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新闻界。

新闻界有了一些新面貌，也有一些替罪羔羊，甚至一些新闻媒介也反映旧共产党人的机构的变化。

从新闻自由的观点，即不附属于新旧党派的新的、独立的新闻观点看来，这些理想的新闻机构办起来也举步艰难。鉴于该地区糟糕的经济条件，报纸没有得到能消弥其赤字的大机构的支持，诸如党、政府、教会或劳工运动的支持的话，都有无法对付的两大困难。

广告市场狭小而且组织松散，广告价格很低。由于家庭预算非常紧张，出版物非常低的发行附加费已接近市场可承受的限度。

东欧各国形势动荡不安。今天是真理，也许下周、下月或下一年就不是了。每个国家都有特殊的情况。下面是访问过的这些国家中新闻媒介形势的总结。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不包括在内。因为它们的政治形象看来更是变化莫测，无法判断其新闻媒介在什么样的起承转合下运转。

东柏林：从历史性的角度讲，自从11月10日柏林墙开放以后，现在仍属初期。但有一点已经清楚，东德是东欧国家中最特殊的，其原因是它与西德有密切联系，而西德具有高度发展的，在商业上颇富进攻性的自由报业。从主流上讲，其前景是西德媒介将帮助或吸收东德的新闻媒介。

显然，东德担心它被整个地吞并。东德正保留制定一部新的新闻法。这部新闻法规定，任何新的报刊公司的领导人必须既是东德市民，又是东德居民。

西德报刊的第一个反映就是在东德扩大发行量。西柏林独立日报《每日镜报》经理们在回答记者关于如何帮助东柏林报刊的提问时说，1948年柏林封锁之前，该报曾在全市发行。这家报纸目前的发行量为14万份。他们计划取消诸如邮资问题等障碍之后才在全市发行。自从11月东柏林人涌入西柏林并把报纸带回家以来，该报的发行量增加了1万份。

当西德《明星》周刊打算出一期有关东德3月18日自由选举的免费专刊时，东柏林原本稀少的车流变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因为人们从边远地区城镇为这份刊物蜂拥而至。

汉堡《明镜》新闻周刊建立了自己的发行系统，并有目的地以3东德马克（大约合60美分）的低价出售。西德的大报《法兰克福汇报》出了一期房屋广告，以感谢东德读者买了2258个订单。

另一个新的模式是两个德国的联合企业。在东德第二大城市和受宗教保护并推翻了旧政权的新论坛运动中心莱比锡市，建筑工程师佩德罗·费勒用50对50的份额与来自汉诺威

附近的西德出版商成交，联合出版了一份独立的商业日报《我们在莱比锡》（Wir in Leipzig）。其编辑人员在东德，印刷厂则在西德。作为“第一家两个德国人的报纸”，它于1月26日向这个城市所有的邮政信箱发出18万份免费报纸。这家报纸计划先作为周刊在4月份试刊，尔后为日报。其每日发行量为6万份。这家报纸将刊登两个德国的广告。

费勒说，他计划到12月份在莱比锡建立一家现代化的印刷厂。

这也许会使到1月份时还属于共产党的莱比锡旧式印刷厂失业，那时党的领导人同意“把报纸归还给人民”。

莱比锡的唯一报纸印刷厂有18台苏制热金属铸排机和长长的一排排的手排活铅字盒。对莱比锡这家印刷厂充满怀旧感的参观中，我们看到东德印刷者干巴巴的话，诸如“欢迎到我们博物馆来”或“古腾贝格现在就能来并立即投入工作而不需要任何犹豫”等等。在整个东欧，报纸总编们都开玩笑地说要从类似“铅的时代”中走出来。

莱比锡的新论坛运动把这种联合企业的方式与德国旧有的报刊、书籍联合出版的传统做法相结合，正在计划和西德图书发行巨商贝特尔斯曼合资出版一个名叫《另一种报》（或《另一种其它报纸》）的新周刊（DAZ）。他们将共同出版一册有纪念意义的《除非搞民主，否则一事无成》。这一书名与莱比锡运动的口号“今天不民主，永远不民主。”押韵。这本书将包括有关秋季“和平祈祷”游行示威的图片和文字，在那次游行示威中新论坛运动号召争取新闻自

由，最终推翻了旧政权。

尽管《另一种报》采取的是改良措施，但它看来要冲击东德制度的严厉束缚。这些年轻的聪明的大学生们在获得了西德的一间带有文字处理机的公寓后，还必须向国家的纸张垄断机构申请，今年仅得到189公吨新闻纸，每周只够印4万份。

东德尽管乐于包容西德的资本主义方式，但也会很快再度向福利国家新闻业回归。《另一种报》的编辑贾恩·彼得曾描述他的报社如何费力才在一家靠铁路边的贫民区的一楼公寓里搞到了办公室。“我们威胁市长说，我们要在他的办公室外边静坐示威，直到他给我们的报纸找到地方为止。”

老党报至少表面上也在发生变化。在埃尔富特城的《图林根报》工作人员投票罢免了它的总编辑。东柏林《新论坛》周刊编辑吉特·克劳泽说，他发现这“非常可疑。除了主编外，还是原班人马，他们现在正设法赖下来。”

东德14个地区首府报纸的共产党革命名称都已改变成一般报纸的名称。因此，在格拉的《人民守卫报》（*Volks-wacht*）已变成《东图林根新闻》，而法兰克福—奥得河的《新日报》（*Neuer Tag*）现在则更名为《新奥得报》（*Neue Oder Zeitung*）。

为数不多的仍保持这种老名字的几家报纸之一就是有声望的《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其发行量为24万份。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家老社会党的报纸。东德社会党于1946年被迫与共产党合并时交出了它

所有的财产，现在该党正在重整旗鼓，收回当时它交出的东西，其中包括报纸。

但在东德社会党人中间一直持续着一场是否应该有大范围内发行的党报的争论。党的发言人斯蒂芬·赖希尔说，党在早些时候打算创办一家大的周刊的计划被取消了。他还说：“大众媒介必须是独立的，不是党的。他保证，党一旦收回过去的报纸，就把它们从党的附属地位中解放出来。不再是任何党派的所属物。社会党人将只限于为他们的成员创办一家机关周刊。”

在谈到其它印刷媒介时，他预测道：“人民将购买或订阅西德报刊。东德和西德报界将在一起工作。将会出现全德性报纸，外加独立的地方报纸。”

然而，莱比锡社会党主席乌韦·米勒毫不含糊地说他不能停下《莱比锡人民报》的工作而干等着。他是一位一个人创办了一家社会党通讯社并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交换新闻的记者。如果他的通讯社归地方社会党人所管，要他撒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

波兰：波兰新闻界的景况显然是最具有灾难性的了。真正独立的报刊如果要在波兰出现并生存下去，看来需要某种激进的思维。否则，波兰报刊就会落到靠人养活的地步，因为他们或者属于官方或半官方的机构，亦或是团结工会或教会的喉舌。

许多波兰新闻记者由于近年来发生的事件感到震惊之余，意识到由团结工会取代共产党做新闻界的主人结果可能

是一项很不上算的交易。但是这些新闻工作者中很少有人再走出一步——使他们自己确信需要开办新的商业性的报纸，这样他们才能自立。

波兰报刊的最主要问题是报纸印刷的成本。由于纸张市场价格开放，从1月1日起取消了价格补贴。几乎在一夜之间报价上涨3倍而达到了世界水平。实际上，在6个月中间报价猛涨了24倍，没有人能举出哪一家出版物不是亏损严重。包括共产党和教会的旧报，尽管他们储备了大量的纸张。团结工会的《选举报》已从55万份减到40万份，以便维持生存。

规定价格取代了国家对新闻纸和其他纸张垄断的配额制度。前景是报刊接连不断地破产，新闻工作者失业成倍增长，达到20%。

不管波兰的经济形势是否允许新闻媒介成功，波兰无疑集中了一大批处于各种不同的发展阶段的新媒介。去年12月初独立的波兰记协主席斯·布拉特科夫斯基在华盛顿说，到1990年1月全国将创办500家小型地方报纸。到1月末，他又说要超过600家。

他在一周内收到一大堆报刊小样，包括正在发行的乡村小报，从周刊到日刊，油印的、影印的、铅印的或甚至绢网印的都有，使用的是波兰地下印刷的古典技术。

据估算，在波兰过去实行军管的7年中有1200家地下印刷品的名称，在其高峰期，有350万波兰人经常阅读到这些报纸。

布拉特科夫斯基的报纸中也包括在与苏联东北交界附近的比亚韦斯托克省省会出版的第一家独立的地区性报纸。它模仿亲团结工会的《选举报》，是一种带有广告完整的小报。

《选举报》在波兰1989年5月争取新闻自由的运动中取得了突破，这点连它的无数批评者也承认不讳。

在弗罗茨瓦夫、波兹南、罗兹和克拉科夫，许多报纸正计划要办成全国性的和主要地区性报纸，其中有些报纸雄心勃勃。他们已经活动要和包括默多克、马克斯韦尔和埃尔桑（法）在内的一些西方新闻媒介公司合作，但是看来还没有成功在即的大交易。其原因显然因为经济的严重不稳定。

现在，仅仅纸张和油墨就占了大部分报纸70—80%的开支。政府报纸《共和国报》（发行量30万份）的编辑们说，纸张和油墨的开销占70%，付给共产党所属的工人出版合作社印刷厂和垄断发行机构的费用占27%，3%付给职工。自从去年10月新的高级编辑任职以来，人们认为这家报纸是波兰最为严肃和最有信息的报纸。

去年秋天波兰新闻界由于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的行动受到剧烈的振动。团结工会组成了政府，团结工会机关报《团结周刊》的总编辑马佐维耶斯基出任总理之后，瓦文萨很快就采取行动重新控制了《团结周刊》。他挤走了马佐维耶斯基的总编辑接班人，而任命了自己的人。在随之而来的纷争中，该报有一半职工或者辞职，或者被解雇。

《选举报》则聘用了一些名士以示他们对团结工会政府中的政府——议会派的同情。

这次动乱促使波兰新闻工作者深信需要创办真正独立的报纸。因此，1月末《简言周刊》复刊了，这家周刊曾是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办的周刊，1957年由于超越共产党路线提倡真正民主而被取缔。《简言周刊》的年轻新秀、专栏作家康斯坦丁·格伯特中断了他与《选举报》的合作。他说：我们现在认识到报纸需要从所有事物中独立出来。此外《选举报》是……地下新闻的延伸。它的报道太短而不全面并不只是因为它缺少版面，而且也因为对团结工会政府它也有禁忌的地方。

“我们对现在的民主政府基本上是友好的，但是对我们的朋友提供最好的服务就是持批评态度和具有独立性。我认为，在波兰我们已经渡过了战斗性新闻的阶段。”

当《简言周刊》的首批50000份报纸售出后，其相对来说较高的售价13美分是不足以保本的。因为编辑们不愿腾出这张16页报纸的任何一点版面，这家报纸计划不刊登广告。

埃内斯特·斯卡尔斯基是《选举报》颇受尊敬的高级编辑。他不同意格伯特的意见。他说：“我们的年轻记者必须学会如何采写新闻。我们的报纸是宣传品，而不是消息来源。我们有许多专栏作者或自诩是专栏作者的人，但没有几个记者。每个人都想刊登他的意见，而没有人愿意在编辑部工作。”

斯卡尔斯基甚至承认波兰共产党老的大报《人民论坛报》更有意思，它因刊登反对新政府的文章发行量上去了。斯卡尔斯基说：“发行反对派的报纸较为容易，但还是旧日

原班人马办报。”

《选举报》几乎靠西方帮助而垄断了市场。该报设在一所远离市中心的旧花园里，房子里堆满了文字处理机。编辑们说：这些处理机目前仍然象高级打字机那样使用。因为没有同照排机连接起来，至少在6个月内还没希望进行连接。虽然《选举报》国际版选萃英文周报正在实验案头印发。记者们在荧光屏上写作，然后打印出来送到工人出版合作社铅印。《选举报》至今未找到地方安置巴黎《世界报》贡献的二手印刷机。象老的共产党报纸一样，《选举报》也是人浮于事，多出2/3的人。一位对该报怀有同情心的批评家说：“你怎么能拒绝雇用和你一起干过地下工作进过狱而且一天工作24小时又不抱怨的人呢？”

与此同时，老的共产党报纸正在转变为“私人公司”和合作社，以此进行调整，挫败政府把它们从老的共产党机构中夺走的计划。波兰独立记协代理主席马切伊·伊洛维斯基说：“把新闻媒介留在共产党手中是个大错误。”这个党正在审时度势改变面貌，……大约60%的媒介由共产党控制。所有地方日报都由“上层”控制。电视新领导人不再是共产党人，他有几个年轻和资格浅的记者追随左右。但领导权和控制权仍然在共产党和秘密警察手中……

“西方没有看到这种形势的危险。上层正开始重整旗鼓，利用新闻界内外民主力量的弱点和混乱状况。整个东欧的媒介新结构没有相互联系。改革的敌人知道怎样钻其空子。老的势力正准备反扑。如果他们在苏联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就

得重回监狱。”

解决报纸问题要花大力气，一些人认为对地方媒介来说办法是建立独立的地方调频广播电台。布拉特科夫斯基建议创办500座这样的电台，但离办成还差得很远。

正如《团结农会》周刊编辑斯拉沃米尔·西维克总结形势时所说：“我们的报纸只能勉强糊口。我们正在建设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

捷克斯洛伐克：自去年秋天取得合法地位的布拉格新闻媒介一直充满革命热情地运作。带着收支账单的会计师们似乎被看作是用死板不灵的机械设备来束缚新闻界的一种新的方式。但新的出版物仍然认为他们只用自己热情便可在经济上自立。

《人民报》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新论坛运动的报纸，也是最重要的新出版物。新论坛运动现在是新政府党。由于缺乏新闻纸，它每周发行2次，发行量只得从最初50万份削减到38万份。

《人民报》计划4月份改为日报，它给人以一种严肃的面貌，还没有登任何广告，照片很小，头版有漫画，版面排得很紧凑。

最初的《人民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捷克斯洛伐克知识界中很有威信的报纸，但于1952年被共产党关闭。该报纸在瓦茨拉夫广场上破旧的办公室有一种由于领导了对共产主义的和平革命而产生的正义和自豪气氛。当这家报纸是七七宪章运动的地下月刊时，它的董事会曾包括现任总统哈

韦尔和现任外交部长伊日·丁斯比尔及捷克斯洛伐克驻华盛顿新大使丽塔·克里莫娃。

该报的两个最高级的编辑伊日·鲁姆尔和鲁道夫·泽曼曾在10月试图将报纸正式登记为公开出版物之后曾被监禁过。要求释放他们的运动是导致群众示威游行的因素之一，这些示威游行11月底推翻了共产党政府。

《人民报》仍然大部分靠瑞典、澳大利亚、西德、法国、美国和捷克侨民的贷款和资助维持。工作人员还在尽力筹划安装最好的电子编辑系统。

然而，一些不想加入党派的记者对加入《人民报》仍然犹豫不决。36岁的《人民报》总编辑扬·鲁姆尔是一位凭自己的资格而赢得他人尊敬的记者。他拒绝加入他老子的报纸的职工行列。他决定创办自己的不定期刊物《运动信息》，这也是地下报纸的衍生物。

小鲁姆尔说，这里所指的“运动”意在引诱当局，他还在探试当局允许的极限。当有人问在哈韦尔新的民主政府领导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时，他出人意料地说“新闻检查”。他的报纸在最近刊登一篇谴责军队有叛乱倾向的文章。负责印刷该报的厂家也印刷捷克斯洛伐克武装力量的刊物。该厂厂长对他说，下期最好找另外一家印刷厂。内政部长仍然是共产党员，他说他正在调查是否可以对鲁姆尔起诉。

哈韦尔总统则似乎在表明支持鲁姆尔的这种试图钳制他的报纸的企图，于是在去华沙和布达佩斯进行首次访问时带他同行。

该报 5 万份报纸由大学生们发行，它只有 3 个拿工资的职工，外加 15—20 个志愿服务人员。报上可以登的唯一的广告是有关书籍和戏剧的免费广告。鲁姆尔说：“我的报纸很好，不登广告也能生存。否则，我们就没有权利办报纸。”

他通过以瑞典为基地的七七宪章基金会得到了许多现代电子编辑设备，但他承认，他的工作人员需要通过国外实习和学习英语课程来进行“职业训练”。

伊雷娜·杰罗娃由于坚持报道 11 月发生在《自由世界》日报窗外瓦茨拉夫广场的游行而被人们称为老的党报党刊中最勇敢的记者。这家官方报纸对这些事件缄默不语达几周之久。新政府刚一上台，象杰罗娃所在报纸那样的报纸就开始更加独立地行事。

然而，她和其它五位有独立见解的记者提出，要创办一种独立的政治文化周刊《自由明天》而不是继续和那些温和的编辑们打交道。这些编辑们坚持她要提到七七宪章运动领导人哈韦尔时仅把他称作为一个捷克剧作家而不署他的名字。

这家日报不存在纸张问题，但周报被限制在 6 万份以内。工作人员确信卖掉 10 万份很容易，而且能赢利。

在布拉格人们呼吁西方不要忽略在另外两个联邦首府——斯洛伐克联邦首府布拉迪斯拉发市和摩拉维亚首府布尔诺的相当于《人民报》的报纸。据说，在这些联邦中老共产党人对官方报纸继续控制，甚至比在布拉格更厉害。

新创办的新闻工作者辛迪加正在出资资助月刊《报道

者》复刊，该刊的名称和1968年短命的“布格拉之春”观点是一致的。它的新主编米罗斯拉夫·菲利普在前政府时期曾蹲过监狱。他的办公室设在以前亲苏路线的国际新闻工作者组织布拉格总部设立的一座楼里。

布拉格国际新闻工作者组织的继续存在对新型捷克记者来说是一个麻烦。新的辛迪加主席、《人民报》的泽曼说，它造成“微妙”的问题，不仅因为国际新闻工作者组织拥有精良的设备，还因为有50多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想要它们的记者协会留在该国际组织之内。

然而国际新闻工作者组织已在东欧记者中信誉扫地。新的波兰记协已加入了总部设在布鲁塞尔亲西方的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

泽曼还想知道捷克辛迪加是否可能同时参加上述两个组织。他说：在做出决定之前，他需要同匈牙利、波兰的新的独立记者组织商量这个问题。

匈牙利：在匈牙利，过渡时期是最长的，有各种各样生动活泼的媒介，甚至有创办独立的广播电视的第一次尝试。与其他仅模模糊糊地知道广告重要性的国家不同，匈牙利的记者们说，公众已经反对印刷媒介和国家广播媒介中过多的广告，而且这种反对情绪十分普遍。

匈牙利的大问题看来是怎样解决来自自由的冲击和压力。匈牙利人很快便将他们的形势与佛朗哥以后的西班牙争取自由和许可之间均衡的方式加以比较。人们担忧的是黄色内容、谤诽、侮辱和随意性新闻以及如何防止旧政权的机会

主义者和叛徒控制新媒介。

然而，象在其他国家一样，真正的独立私人报刊在与“上面”控制的垄断发行系统打交道时仍然有麻烦，这种垄断由邮局实施。邮局甚至自办报摊。

1989年4月创办的刊物《证据》被西方外交官认为是最独立的主要刊物，它在发行上遇到了很大麻烦。编辑伊万·巴巴说，他和邮局干了很长时间，因为邮局坚持说它只能每天出售1万份报纸。而他自己一直在设法销售同样的数量。但他又说，纵使报纸销量被削减30%，他也需要一个完整的发行系统来粉碎他认为的邮局破坏报纸的企图。

巴巴说，匈牙利没有真正的纸张问题，然而必须从政府机构买新闻纸，必须按西方质量的新闻纸付费，得到的却是比世界市场价格要低15%的苏联新闻纸。

巴巴想办5个刊载地方新闻的区域性版的报纸，以扩大读者直接感兴趣的消费和金融新闻的报道——匈牙利报刊通常忽略这些报道而喜欢刊载经济政策及金融消息大路货。

其他独立的报纸包括《消息》周刊和《发言人》周刊，以及自由民主联盟的讽刺性双周刊《匈牙利柑桔》。所有这些刊物的发行量每期都被压到3万份。

匈牙利报刊的新的大成功是彼得·托克办的色彩小报《改革》，它自称是独立民主的新闻杂志。这份周刊发行量达40万份，成为匈牙利最重要的刊物之一。

《改革》过去属于匈牙利国家机关的一家财团，共产党占15%的股份。但由于资金不断增加，这种政府色彩被冲淡

了。默多克花400万美元买下它的50%的股份以及这家机构发行10万份的下午报纸《今日》的一半。

罗伯特·马克斯韦尔也买下了发行量10万份的匈牙利政府报纸《匈牙利新闻》40%的股份。这笔买卖最初没有成交，马克斯韦尔发现这家报纸去年亏损了40多万美元。

但最为引人注目的涉外买卖是发行14万份的前共产党的《匈牙利民族报》的交易。匈牙利籍美国亿万富翁乔治·索洛斯一直在谈判买这家报纸，他的私人基金会每年花400万美元资助匈牙利人出国留学并在布达佩斯建立了一个管理培训中心。在为匈牙利精英们准备在国内推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索洛斯几乎一直在单枪匹马地工作。

当他发现这家报纸去年亏损50万美元，并且这家报纸附属共产党的拥有者反对给予他任命新编辑的权力时，这笔报纸买卖的会谈陷入僵局。他的出价85万美元被认为太低而被驳回。即使这笔交易终成泡影，索洛斯也会注意寻求把报纸作为向国家传递他的自由经营信息的一种媒介，这点是十分清楚的。

如果需要进一步的例证以说明匈牙利正日益趋向转变为西方式媒介的话，那就是在奥地利维也纳印刷的匈牙利文版的《花花公子》了。该刊被认为是在匈牙利人发行的同类出版物中最为严肃的。

尽管如此，在匈牙利的19个地区首府中，地方日报仍然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

哪里需要帮助

东欧所有国家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让年轻记者熟练使用英语、法语和德语，并熟悉新的电子编辑技术。因为这些记者过去只能把俄语当成主要外语。随着一些刺激的发生，高级编辑们都承认在媒介管理方面开设训练课程已是燃眉之急。

需要的另外一种帮助的是在最好的大学，布拉格著名的查理大学新闻学教师修改课程。过去，他们接受的训练不是如何发现事实写作新闻，而是教授如何向群众宣传马列主义。

东欧的记者们看起来要分成两种：一部份首先要设备，一部份要技能。莱比锡《新论坛》周刊的青年编辑简·彼得说：“我们能买电脑，但我们需要培训、培训、再培训。”但是在东柏林《新论坛》周刊的迪特尔·克劳泽却对为记者提供培训一事抱有反感。他说，在设备方面，他是“来者不拒”。他还说：“眼下我们10个人只有两台打字机。”

在对设备问题上也有分歧。一部份人想马上跨进最先进的技术行列，另一部分人认为西方的笨重旧设备只要能使用就可以。

还有另外的一种分歧，一些人想要在西方寻求长期或短期的培训。而另一些人则要在本市参加短期学习。

所有交往形式——任何给人以一种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新感觉的事情——都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要求。它包括同西方类

似的报纸结成“姐妹”，交换订阅、参观、培训，特别是专题文章。

为了避免雷同、浪费或不适当的过分集中援助几个出版物，重要的是有西方良好的合作。

资料：

东欧国家和他们的报纸

保加利亚：

人口：900万

报纸：17家日报（7家全国性日报）

新闻工作者：6000人

捷克斯洛伐克：

人口：1600万

报纸：30家日报（8家全国性报）

新闻工作者：7500人

民主德国：

人口：1700万

报纸：24家日报（8家全国性报，14家地区性报）

新闻工作者：无资料

匈牙利：

人口：1060万

报纸：30家日报（6家全国性报）

新闻工作者：5300人

波兰：

人口：3800万

报纸：47家日报（8家全国性报）

新闻工作者：10000人

罗马尼亚：

人口：2300万

报纸：16家日报（6家全国性报、3家匈牙利报纸，2家德文报纸）

新闻工作者：3100人

（原载1990年第3期美国《报业时代》 宋立芳译
康兴平 校）

附录4

新闻自由在东欧经受考验

(美) 辛西娅·F·威尔逊

在东欧，新闻自由正在迅速扩展，但是，报纸在很大程度上依然要靠政府印刷和发行。媒介观察家们提醒，达到真正独立的历程将是漫长的——在某些国家，这种道路会更加障碍重重。匈牙利、波兰以及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的许多报纸和其他企业在从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极需现金。与此同时，尚缺乏经验的东德报纸正在被西德的强大经济所吞并。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由于地区和政治的差异都正在发生冲突，新闻独立也不过刚刚起步。以上结论是一年来对上述七国新闻媒介的变革进行采访和报道得出的。一年前《报业时代》曾对该地区的新闻界考察发表过一篇详细的调查报告。

整个东欧国家的报纸印刷价格是高的。广告销售组织得很蹩脚，或者不登广告。由于家庭预算相当紧，消费者的收入大部分用于购买食品。事实上，每份报纸才10至15美分。按照美国的生活标准，还是订得起的。但是，这种比较是有出入的，因为东欧的平均月薪不到美国的1/10。

报纸——还是面包？				
各类国家价格比较参照表				
国 家	报纸	汽 油	面 包	平均工资
捷克和斯洛伐克 1 美元 = 24 克朗	10 美分	2.85 美元/加仑	11 美分/磅	135 美元/月
匈 牙 利 1 美元 = 60 福林	15 美分	3.50 美元/加仑	11 美分/磅	150 美元/月
波 兰 1 美元 = 9500 兹罗提	10 美分	1.6 美元/加仑	7 美分/磅	105 美元/月
美 国	30 美分	1.43 美元/加仑	70 美分/磅	1600 美元/月

资料来源：美国报纸出版人协会埃尔兹比塔·克日扎诺夫斯基

波兰最大的一家报纸华沙《选举报》政治发展部主编彼得·帕斯维兹说，读者渴望新闻而不接受广告。“我们收到许多说‘我们要新闻，不要广告’的来信和电话。”

甘尼特基金媒介中心经理埃弗里特·E·丹尼斯把这个国家的居民描述为……“为探索现代化的高知识社会”。

以下列举的是具有开拓精神的记者在满足高层次读者的需求所做努力时遇到的障碍：

△去年波兰报纸印刷价格飞涨，新独立的出版物的纸张和油墨价格占整个成本的70—80%。然而，几乎没有出现经营倒闭现象。“这真是令人费解。”一位编辑对世界新闻自

由委员会驻巴黎代表罗纳德·科文说，“显然，我们的企业做的是一种骗人的把戏。”这位编辑说：“报社不是解雇人员，而是让职工拿半薪休假，而将另一半工资用在支付涨价的账单上。这种情况也许还能维持六个月到一年，但迟早这种办法也会完蛋。”

△新开张的报纸必须为获得使用政府控制的印刷设备和发行系统而奋斗。“我们的报纸印刷和发行系统必须依靠政府的支持才能运转。”布加勒斯特主要的独立报纸《自由罗马尼亚报》行政处长兼编辑彼得·巴卡纳说：“每天晚上我们把版样交给政府的印刷部门去印刷，罗马尼亚的其他刊物也处于同样的情形。因此我们的报纸能否印刷，印多少份以及向谁发行等一切，政府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在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匈牙利，“在部分独立的媒介和新当选的政府之间一直存在着唇枪舌战的对话。”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秘书长丹尼·怀特说。

甘尼特基金媒介中心的丹尼斯评论道：世界上只有东欧的新闻界在重新考虑其职责和作用。“宪法和法律制度已发生变化。经济体制也在改变，外国投资随之而来，记者的作用变了，新闻的定义变了，教育的性质也在变、新闻编辑技术也朝着开放的方向发展。”

负责国际事务的美国报纸出版人协会主席W·特里·马圭尔补充说，这个过程将需数十年的时间。他视察了记协联合会的活动。他说，“这些国家的法制和市场经济刚刚起步，还谈不到改善其报纸发行所需的印刷设备和技术。虽然

整个改革是向前发展的，而挫折和倒退也是不可避免的。”

正象《选举报》总编辑亚当·米赫尼克在《新共和国》中写的，所有的东欧国家都遇到的，是专制被打败、自由已获得，而自由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民主的成功。

“民主是制度化的自由。这种自由应受法律的制约，它具有促使各主要政治力量在抗衡中达到妥协的作用。我们有了自由，但是我们还没有取得民主秩序。”

东欧各国各有难处

匈牙利：外国投资者买下匈报刊后，报刊的发行仍受着政府的控制。

现在，外国投资者占匈牙利媒介75%的股份，其中包括四家最大日报的3家和一些省报的绝大部分股份。匈报向外国所有权的过渡已有一年的时间，它引起了匈议会的强烈反响。

世界新闻自由委员会的科文说，“匈总理说他要求通过一项法律，将每个投资者在一个全国性报刊中的股份限制在1%。”他预言，“如果是那样，所有的股份都会被外国投资者分享完，而匈牙利人会一股也得不到。”

匈牙利的新报业主包括美籍澳大利亚人鲁珀特·默多克、捷克出生的英国人罗伯特·马克斯韦尔和德国的阿列克赛·施普林格和贝特尔斯曼集团。

在活跃的布达佩斯《改革》周刊拥有一半股份的默多克

帮助这家周刊开办了一家晚报《今日报》（Mai Nap）。作为一种反应，一家匈牙利报业集团创办了一份小报《信使报》（Kurir）来与《今日报》竞争。《今日报》默多克的回答是从布达佩斯议会买下了《新闻晚报》40%的股份。除此之外，他还拥有布达佩斯市前政府官方报纸《匈牙利新闻报》49%的股份。

施普林格集团买下7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地方报纸引起轩然大波。匈议会内的一个委员会发出警告说：外国投资者在千方百计地争夺匈报刊的所有权。他们最终想要垄断这些报刊。

这个委员会号召政府对媒介的私有化进程进行控制。政府现在似乎想利用这种呼吁来获取利益。例如，1990年6月，政府停止把布达佩斯的主要报纸《匈牙利民族报》出售给斯德哥尔摩的《每日新闻报》。政府领导人斥责这家报纸对匈牙利政府怀有敌意。而政府允许将这家报纸出售给法国的一家媒介集团埃尔桑。

《匈牙利民族报》记者叶尼科·滕伊说：“共产党下台后出现了一个真空。这儿没有人说话算数。我们想选择一家瑞典公司。因为我们喜欢他们的独立报纸的形象。可是，政府硬加干涉。”

《人民自由报》是匈所剩无几的无外来控制的报纸之一。这家布达佩斯日报在脱离了共产主义束缚的情况下，通过对中右政府和自由化的形势的进攻性报道，保持了其原有的发行量。

科文说，到1990年中期除《改革》之外，所有匈牙利报纸都处于财政混乱状态。一家主要的独立周刊《世界报》（Vilag）已垮台。1989年4月开办的日报《时代报》（Datum）不得不关闭，其原因是因为和匈牙利邮电局的持续不断的矛盾。

邮电局的垄断扩伸到所有公开的发行点——甚至报摊。例如，它规定从布达佩斯《匈牙利柑桔》（Magyar Narancs）收30%的发行费。这份主要面向年轻人的独立周报售价为31分。不管这家报纸的10000份是否卖得出去，它都要预先支付发行费。

国际发行管理者协会执行主席约瑟夫·B·福西说：“大多数布达佩斯的报纸发行人把大样运到一个印刷中心，这以后的事就不是他们说了算的啦。”“他们一次同时印刷几份不同的报纸。运输皮带的另一端正在等着的不是报纸公司的卡车，而是匈牙利邮电局的卡车。匈牙利邮电局控制着所有订户的名单，为更新订户做传票，而且也控制着这别无二份的传票。布达佩斯以外的报纸发行状况也大致相同。”

波兰：所面临的问题包括报纸纸价，报纸的供应，读者对广告的可和记者的配备。

《华沙生活报》的记者克雷斯蒂·卢贝尔斯卡说，随着12月9日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当选为波兰第一位普选的总统，记者们变得“有一点害怕”。卢贝尔斯卡1990年秋季曾作为《时代明镜》学者在《洛杉矶时报》工作过。他指出，“瓦文萨竞选期间曾说，谁掌了权谁就拥有报刊。共产党用

同样的方式控制过我们。”

瓦文萨上任两个多月了。尽管他的党在两家报纸中拥有股份，但尚无他将控制媒介的迹象。难以想像瓦文萨决定不出售这些报纸，而许多人们都在担心这种事情的发生。卢贝爾斯卡说，她的报纸也在将被出售的报纸之列。

1990年11月，负责波兰国有报纸垄断权私有化的官员耶日·德里加爾斯基因实行将70多家报纸分配给其雇员进行管理而得到提拔。他们把报纸办成合作社形式。德里加爾斯基的接班人来自工人出版合作社取消委员会，有迹象表明他们将着手进行清产核资。

科文说，波兰人需要从震动中清醒过来，马上考虑解决长期的问题，如私有化和报业现代化问题。也许波兰新闻界应组成一个集体所有制的新闻体系，就象美联社那种新闻合作体系。

但今后的发展方向很难预料。一些小的地方发行人由于感到经济拮据甚至开始提出华沙工人出版合作社的垄断不应该进一步解体。

华沙《选举报》的帕斯维兹预言：“波兰至少有一半的报纸要关门。”他说，“我们希望维持4—5家全国性日报，并同时发展其多种地方版。”

他说，他的报纸从8月以来一直赢利，而且成立了一个能够承担报纸40%成本的广告系统。《选举报》是波兰第一家使用电脑发稿技术的报纸。

另一家新的较有势力的保守日报《克拉科夫时报》主要

对波兰东南部进行报道。该报发行宗旨是“表现出西方新闻自由的标准”。

外国投资者们的到来将帮助波兰报纸达到这种目的。法国埃尔桑集团在华沙出版的全国性报纸、曾为共产党喉舌的《共和国报》获得49%的股份。包括《格但斯克报》在内的新省级报靠瑞典人的支持起家，弗罗茨瓦夫的《俄克拉报》靠的是挪威人的投资。

帕斯维兹说，波兰报纸在人满为患严重超员的同时，缺乏真正的新闻从业人员。最近，他在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安排下，到美国进行研究性访问。帕斯维兹对《华盛顿邮报》的气氛感到吃惊。他看见记者和编辑之间几乎没什么交流。“那儿的工作效率之高形同工厂。他们不可能有时间吵架。”他说：“在《选举报》，我们工作环境乱，干得也很辛苦。”

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尽管知书达礼的人均比率很高，在这个国家里却没有几家独立报纸。大多数报纸是政党的喉舌。

随美国报纸编辑旅行团成员到捷国访问而归的《迈阿密先驱报》发行人小戴维·劳伦斯写道：捷克和斯洛伐克是让报人感到愉快的国家，“渴望自由和真正新闻的捷克人在冲破束缚后热爱他们的报纸。他们争先恐后买报。他们甚至站在商店的橱窗前读这些报纸。”

在解释捷国人民对新闻的饥渴时，捷克新闻社记者斯坦尼斯拉夫·蒙迪尔说：“捷克斯洛伐克的所有报纸和杂志数量只能相当于密苏里一个州的数量。”

在美国新闻机构的安排下蒙迪尔曾花一年时间在密苏里新闻学院学习过，他对北美的报纸发行规模感到惊奇。

尽管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些独立报纸数量少，但它正在扩大，而且报纸的内容也正朝着更开放的方向发展。1990年1月，布拉格一家新成立的大报《人民报》正式切断了它和总统瓦茨拉夫·哈韦尔的《公民论坛》的关系，它把所有权转到了一家新的基金会。与此同时，布拉格《自由言论》的记者们罢工，要求从社会党那里获得更多的独立。

在政府官员们辩论言论自由的一项宪法条款的同时，发行人仍然必须到内务部登记他们的读者对象和报纸的内容。而实际上，哈韦尔政府并没有新闻审查制度，哈韦尔本人也是个颇为知名的文人。

担任捷克和摩拉维亚5000名成员记协的主席帕韦尔·克拉萨对厄尔士《纽伯格写真报》发行人吉米·凯利说，他的新闻同行们为重新获得新闻自由一直等了半个多世纪。这番话是凯利在参加一次全国报业协会工作旅行时说的。

克拉萨告诉凯利：“今年蔓延整个东欧的政治变革正在重新恢复捷克新闻的一些优良传统。”

克拉萨说：“早在1989年的‘温和革命’以前，捷克记者一直准备培养新一代的记者取代共产党的记者。”他又说：“我们想把领导职务交给年轻一些的记者并帮助他们理解新时代的精神——而且帮助他们抵制攻击我们新制度的可耻运动。”

年轻人正起着重要作用。例如，继《人民报》后，新闻

周报《简言报》也在布拉格问世并且表现出色。《大学生消息报》也相继创刊，这份报是由查理大学的学生编辑的。这所学校是全国唯一的新闻学院。

不幸的是，科文说，今年年初引进新闻纸的国际价格体制之后，“捷克的报业便困难重重。”政府对稀有贵重商品仍采取配给制。事实上，由于纸张短缺，《人民报》在九个月内从1990年1月的38万份削减到27万份。编辑们估计，如果纸张供应充足，他们能印刷和出售50万份报。

此外，在共产党统治下，国家掌握着大部分的印刷厂，现在在新的制度下，谁将拥有这些印厂尚不清楚。眼下正在议论是否将其中一些转化为公司合股经营。

到目前为止，《人民报》没有印刷设备。文章是用电脑处理的，然后用（键盘操作的）铸成整行的活字排印机排印。蒙迪尔说，捷克和斯洛伐克唯一的国家通讯社的技术设备都赶不上象《哥伦比亚密苏里人》这样的小报。

《人民报》的主编雅罗斯拉夫·韦斯说：“我们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是用热金属活字排版。布拉格唯一一家比较现代化的印刷所是从前由共产党控制的印刷所，在同一个机器上印的是共产党的《红色权利报》、公民论坛的日报《公民日报》（Obcansky Denik）、独立的《人民报》和几份其他的日报、周报。

据甘尼特基金会特别工作组访问该地区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其它的问题是缺少广告来源。特别工作组指出，私人企业过去被共产党制度扼杀了。而新企业由于市场竞争性小，

报纸广告对他们没有什么吸引力。

德国：西方股东渗透到所有东德的报纸中。本地新闻代替了宣传。

柏林墙打开和德国的统一在东德引起了一场争夺报纸读者的斗争。

在国家停止资助东德新闻媒介时，一些报社关闭了。由于繁荣的西德报纸的渗入，东德其它的报纸发行量正在下跌。据估计，现在有300家西部报纸和杂志在争夺东部读者。

全国性报纸的发行量骤然下跌。据一家政府媒介登记处透露，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6家全国性报纸从1989年12月至1990年9月少了260万家订户，下降71.9%。

虽然地方报纸发行量蒙受的损失没那么大，据登记数字表示，转手后的地方报纸订户减少了14%。现在有6家地区性报纸面向东德的1700万居民，总发行量不到50万份。

明尼苏达州报业基金荣誉经理罗伯特·沙乌说：“压力正在飞速地迫使东德放弃对报纸的所有权并在那里引起了强烈的竞争。”

在众多的买主中，施普林格买下了柏林的《晨报》(Der-Morgen)，而且大概要把它办成一家全国性的日报。他已在向东德各省推销他早已畅销的《柏林晨邮报》(Beiliner Morgenpost)。

沙乌说，西德的发行人运用的市场策略——例如向订户赠送礼物——使其他竞争者难以施展能力。

最大的独立周刊《另一种报》(即DAZ, Die An-

der eZeitung) 于1990年2月1日在莱比锡问世。“仅过数周，西德报纸便打入东德。”该报编辑简·彼得告诉《纽约时报》：“我们当时分析我们需要5至7周的时间与这里的读者建立稳固的联系。一旦西德报纸打进来，我们也不会被挤垮。而且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这家报纸现在发行量为4万份。

另外出现的模式是合资报纸。

西德的杂志发行巨贾格鲁纳和贾赫与马克斯韦尔媒介集团共同买下了共产党控制的柏林出版社(Verlag)。这家出版社拥有几家报纸：前党的机关报《新德意志报》、东柏林市党报《柏林日报》和它的下午版《柏林晚报》。

《柏林日报》的总经理于尔根·屈纳对俄勒冈发行人凯利说，他的合资报纸是“游击行动”的结果。柏林墙打开后，屈纳到西柏林作旅行与一家保守派报纸达成合作协议，要求对方为其提供设备、物资和培训。屈纳说，“所有主要的西柏林报纸和东柏林报纸都签订了协议。”

东德人对适应新闻自由不应该有困难。凯利说：“要使东德的报纸达到我们西方那种繁荣程度，他们需要培养当地的人掌握报纸的经营管理。他们的报人知道如何报道新闻，但远没有掌握报纸市场的经营技巧。”

这一点对经济仍处于混乱状态的东德很重要。前民主德国第三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比1989年下降30%，失业率达25%。1990年夏天有24页的《另一种报》的一期中只刊登了一个1/4版面的广告。1990年8月，该报曾在《国际先驱论

坛报》和《纽约时报》登了两栏宽的广告，声明“我们需要50万美元，挽救这份独特的报纸”。

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十分缓慢。纽约大学市场管理专业副教授、前报纸广告局副局长利奥·博嘉特说，“东德的许多或者说大部分的企业仍由国家控制。”“在私有制形成前，报纸的广告量不会有多大发展。”

《另一种报》编辑彼得对《纽约时报》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外国广告。比如要到此地做生意的英国和美国公司”。但博嘉特说，该报尚不具备处理这种广告的能力。据他说，汉堡广告经理曾要求在这家东德报纸上登彩色的可口可乐广告，得到的回答是，“只要蓝颜色可以，我们星期四就能登。”

南斯拉夫：地区性的冲突导致了一场谁将控制报业的剧烈抗衡。一些独立出版物出现。

在南斯拉夫，旧的民族情绪正在威胁着国家的统一。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等北方共和国正在作出退出联邦的威胁。塞尔维亚当局废除了科索沃议会并关闭了最重要的阿尔巴尼亚文报纸。

1990年4月7日，一家由南斯拉夫记协发起的自由日报《斗争》问世。它的口号是，“为独立和诚实的新闻而生存！”然而，这个记协权力很有限，或者“实际上就不存在”，据萨格勒布《起点》杂志的主编马里安·朱莱卡说。

即使多党制议会选举制度恢复以后，国家所有的媒介依然在共产党的实际控制之下，尽管这是不合法的。

几家南斯拉夫报纸已经宣布他们为“独立”的。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第一家南斯拉夫私人报纸《东方快报》于9月创刊。它是在萨拉热窝发行的一家地区性报刊。

在克罗地亚也有两家情况不错的独立报纸。它们是在斯普利特市发行的《ST》和萨格勒布市的《苍天》双周刊。而贝尔格莱德市的第一家全国性日报《独立新闻》由于政府控制发行量所造成的矛盾，在几个月里就破了产。

一些独立的报纸管理者们说，他们欢迎外国投资，但哪些人买下哪些报纸尚不清楚。一些外国发行人与他们的南斯拉夫同伴进行了初步的讨论。杂志编辑朱莱卡说，马克斯韦尔公司最近表示有兴趣购买贝尔格莱德市有影响的独立日报《信使报》。

罗马尼亚：罗马尼亚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以放慢新闻自由在这一动荡的国家的发展速度。

新的罗马尼亚出版物象雨后春笋般铺开，但很快就消失了。科文告诫说，政治环境“从新闻自由的观点来看有时会变得很糟”。最大的障碍是控制报纸的生产和发行的政府新闻审查制度。

当地的记协曾呼吁政府撤消1990年10月做出的决定：独立报刊是国营的国家出版社的一部分，在发行上应受国家控制。在会见一些报纸的编辑后，新闻部长阿德里安·瑟尔布说，政府的态度是不会改变的。幸运的是，直到2月中旬这项由政府控制发行的决议还没有实施。

国会最近提出的一项新闻法规定是又一个路障。这一新

闻道德法规要求，所有的消息要经过核实，而且鼓励记者提供消息来源。

作为回报，布加勒斯特的主要独立报《自由罗马尼亚报》加入了罗马尼亚第一家基层反对党的缔造者——“公民联盟”。到1990年年底该联盟的成员估计达10万人。

大约有120名记者承担《自由罗马尼亚报》的所有权并在此工作。1989年12月齐奥塞斯库被推翻后，他们办的这份报纸每天出150万份，非常赢利。但好景不长，政府切断了他们的发行网。

保加利亚：报纸正在激增，但是缺少钱、新闻纸和设备。

国民议会和整个国家被社会党和民主力量联盟两种势力所分化。

几乎所有的出版社都是由国家资助的。但一家新的出版社《祈祷书》（Missal）由民主力量联盟创办。从2月初，联合政府取消新闻纸的配给，引进市场机制，调节价格。政府将允许外国投资合作办报。

两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是索非亚社会党日报《言论报》和民主力量联盟的《民主报》。《言论报》的发行量几乎是《民主报》的两倍。

由记者们创办的《第7号记者》是第一家独立的报纸。另一家私人报纸是《168小时》。

一家主要的周报《支持报》（Podkrepa）是由击倒社会党入政府的右翼劳动联盟发行的。科文说：“如果它成为

一家日报，我是不会感到意外的。”

保加利亚的期刊数目急剧增长。从1989年到1990年，期刊的种类从250猛增到1500。

科文在报告中说，保加利亚的报纸要求厂商用硬通货币支付其广告费。这样他们可用这些硬通货币到奥地利或瑞典购买新闻纸。

（译者注：《支持报》是亲反对派的“支持”独立工会联合会的机关报。）

提供各种不同方式的帮助

刚刚自由的东欧国家的新闻记者向美国同行们寻求帮助，以在本国建立强大的自由报业。他们要求美国支持对本国政府垄断的印刷业进行私有化，为他们培养管理人员，提供新技术和新闻教育的信息。

许多世界性新闻报业集团尽管自己本身也有困难却做出了反应：如合办报纸、办培训班和提供咨询。

在1990年至少有80家媒介公司、报业集团、大学和基金会发起了援助项目，包括合资办报、互访、技术性研讨会及长期赠订美国报刊。

据弗吉尼亚赫斯顿外国记者中心的总经理乔治·A·克里姆斯基说，尤其是，海湾战争并没有影响这些媒介的援助项目。

他说：“显而易见，国务卿吉姆·贝克和他的班子对东

欧所能做的并没有全力以赴。”“新闻报道全都集中到海湾。但是，新闻援助运动并没有受这一切限制，因为它是在一个不同层次上。媒介的财力、物力和海湾危机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

“现在，我们更有理由把精力转向东欧。现在绝对没有援助中东媒介的机会。”但克里姆斯基告诫说：如果这场战争“持续永久打下去和有进一步扩大的势态”，那么它将影响所有的海外活动。

此外，克里姆斯基指出，由于苏联的“分裂”和波罗的海国家的新压力给整个欧洲造成越来越多的忧虑。他说：“谁也不想让1989年和1990年所获得的成功由于波罗的海事件而付诸东流。而苏联人被搞得没有精力去关心中欧和东欧的事情。他们关注的是其本国的经济和政治生存的问题。”

美国报纸出版人协会老资格的副主席W·特里·马圭尔说，美国报纸对东欧伙伴的帮助是“对正在演化的全球信息经济的一种投入……美国人也很需要了解其他国家如何出版他们的报纸。”

研究该地区情况的甘尼特基金会媒介中心总经理埃弗里特·E·丹尼斯说，发行人可采取个人和集体方式提供帮助是实际可行的帮助。

可以说，世界上所有的报纸在寻求和保持独立地位的过程中，都需要帮助。丹尼斯说，世界上只有东欧这一地区发生了一个接一个的政府在短期内接连倒台的事件，整个意识形态几乎一夜之间从一种运转方式转到另一种，丹尼斯指

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纳粹新闻业被推翻，类似现在的媒介援助象潮水般地涌入西德。

他预料，该地区所得到的金钱形式的“礼物”将多来自于外国投资集团，而不是美国的新闻界。但他说，东欧最需要的是管理经验，而这正是——美国媒介公司愿意提供的。

在康涅狄格州斯坦福《鼓动报》担任美术编辑的杰·弗里·F·奥康奈尔说，为外国记者提供培训“扩大我们的眼界”。1990年秋季，他曾是《时代镜报》访问学者叶尼科·滕伊的负责人。叶尼科·滕伊是布达佩斯《匈牙利民族报》的记者。滕伊说：她认为尽管匈牙利人在客观报道方面“有许多要学习的东西”，在匈牙利当记者是“更为高尚和受人尊重”。

为落实培训计划筹集必要的资金是一项令人沮丧的任务。例如，明尼苏达报业基金会考虑邀请6位东德新报业协会的负责人作为明尼苏达发行人的客人进行一周的访问。但明尼苏达州报业基金会尚无能力筹集到足够的钱。

这个组织的荣誉经理罗伯特·M·肖说，“我们感到沮丧——他们要培训，而且我们可以满足他们。这恰恰是一桩耗费财力的事。”

德国报业协会的代表、《柏林日报》的洛塔·波珀给肖写信说道：“我知道你们也无能为力。但令我非常感动的是你为了帮助我们花了很多精力，这本身就是帮助。”

在安大略的企业集团《人民报》(Lidove Noving)从加拿大的发行人那里集资为布拉格这家报纸购买计算机和

设备。特别项目主任欧内斯特·楚克尔说，“我们从加拿大每个主要的出版集团那里都得到支持。而美国人根本没支持过我们。我们购买了8台计算机，但需要22台。”他说《人民报》还正在寻求合资伙伴兴建一座最现代化的报纸印刷厂。

丹尼斯说：“许多人都在寻求帮忙。他们正在由过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闻观转向西方自由新闻的尝试。我们为东欧提供帮助的机会很多，但如果我们不抓紧就会失掉机会。”

西方协会可以用无数的方式进行帮助。媒介公司可以从“开明的谋利”方式做起，搞一些合资，报业集团可以提供业务评估和培训。大学可以帮助发展教育计划和设计课程以及起草教科书。根据甘尼特基金会制定的计划，基金会可以与东欧同行创办长期交流的机构和媒介。

这种建议已经初见成效：

分享信息和设备

△在为东欧提供财力和分享成果的同时，美国报纸与发行人协会正在注视那一地区的局势发展，以了解当地的报纸状况并向外界提供了解他们的资料。美国报纸与发行人协会代表和波兰官员会晤，讨论国家新闻垄断的私有化，向一些东欧国家报人免费赠送报纸，在该地区建立人口和报纸资料数据库，同时与世界新闻自由委员会协作评估在该地区提供

设备的可能性，并且与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合作分析提出新闻法。该协会正在联络愿意提供帮助的北美报人以建立更多的合作项目。协会要求熟练掌握并运用这两种语言的成员主动与赖斯顿的报业中心马圭尔联系。此外，报纸与发行人协会正在鼓励西方报纸发行人为东欧地区报纸提供赠送订阅。

△世界新闻自由委员会已经印制了一份名为中欧与东欧记者手册的160页的书，并为各种媒介项目提供了资金。1990年10月80多家组织出席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世界新闻自由委员会“自由之声”90年研讨会。这个会的主要议题就是协调各方面的力量援助东欧媒介。该组织也成为情报交换所，为供需帮助双方提供场所，比如有人想捐赠旧设备等等。

△甘尼特基金会发表了一份101页的报告——《正在出现的声音：过渡中的东欧媒介》。这份报告是由基金会成员根据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南斯拉夫的6周访问写出的。

△报刊和大众传播教育协会组成一个委员会，讨论美国新闻学院怎样帮助以东欧为主的国家民主化。马里兰新闻学院教授雷·E·希伯特任该委员会主席。

△一本叫做《东欧和中欧媒介革命》的研究集子很快将由乔治亚大学的国际大众媒介中心小詹姆斯·M·考克斯发行。

△印第安纳大学全国现代化报道研究所正在为东欧报纸提供有关新技术的信息。这家研究所所长谢里·里恰尔迪

说，“在我们将东欧报社编辑室数量稀少的电脑撤下来以前，我们需要瞄准什么设备对他们来说是最需要和最有用的。”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报》从一家非赢利组织全国民主捐赠会和驻瑞典的苹果电脑分公司那里获得16万美元的资助。据报道，苹果计算机公司以向其提供设备为交换条件，以打入捷克市场。这家捐赠基金会还拨款24.85万美元为保加利亚《民主报》提供新闻纸。

△纽约市自由之家1990年提供35万美元的资金，将一部印刷设备从荷兰运往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自由报》正在等待政府批准购买建印刷厂所需要的地皮。

小报也能和他们的东欧同行建立上联系

经济的紧缩使美国主要大报在帮助他们东欧这些初出茅庐的兄弟的时候感到力不从心，而这时候美国的小报也许认为还是离这事远点好。其实，事情并非如此。

立陶宛一个记者团最近访问美国，学习办独立报纸的方法。他们特意将访问堪萨斯州的一张小报《曼哈顿信使报》包括到旅行计划内。他们回到波罗的海家园时，一直与“信使发行者和编辑”的爱德华·L·西顿保持联系。

在那些寻求对东欧帮助的人士中普遍认为，美国经济正在向紧缩方向发展——但是，关注本身有时也象资本一样重要。弗吉尼亚赖斯顿外国记者培训中心主任陶菲克·米沙拉维说：“不要把我的话理解错了。资金现在是人们最关心的问

题。但在有限的条件下，财力较弱的小报也能提供一些帮助。”

美国报纸编辑与发行人协会老资格的副主席W·特里·马圭尔说：“无论你采取什么样的帮助方式，都不要急于派往人员——即便是一般的编辑之间的交往。你首先应该做些调查研究，你总能找到效果更好而又不费钱的办法。”

米沙拉维建议，在寻找一家合适的东欧报纸之前，美国报人首先从他的组织、美国报纸编辑与发行人协会、世界新闻自由委员会或甘尼特媒介研究中心取得咨询。

对美国热情的地方小报来说，共同感兴趣的一个潜在地区是东德许多宣传机构。这些机构切断了与党的联系，由于失去了以往的资助，它们正通过加强地方新闻量在自由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挣扎。

编辑与发行人协会的马圭尔建议要从报纸工作人员中找到会说一种东欧语言的人来帮助克服语言障碍。

他和米沙拉维都建议，找出四五家有希望合作的报纸，然后将帮助他们的计划用传真传给对方，并根据对方的传真反应做出相应的决定。他们说，事实上，这种方法比购买机票、打电话或甚至邮递——更为切实可行。当然也可以考虑定期邮寄几份报纸，偶尔通通长途电话或许最终派工作人员去对方国家等等办法。

也许建立关系最有成效的阶段是交换稿件和协调今后的合作项目。尽管电话线路有时不可靠，传真的确是合适的联系方式。

马圭尔说：“想想看，发几份文传就可以解决本来要花

2000至3000美元的问题。”这笔钱用来派人往返一趟也不一定够用。

一些人在东欧地区看见了做生意的机会

正当欧洲新闻组织与东欧新兴媒介组织建立一个又一个的合作关系时，有人问：为什么美国报纸不争相仿效呢？尤其是经济衰退给捐赠带来一定的困难的时候。

《今日美国报》国际版董事长戴维·马扎雷拉说：“对于建立合作关系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他最近达成一笔业务交易，帮助出版一份面向罗马尼亚青年的16页的双月刊报纸。

可能成交的买卖很多。仅在波兰，政府的私有化委员会编辑了双周出版一次的目录——列出要出售的报纸和寻求合资的报社。这份目录可以从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的埃尔兹别塔·科拉扎诺夫斯基那里得到。

甘尼特基金会主席艾伦·H·纽哈恩等人认为，正在挣扎着的东欧新闻界更需要的是业务上的合作而不是捐赠东西。他们虽然承认无私的帮助是有目的，但新独立的报纸要想在自由经济中站得住脚就必须吸引外部投资。

可惜，障碍不比机会少。

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老资格的副主席W·特里·马圭尔说，障碍之一是东欧报纸回笼的货币是不值钱的非硬通货币。另一个障碍是语言。

弗吉尼亚赖斯顿外国记者培训中心主任陶菲克·米沙拉维指出，许多东欧报纸既不需要——或者他们害怕——外国的直接投资。该机构一直在从事多方面的援助工作。

米沙拉维指出，作为一个国家，匈牙利对外国投资者感到特别惧怕。他说，其实匈牙利提防的不是外国的参与，而是外界的垄断渗透。这使急于投资合作的德国公司很为难。而匈牙利对动作缓慢的美国发行人也是半开着门。米沙拉维认为在东欧没消除恐惧之前，美国人的谨慎是有道理的。

纽哈思等人认为，这种顾虑是可鄙的。尽管在当今这种混乱的世界中，产生这种恐惧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资本主义世界的独立报纸必须要求资金，这是无法改变的。

帮助培训

△华盛顿特区时代镜报人民和报刊中心制定了一项交换计划。这项计划是将捷克和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的记者和发行经理送到美国培训6个月，并提供研究经费。这些新闻工作人员被派到时代镜报集团的各报中进行实习报道和锻炼管理能力。中心主任唐纳德·凯勒曼说，1991年秋季要将此项目扩大到其它东欧国家。

△美国报纸编辑学会代表团最近访问了波兰、德国、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与那里的记者和政治家会晤并为美国报纸写文章。访问期间，这个代表团列出了一个名单，上面有100多名报纸编辑协会成员自愿为东欧报纸的新闻工作者

提供咨询。

△这家外国记者中心用美国新闻总署基金为波兰记者举办6个月一期的工作研究项目。1990年有8位记者参加了华盛顿特区举行的讨论，并在一些美国报纸实习工作。该中心还安排了23位东欧记者在美国报纸实习。

△国际报纸市场协会为东欧地区从事市场经营的人提供实习。

△1990年8月，世界新闻自由委员会与波兰记协共同在华沙主办一个报纸经营进修班。课程包括广告价格、电话征求分类广告、运输方法、预算和工作人员的配备。

△1990年夏天，拉特格斯大学新闻资源研究所主任杰罗姆·奥门特教授领导的一个媒介专家小组为全波兰报刊和广播记者提供培训。课程包括：采访技巧、建立新闻编辑室和报道地方选举。新泽西州《阿斯伯里公园新闻》的内普丘恩提供有关赶在截稿时间前发稿的录相磁带。道·琼斯报业基金会赠送了许多本他们每年的奖学金指南。《今日美国报》捐赠了一份报纸如何配页的特别插登广告。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基金会提供了“有关新闻自由的讲话”的一本小册子。其中有许多有关新闻自由的重要引语。奥门特说，科宁的年轻记者们把这本小册子翻译成波兰语。他说：“他们打算在波兰的同事中发行数千册。”

△美国政府资助的国际媒介基金为向往言论自由的记者们提供钱和技术以及培训。到目前为止，为这项服务的预算达大约550万美元。马里兰大学新闻系教授希伯特应基金会的

请求，正在着手提出一份报告，建议在布达佩斯建立一所由美国人资助的记者学校。

△美国新闻署经营的总统东欧新建议处也在为协调其他部门为东欧媒介进行培训。此外，美国国务院为在华沙新成立的中欧和东欧的传播中心提供了10000美元拨款。

许多国际集团也在积极致力于援助东欧报业。

例如，由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和新闻自由委员会支持的巴黎国际报纸发行人联合会1990年9月在布达佩斯组织了一次管理研究会。大约80名匈牙利经理参加了这次管理、发行、广告、推销和市场的专题研讨会。国际发行管理协会提供了资料。总经理约瑟夫·B·福尔西说，其中的主要课题包括报架上的画片，这种促销手段还从来未听说过。

其他提供培训援助的是国际新闻研究院、路透社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然而，新闻自由呼吁者说，更需要做的大量的工作是加强和稳定东欧新近独立的新闻媒介。

正如世界新闻自由委员会的执行董事丹娜·布琳说的那样，“最终提供这种帮助时，模仿不见得是坏事。”

（原载1991年3月号美国《报业时代》 宋立芳译

赵宏校对）